

國立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從「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輝萬國」：
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歷程

指導教授：鐘月岑教授

研究生：鄒金喜（934406）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

摘要

鄭孝胥(1860-1938)的一生，經歷滿清皇朝、中華民國與滿洲國三個政權。在這段時間中，中國歷經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變，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民生、外交之層面，皆有相當程度之變化。身處在這個時代的鄭孝胥，在其長達五十七年(1882-1938)的日記中，不同程度地反應或記載其親身之經歷與體驗。有鑑於鄭孝胥在其生涯中與日本長久而頻繁的互動，因此筆者擬以鄭孝胥的日本觀為中心，藉由他所留下的《鄭孝胥日記》與其他相關史料，來試圖瞭解鄭氏日本觀的變動過程，與其對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所造成之影響。

於本文中，第二章的內容在討論鄭孝胥如何面對當時中國環境與風氣之劇烈轉變，以及在首次接觸到日本政治、文化與人民後，進而建立與調整自身對日觀點的一個初步過程。本文第三章的時間斷限將以戊戌變法作為起點，而以九一八事變前後做為結束。其中筆者再以辛亥革命為界，將此一時間斷限分為兩個階段，以觀察鄭孝胥這段時間的日本觀轉變的過程。在第四章中，筆者將以鄭氏於《日記》中對於其王道主義的相關記述，以及一些相關的零星演講稿作為分析材料，試圖探討鄭孝胥如何定位他自己的王道主義與日本儒學界中的王道政治論兩者之間的關連性，以及此時他對於日本的觀感等命題。

本文顯示：在民國創建前，鄭孝胥將日本定位為可以讓清廷與中國在物質水準與工商業技術上提昇水準的一個對象。辛亥革命爆發以後，為了讓復辟大業早日實現，鄭孝胥把日本視為一股能讓他所遵循、信仰的儒家價值傳統與君主制度在中國重生的重要力量。滿洲國建立後，鄭孝胥對日本的友善觀感提升到最高點。但隨著時局的變遷，鄭孝胥終究無法讓日本對其政策與主張持續的支持下去。而他希望拉攏日本以協助溥儀重登大寶的理想，也只不過是一場幻影。

致謝辭

看到楓林小徑的楓葉紅了四次，也見到人社院圖前的聖誕樹亮了四回。今日回想起自己初進清華的懵懂與徬徨，不禁頗有體會與感觸。這份論文的出現實在要感謝太多太多幫助我、鼓勵我的人，謝謝你們對我的幫助與關心！

首先要感謝的人，就是我的指導教授鐘月岑老師。小自格式標點，大至結構層次，在鐘老師的諄諄教導之下，才有今天這本論文的出現。此外，鐘老師總是給我相當多的建議、觀點與思考方向，實在讓我在寫作論文時受益匪淺。感謝您在學生論文各方面的指導與建議，謝謝您。

陳華老師與陳熙遠老師對我的照顧也讓我銘記在心。在與陳華老師電子郵件的來返中，您時常熱心的提出建議與論文待修改之處，並點出我論文所缺乏的關鍵問題，使我能夠瞭解自己文章的弱點與不足；陳熙遠老師的精闢見解讓我收穫豐碩，不管在用字遣詞或理論使用方面，陳熙遠老師都給了我非常多的建議。兩位老師的教誨讓我終生受益無窮，謝謝您們。

寫論文或多或少都會感受到孤寂，身邊的同學與學弟自然成為消除孤獨的最好藥方。同屆的兆安、建志、敬軒與曜君，與你們的互動過程讓我眼界大開，也增添了許多快樂的回憶。藉由與學弟正弘、淳益跟肅毓的對談，也讓我免除於孤寂。大學與高中同學立欣、繼賢、勝雲、偉剛、亦文、晉成、明瑞給了我有力的支持，欣怡甚至將她的論文著作與參考書籍借我參閱，真的很感謝你們。清大人社院辦公室與歷史所辦公室的秘書們更是給了我許多有形與無形的幫助。邱姐、英惠姐、敏菁姐為我在行政資源方面提供很多建議，還受到阿華哥四年多來的幫助與提攜，謝謝你們！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沒有你們對我的信賴與完全支持，我絕對沒有辦法在這裡唸書，更遑論寫作這本論文。村語一家人對我的關懷讓我溫暖。尤其是村語，沒有妳的支持與提醒，沒有妳的關心與督促，沒有妳在我身邊一路走過來，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謝謝妳，我的名刀小村。

從「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輝萬國」：

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歷程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2
第三節	問題意識	6
第四節	研究取徑、材料與章節安排	8
第二章	早期生涯與際遇	12
第一節	家學、科舉與幕客	12
第二節	「此風既東來」：「師日」、「仿日」與「輕日」	19
第三節	「其端詎難闕」：中日甲午戰爭對鄭孝胥的影響	34
第四節	小結	41
第三章	日本觀的定調過程	43
第一節	「敵人」，亦或「朋友」：對日本立場的改變	43
第二節	多變的日本「印象」	54
第三節	「自信宿心難變易」：追尋復辟與日本的關聯性	63
第四節	小結	72
第四章	「王道主義」與「日本觀」	75
第一節	「王道蕩蕩天所開」：王道主義在滿洲國的開展	75
第二節	「大亞洲主義」與「王道」思想	86
第三節	「王道衰興豈偶然」：日本支持態度的轉變	93
第四節	小結	102
第五章	結論	104
	【徵引書目】	109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鄭孝胥(1860-1938)的一生，經歷滿清皇朝、中華民國與滿洲國三個政權。在這段時間中，中國歷經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變，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民生、外交之層面，皆有相當程度之變化。身處在這個時代的鄭孝胥，在其長達五十七年(1882-1938)的日記中，¹不同程度地反應或記載其親身之經歷與體驗。鄭氏自幼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之薰陶，曾奉派駐日，甚早便與日本有所接觸。後因中華民國的建立，使鄭孝胥斷絕了官途與一展抱負的良機，成為一個失勢的「前清遺老」。²為挽回自己的前途與理想，他選擇投身復辟派，並入紫禁城輔佐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以下皆簡稱「溥儀」)。與日本的頻繁接觸，使鄭孝胥漸受溥儀之重視，而鄭孝胥也對溥儀造成了影響，促使溥儀接受日本軍部勢力的幫助，走上創建「滿洲國」之途。³

作為一個受到後世毀譽參半的人物，鄭孝胥的兩面性是相當特殊的。就文學上來說，他是一個詩畫造詣備受肯定的文壇健將，但在歷史定位上來看，多數史家都因他晚年選擇與日本合作建立滿洲國而給予較為負面的評價。但他對於中國近代史，乃至於中日近代關係史所造成的深遠影響，是不可忽略的。鄭孝胥的獨特性引發了筆者的興趣，因此筆者希望以較為客觀的角度出發，來對鄭孝胥做一個初步性的研究。鄭孝胥所生存的時代充滿了變動與不定，其思想與觀點都曾出現過轉變的歷程。決定與日本合作，更是他受後世史家批評的關鍵。有鑑於鄭孝

¹ 原件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鄭孝胥日記》，起自光緒八年壬午（1882年4月14日）鄭孝胥二十三歲時，而止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3月14日），共五十六年。光緒十七年（1891年）以前的十年，除了光緒十一年（1885年）完整以外，每年都有缺失的部分。不過自光緒十八年（1892）起，就完整無缺。另外還附有《院錄》一部，共三十六卷，為鄭孝胥任滿洲國國務總理時的公務日記。起自1932年3月10日，終於1935年5月20日。所記載的重點多為滿洲國國務會議的議事情形。1993年由勞祖德整理其手稿，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參見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5。

² 清廷遜政後，一批前清的舊臣遂以「遺老」自居。胡平生認為，這群遺老可說是復辟派主要組成集團中人數最多的。由於多為科舉出身，因此又具有「文人學士」的身份，還是傳統儒家文化的衛道者與傳播者。這些遺老先於清廷官場中或許因立場而互相對立，但在民國成立後，卻因反對共和與謀求復辟的共同目標而結合。參見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52-53。

³ 對華人歷史學界來說，多把成立於1932年3月1日的滿洲國看作是受日本所扶持所建立的傀儡政權，因此於文本中多以「偽滿」、「偽滿洲國」或「滿洲國」稱之。下文為求簡潔，均不再加註「」。

胥在其生涯中與日本長久而頻繁的互動，因此筆者擬以鄭孝胥的日本觀為中心，藉由他所留下的《鄭孝胥日記》與其他相關史料，來試圖瞭解鄭氏日本觀的變動過程，與其對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所造成之影響。

二、研究回顧

就有關研究鄭孝胥的相關論著來看，大陸學者對於鄭孝胥的研究成果遠多於臺灣。由於鄭孝胥有兩種身份：一個是渴望重回政治舞臺一展抱負的前清遺老，另一個則是晚清詩壇同光體的重要領導人物與書法名家。⁴因此有關鄭孝胥研究的方向也就大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文學，另一則為歷史。文學方面的研究多以論述其詩詞作品為主，如楊曉波的〈鄭孝胥詩歌研究〉，紀映雲的〈關於鄭孝胥的詩意追求—及其與同光派之關係〉。此兩篇論文闡述有關鄭孝胥的文學成就與貢獻甚為明確。⁵

歷史研究方面，鄭孝胥早年曾與張謇(1853-1926)、湯壽潛(1856-1917)等人共同組成「立憲預備公會」並任會長，在立憲派的成員中佔有一席之地。中研院近史所學者張朋園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和張玉法的《清末的立憲團體》，對鄭孝胥於立憲運動的影響與貢獻均有提及，但著墨不多。⁶此後臺灣有關於滿清遺老、復辟派，乃至於直接討論鄭孝胥的研究文章便甚為少見。直至 1980 年代，胡平生在其著作《民國初期的復辟派》中，以民國建立到滿洲國創建為期，論述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復辟派人士在這段期間之種種活動，而鄭孝胥正為復辟派人士中甚為重要的關鍵角色。在本書中，胡平生爬梳並運用相當多的史料來建構其論述，內容極為詳盡，為當時臺灣史學界在有關於復辟派的相關研究領域中，做了一個清晰且詳盡的整理與補充。⁷近幾年，林志宏再度探討民國初年的前清遺民對於中國從帝制到共和政治文化轉變下的認同感(identity)。在〈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一文中，林志宏以鄭孝胥為例，試圖說

⁴ 鄭孝胥的詩作於晚清詩壇有相當崇高之評價。有關於鄭孝胥詩作之相關研究，參見陳衍著，鄭朝宗、石文英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郭紹虞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林庚白，《麗白樓自選詩》（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紀映雲，〈關於鄭孝胥的詩意追求—及其與同光派之關係〉，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4。而探討鄭孝胥書法的相關著作，參見王澄，〈鄭孝胥的書法藝術〉，收入劉正成等著，《中國書法全集》第 78 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3），頁 22-24。

⁵ 楊曉波，〈鄭孝胥詩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紀映雲，〈關於鄭孝胥的詩意追求—及其與同光派之關係〉，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4。

⁶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5），頁 32-33。

⁷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5。

明滿洲國的建立除了是某些前清遺民對於復辟訴求的最後一搏，同時或許也是為實現心中理想國度所做出的一種政治立場之選擇。⁸

在中國大陸的史學界，鄭孝胥被給予的評價甚為負面。鄭氏在 1932 年 3 月滿洲國創立後擔任滿洲國的國務總理，被認為「負逆落水」。⁹正因如此，中國大陸史學界早期針對鄭孝胥的相關研究，幾乎都與「漢奸」離不開關係。如李侃的〈鄭孝胥與偽滿洲國初期傀儡政權〉，遲偉凡的〈簡論鄭孝胥的復辟保皇〉，以及李壽岡的〈論《海藏樓詩》及其作者鄭孝胥〉等文章。文章重點多在論述鄭孝胥如何與日本人合作、默許日本人在中國東北的侵略與壓榨等方面。¹⁰這一類的文章是以鄭孝胥的政治作為來當作研究主體與核心，也致使文章作者多以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來評斷鄭孝胥的作為，並給予較為負面的評價。

1993 年，原件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鄭孝胥日記》經勞祖德加以整理後，由北京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日記的出現提供後世學者更多的史料，使相關研究者可以進一步的分析鄭孝胥的心境與其處境的相互關聯。從這時起，大陸學者對於鄭孝胥的研究不再侷限於「漢奸」的偏狹範圍。有關其生平、其日記的研究文章開始出現，如湯志鈞的〈戊戌時期的鄭孝胥及其《日記》〉，周一良的〈關於《鄭孝胥日記》〉，以及羅繼組的〈我所見之《鄭孝胥日記》〉等文章，都是以《鄭孝胥日記》為研究主體，來探討鄭孝胥的歷史地位和對中國近代史之影響。此外，本文前頭提到鄭孝胥生平作詩甚多，也有學者以其詩集《海藏樓詩集》，搭配《鄭孝胥日記》來嘗試分析鄭孝胥的文化遺民性格與多樣性。這種融合文學與歷史的研究方法，算是近幾年來大陸文史學界研究鄭孝胥的主流趨勢。這類文章可以傅道彬、王秀臣的〈鄭孝胥等人的晚清文化遺民情結〉、趙燦鵬的〈論民國初年遺老歷史處境的特殊性——以鄭孝胥為例〉等為代表作品。此類文章較偏重於文本分析與思想剖析，由文學性質的角度來出發，輔以部分歷史觀念與方法來做研究，算是文學史與文化史的範疇。¹¹

⁸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5。

⁹ 大體來說，鄭孝胥的歷史評價以詆毀居多，尤以晚年與日本人合作進而建立滿洲國為最主要之原因。這也導致鄭孝胥原本甚受矚目與讚揚之詩作與書法同時遭受嚴厲之批評，造成後世對鄭氏的詩作與書法作品多持相當負面的評價。參見：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新史學》第 18 卷 3 期(2007)，頁 70-71。

¹⁰ 李侃，〈鄭孝胥與偽滿洲國初期傀儡政權〉，《抗日戰爭研究》第 4 期(1995)，頁 105-131；遲偉凡，〈簡論鄭孝胥的復辟保皇〉，《遼寧大學學報》第 3 期(1995)，頁 75-76；李壽岡，〈論《海藏樓詩》及其作者鄭孝胥〉，《中國韶文學刊》第 1 期(2000)，頁 101-105。

¹¹ 傅道彬、王秀臣，〈鄭孝胥等人的晚清文化遺民情結〉，《北方論壇》第 1 期(2005)，頁 1-10；趙燦鵬，〈論民國初年遺老歷史處境的特殊性——以鄭孝胥為例〉，收入胡春惠、薛化元主編，《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社會變遷》，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5。

另一方面，在 1871 年簽訂《中日修好條約》後，中日雙方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連帶也使得兩國在貿易、交通與文化方面都有更為深入的交流。自此，以何如璋、黃遵憲為首的中國士人開始建立日本觀，同時也希望藉由參考當時日本推動西化的思想、政策之過程，來推動中國的進步。鄭孝胥於 1891 年授命赴日，開始與日本官方及民間士人有所接觸，他對於日本的想法也多記載於《日記》中。鐘叔河在《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一書中以兩個章節來介紹這些具有代表意義的士人著作。赴日的中國士人並非都欽羨日本的進步，也未必希望中國能夠效法日本實行西化，因此作者將對日西化立場迥異的中國士人著作內容加以相互比較，進而點出這些著作對於當時中國士人在建構日本觀的過程中所造成的影響。¹²日本學者伊原澤周則以當時中日士人的對談內容為主要研究對象，探究當時中日士人對於彼此的觀感，同時也將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做一比較，研究兩者的根本差異之處。¹³而孫麗梅在其著作《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本觀：以直隸省為中心》一書中，則以直隸省官民為研究的主體對象，來探討這些直隸官民赴日參訪後，他們對於對日本教育、工業、司法與行政措施，以及社會民俗等方面的觀察，並研究這些觀念日後為中日文化交流所帶來的影響。¹⁴周啟乾的〈晚清知識分子日本觀的考察〉一文，更對清末立憲派與革命派知識分子在日本觀做一介紹，並分別論述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日本的種種觀察。¹⁵

由徐臨江所撰寫的《鄭孝胥前半生評傳》，則是集先前研究成果之大成，將鄭孝胥在辛亥革命以前其官場經歷、政治經濟的思想主張，以及與其他士人的文化活動等加以研究和描述。徐臨江透過對於鄭孝胥前半生的研究成果，並在探究鄭孝胥於出使日本時如何塑造日本觀，以及塑造其日本觀點的過程與影響為何這兩個問題上，提供了較為系統化的歷程解析，¹⁶同時徐臨江還將鄭氏歸類為「保守型文化菁英」，為其將來支持復辟的態度做出了解釋。¹⁷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顯示，原為晚清時期中國傳統文化菁英的鄭孝胥，青年時期的駐日經歷和歷練讓他懷著經世致用的理想。返國後受到中日甲午戰爭戰敗的

¹² 「他們的觀點各不相同，往往據其感受，發為文章。不管是保守的人也好，進步的人也好，持中間立場的人也好，他們的記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日本近代化的過程，同時也客觀上反映了中國人對於近代化問題認識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參見：鐘叔河編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臺北：百川書局，1989），頁 431。

¹³ 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鑒」：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20。

¹⁴ 孫麗梅，《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本觀：以直隸省為中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¹⁵ 周啟乾，〈晚清知識分子日本觀的考察〉，收入《日本學刊》第 6 期（1997），頁 68-84。

¹⁶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頁 25-35。

¹⁷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頁 53。

打擊，並見當時清廷頻受列強侵略，因此希望以提倡君主立憲，或是與日本合作進行政治改革，來拯救當時亂象頻仍的清廷與中國，不過此一理想卻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化為烏有。不甘如此斷送君主立憲理想的鄭孝胥，為實現自己的主張，並保衛自身思想體系中「操守」之價值，因而選擇投身「復辟派」陣營。¹⁸但復辟派非當時中國政治思想之主流，為求外界支持與實現理想，經過了一連串外在環境與內在思想的漸變過程後，鄭孝胥最終決定選擇與日本的軍部勢力進行合作。說明鄭孝胥選擇與日本軍部合作的動機與思想是相當重要的，鄭氏對於日本的想法與觀感是隨時間遞嬗與外在環境的變動而有所轉變，他的選擇也讓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更為複雜。

與日本軍部合作之後加快了復辟的步調，滿洲國的創建成為溥儀欲進一步重登大寶的基礎。為了爭取自主權並擺脫日本軍部的控制，同時也為了促進滿洲國人民對這個「國家」的凝聚力，鄭孝胥必須找出一種思想，來證明滿洲國有其統治正當性，亦不受他人控制。以此為前提，鄭孝胥提出了沈寂已久的思想概念：「王道思想」，鄭氏希望在他的闡述與解釋之下，能將傳統儒家治國的學說加以活化並納為己用，其中更有帶領與指導日本儒學與政治思想的意味。在鄭孝胥生涯的最後幾年中，推行王道主義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目標。

雖然學界已對鄭孝胥的政治立場和對日關係之變化已有不少研究，而這些研究也大致勾勒出事件的輪廓，但探究鄭孝胥因所身時代加上環境劇烈轉變而產生的內在思想漸變之歷程，仍有研究的必要。筆者曾於清大歷史所修業中撰寫一篇學期報告，對鄭孝胥在滿洲國建立後就任國務總理之際，提出倡導中日合作的「王道」思想進行初步的探討，但並未針對鄭孝胥其自身日本觀的轉變過程此一命題加以系統化與精細的研究。因此，筆者希望藉由本文以展開扼要論析，了解鄭孝胥其日本觀轉變歷程的背後意義，並瞭解此一轉變對於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最後，植基於對鄭孝胥日本觀的轉變過程所進行的初步觀察與研究，筆者希望能夠為鄭孝胥的歷史定位或評價加以補充。鄭孝胥的歷史地位泰半多為負面，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鄭氏決定與日本軍部勢力合作，進而成立滿洲國，對中日兩國在近代史中的關聯造成巨大的影響。前人學者多將研究焦點擺至於他與日本合作後所造成的影響，而給予「漢奸」等負面評價。而本文的研究重點則在於嘗試探究鄭孝胥自首次接觸日本之後，在與日本於政治方面、外交方面與文化方面等種種

¹⁸ 胡平生將「復辟派」定義為：所謂的「復辟」，也可看作是傳統帝制思想的延續，是中國政治近代化過程中的反動現象。而從事復辟運動的人士，即為「復辟派」。它一群抱持著恢復清朝此一共同意念，而有實際言行者的籠統稱謂，缺乏統合嚴密的組織。其構成份子的背景，和從事復辟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參見：胡平生編，《復辟運動史料》（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1。

互動過程中，其對於日本觀感與定位的改變過程及其影響，同時希望能在研究的過程當中，從中了解鄭孝胥的內在心態與思想之演變，並嘗試以不同的觀點來論述鄭孝胥在歷史上的定位與價值。

三、問題意識

針對本文欲探討的核心問題：鄭孝胥自出使日本到於滿洲國推行王道主義(1891-1937)這段時間中其日本觀的轉變歷程，筆者將以鄭孝胥與日本之間的互動為主體，搭配對歷史事件與《鄭孝胥日記》和其他有關史料之觀察，以數個階段或層面來探討本文的核心問題。第一，鄭孝胥在出使日本的三年(1891-1894)中，是如何建立起自己對於日本這一個國家的觀感？鄭孝胥在其日記中記載了他對於當時正值明治維新而大力推行西化的日本觀感。那麼在鄭孝胥的看法中，中國是否該效法日本而推行全面西化？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讓鄭孝胥對於日本的態度造成了何種程度的影響？第二，有感清廷於中日甲午戰爭戰敗的恥辱，中國士民渴求清廷推行政治改革的呼聲到達高峰。眼見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成功，中國知識界吹起了一股「聯日風」，欲藉助日本之力來進行改革。那麼鄭孝胥對於這種風潮抱持何種看法？他對於日本的觀感在此時是否有所改變？1910年，鄭孝胥授薦前往東北建築鐵路以對抗俄國與日本所經營的南滿鐵路。這時他又如何看待日本？次之，辛亥革命爆發，共和政府創建，鄭孝胥希望以君主立憲政體來改造中國的理想也隨之瓦解。為求君主立憲之再現，鄭孝胥加入復辟派。為了讓復辟派對當時中國政局有更大影響，極力尋求外界力量支助的鄭孝胥，如何選擇一個最有效的力量來幫助他們？他如何改變自己的立場去做出選擇？而在做出選擇的過程中，又是什麼因素讓鄭孝胥捨棄日本政府與外交機關的合作機會，而選擇與日本軍部合作？第三，在溥儀與鄭孝胥決定與日本軍部合作以後，未久雙方便共同建立滿洲國。為了要宣揚這個國家的正統性，鄭孝胥選擇了傳統的中國儒家治國觀點「王道思想」加以闡述，為滿洲國的立國精神做出解釋。到底鄭孝胥的「王道主義」論調與日本儒學的「王道」有何不同？而鄭氏的王道主義與孫中山(1866-1925)的「大亞洲主義」其異同為何？經過鄭孝胥重新闡釋的王道主義，又真能安然渡過時代的考驗？藉由這三個階段對鄭孝胥的觀察，筆者希望能夠瞭解在各階段中鄭孝胥如何看待日本這個國家。並探查鄭氏看待日本的態度，是否隨著時間或是他與日本互動的不同立場有所改變？而這改變對於當時中日兩國的關係是否有所影響？影響為何？

第一個階段，自 1891 年奉令出使日本以後，鄭孝胥如何建立起最初對日本的觀感？爬梳並整理鄭孝胥在他日記中對於駐日生活的相關描述，和其他相關史料，並參考前人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到鄭孝胥與當時的日本文人有不少接觸。藉由這些接觸，鄭孝胥逐漸建構出他對於日本的一些相關印象與看法。自幼即受傳統中國儒家文化薰陶的鄭孝胥，對於這些東方島國的士人是否存在著「天朝觀」的優越感？根據徐臨江在《鄭孝胥前半生評傳》指出，鄭孝胥是受李鴻章(1823-1901)嗣子李經方(1855-1934)之薦而赴派駐日，那麼李經方又是以什麼樣的原因來推薦鄭孝胥？鄭孝胥駐日時，正值日本推行明治維新。對於日本的維新與西化，鄭孝胥有何看法？為使中國也能推行西化，鄭孝胥曾分析明治維新推行西化對於日本政局的影響。兩相比較之下，鄭孝胥是否認為日本全面推動西化的方式，也能適用於當時的中國？而鄭孝胥對日本的想法，又與當時中國其他寓日士人對日本的想法有無異同？若有，鄭孝胥是否因具有駐日之背景，使得鄭孝胥對日本的認知超過了其他的中國士人與官員？越四年，甲午戰爭爆發，鄭孝胥乃奉命歸國。面對當時政局瀰漫的主和氛圍，鄭孝胥卻倡導「主戰」。致使他提出反對與日本談和的態度是什麼原因？這原因與其駐日的經歷有著何種程度的關連性？此時他對於日本的立場又是為何？

再者，肇因於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中國掀起了一波以西方列強與日本為學習對象而追求改革的風潮。對於這股潮流，以及瀰漫於當時中國知識界與政界中的「聯日」以進行改革之呼聲，鄭孝胥又是如何看待之？戊戌政變後，鄭孝胥再度與日本展開不同層面的互動，而有不同的日本「印象」。這些「印象」為何？是否有所脈絡可循？1911 年，鄭孝胥接獲就任湖南布政使的命令，正當赴任途中卻遇辛亥革命爆發，鄭孝胥的身份因此完全轉變，從清廷的未來地方大官變成了孤臣遺老，其心中對於中華民國的憤恨可想而知。事實上，鄭孝胥是拒絕承認中華民國的。¹⁹1916 年，袁世凱(1859-1916)推行帝政旋遭失敗，民初政局動盪不安。由數個前清王公大臣，以及仍舊緬懷於前清的遺老們所聚集而共同組成的政治團體「復辟派」，眼見機不可失，便以恢復前清遜帝溥儀統治為號召，想要取回失去已久的政治實權。身為遺老成員之一的鄭孝胥，自然不會錯過此良機。

根據胡平生提出的重要論點，復辟派並非當時的中國政局之主流。在不利的形勢下，復辟派希望從列強尋求支援，以成復辟大業，然而復辟派成員內部也因意見不同而出現了分歧。有鑑於此，鄭孝胥開始以自己的力量奔走尋求支持，日

¹⁹ 由於中華民國之建立是斷絕鄭孝胥官途與抱負的最大原因，因此鄭氏終生對中華民國均持敵視的態度。從鄭氏日記中的文字間，強烈透露了對於中華民國的怨憤與敵視。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三冊。

本自然是他心目中一個很重要的對象。當時並非復辟派主要掌權人物的鄭孝胥，面對復辟派內部的紛爭，是抱持何種態度？而他是如何尋求支援的？鄭孝胥需要日本的支援到什麼樣的層次？是僅止於資金、軍火等物質方面，亦或更為深入的程度？鄭孝胥又是怎麼看待「與日本合作」此一做法？對這時候的鄭孝胥來說，與日本的合作僅是為了達成復辟派成為當時中國政局主流的方法或手段，亦或是他的理想？他該如何與日本合作？而日本對當時復辟派鄭孝胥等人的反應又是如何？當時日本對華的大陸政策對於鄭孝胥的企圖是否有所呼應？再者，由於日本內部的政局中，外交機關與軍方勢力兩者之間的對華政策步調並不一致，外交機關方面趨於保守，而軍部勢力較為激進。這是否讓鄭孝胥原本傾向與日本外交機關尋求協助的立場有所改變？而這樣的改變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第三，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成為溥儀決定與日本軍部合作的關鍵點。在日本關東軍的強力「支持」下，而有滿洲國的創建。由於外界多將滿洲國視為日本扶持之下所成立的傀儡政權，為了宣示滿洲國立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並爭取治理滿洲國的自主性，鄭孝胥搬出中國傳統儒家治國論調中的「王道思想」加以轉化與闡釋，希望建構溥儀與滿洲國的合法性，以正外界之視聽，同時提高滿洲國國民對這個國家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為何鄭孝胥要選擇「王道思想」作為滿洲國的立國準則？他將傳統的王道思想作了何種程度的轉變？與此同時，日本儒學界中也有王道政治思想的論調，鄭孝胥又將如何看待自己的「王道主義」與日本儒學中的「王道政治論」？此外，鄭孝胥在其王道主義中對日本的角色定義，與先前孫中山提出的「大亞洲主義」論調中對於日本之定位，是否有所異同？最後，經過鄭孝胥重新闡釋的王道思想，又是否能夠接受時代與外在環境變動的嚴苛考驗？

四、研究取徑、材料與章節安排

由於本文欲以鄭孝胥的日本觀為中心，來觀察鄭氏對日本觀點的變動過程。故在研究方法上，筆者將藉由分析鄭孝胥在其日記、書信，以及詩作內所記載的內容，來瞭解並建構上述所提及有關於鄭孝胥對日觀點的轉變過程。其中尤以鄭孝胥所記述的《日記》五冊，為本文研究最主要的史料。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領域中，在官方資料與檔案、報章雜誌與期刊等史料以外，一般來說較為重要者當數時人的文集、日記、回憶錄、信箋電函等私人性質的文獻材料。大人物的日記內容通常都會記載國家大政與社會現象的相關資料，即可成為研究當時政情或

社會狀況的重要參考史料。²⁰

鄭孝胥的日記持續了五十七年之久(1882-1938)，前面幾年雖有部分遺漏，但自 1892 年起即完整無缺。長久而連貫不中斷是《鄭孝胥日記》的一個特點。此外，由於鄭孝胥在晚清時期與當時的大吏如李鴻章、張之洞，以及名士如張謇等有所互動與對談，這些互動與對談的內容便可做為瞭解晚清政治局勢與風俗民情的管道。待民國建立後，鄭孝胥投身復辟派，並將其與溥儀和其他復辟派人士的互動記載於日記中，因此欲探查溥儀與復辟派人士的相關事蹟，《鄭孝胥日記》是一個甚有價值的材料。最重要者，鄭孝胥於日記中清楚記載了他對於日本的觀感、與日本士人的交際；滿洲國建立後，由於居國務總理要位之故，鄭氏更在其日記中詳盡記述滿洲國當時的情勢、日滿兩國政府間的互動，以及他施政的理念，對研究滿洲國歷史與當時日滿兩國關係來說，是彌足珍貴的。搭配鄭孝胥關心時政的特點，他還會將當時報章雜誌對於他所留意的時事報導抄錄於其日記中，並加以評論。再者，他對於與其他人物的互動過程與談話內容，也多詳細記載於其日記中。由此觀之，鄭孝胥的日記相當具有史料運用之價值，惟對於其日記記述內容中可能因立場或參與程度的不同，而與事實有所出入，是篩濾史料時所必須審慎考量與甄別的。因此，除了對於鄭孝胥在其日記中所記述之內容，加以整理、比較並分析外，相關的官方檔案、報刊內容，以及與鄭孝胥有互動與交流的他人文字記載或其他性質的史料，都是筆者所必須注重的焦點。藉由以其他相關史料來印證鄭孝胥的說法，將使本文的論點更為清晰、明顯與立體，同時也更驅近於真實。

另外，鄭孝胥的遺民身份也將是本文所關注的一個命題。在民國成立後，依然留存一批不願和民國政府合作的前清官僚。於易代之際，這些人希望將先前的君主專制傳統延續下去，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批擁護君主制的遺民。這個特殊的團體，雖說是「自遺於世」，但他們又難以忘懷於對前朝的追念。追求君主制度的中興成為他們往後的主要目標，等待時機並尋求外界的幫助成為他們進行復辟事業的首要前提。鄭孝胥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被迫轉變身份，從滿清官員變為前清遺老。圖謀故國與再入世俗以謀求政治權位的企圖是否影響到他與日本的互動，並促使他的日本觀出現了轉變？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與關心的。

章節安排上，筆者擬於第二章來討論鄭孝胥如何面對當時中國環境與風氣之劇烈轉變，以及在首次接觸到日本政治、文化與人民後，進而建立與調整自身對日觀點的一個初步過程。於本章節中，預定分為三個階段來談論：第一，先對鄭

²⁰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史料指引》（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0），頁 144-145。

孝胥的家學背景與駐日以前之經歷作一介紹。由於鄭孝胥之父祖均為地方文壇之有名文人，²¹而鄭孝胥的祖籍所在地福建，自宋明朱熹理學以來，又以學風鼎盛、地方教育普及而著稱。²²在家學與地方風氣相互陶冶之下，鄭孝胥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之背景。從《閩侯縣志》對於鄭孝胥之叔祖鄭世恭(1822-1878)以及鄭孝胥之父鄭守廉(1820-1876)的記載，對鄭氏家族重視學風的態度，便可窺知一二。²³此後，會試落第的人生變局對鄭孝胥來說，更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筆者將嘗試藉由鄭孝胥的家學背景，來觀察鄭孝胥的人格特質，與儒家文化對其影響程度的多寡，並試圖瞭解鄭孝胥以何種心境去面對人生首次遭遇的失敗變局。

次之，鄭孝胥於 1891 年，受李經方之薦隨同赴日，任清廷駐日本使館書記官。在駐日四年之中，鄭孝胥結識不少當時寓日的中國士人，以及崇尚中國文化的日本士人。在與這些中、日士人的交遊與詩文交誼中，除使鄭氏能快速融入這個初次拜訪的異鄉國度以外，更使得他對於日本政情、社會與學術狀況有更深的體會，並有助於建立他在日本的人際網絡，這對鄭孝胥未來的人生際遇將造成極大的影響。為了使鄭孝胥的思想與觀點更為突顯，筆者將選擇同一時間曾赴日之中國官吏或士人之作品，如何如璋(1838-1891)的《使東述略》，²⁴黃遵憲(1848-1905)的《日本雜事詩》²⁵與其另一本著作《日本國志》²⁶，黃慶澄(1863-1904)的《東遊日記》等書為例，²⁷來相互比較鄭孝胥與這些士人對當時日本觀感的異同，進而試圖使鄭孝胥對於日本的觀點，與其內在思想的變化過程更為明顯。後來，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無奈時勢轉變的鄭孝胥因而歸國。返國後，鄭孝胥要求清廷持「主戰」立場並力戰到底。筆者將以 1894 年七月的《申報》內容，以及清室朝廷中大臣的言論為例，探究當時中國輿論對於日本的態度，並藉此歸納出鄭孝胥此時對於日本的立場，以及他對《馬關條約》的看法與主張。

本文第三章的時間斷限將以戊戌變法作為起點，而以九一八事變前後做為結束。其中筆者再以辛亥革命為界，將此一時間斷限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筆者將以鄭孝胥生涯中的三個事件為觀察的對象，分別是 1903 年的廣西戍

²¹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頁 1-10。

²² 何綿山，《閩文化概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20。

²³ 陳衍等纂，《閩侯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民國二十二年[1933]抄本），卷 71，頁 20-21。

²⁴ 何如璋，《使東述略》，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²⁵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據光緒二十四年[1898]長沙富文堂重刊本。

²⁶ 黃遵憲，《日本國志》，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²⁷ 黃慶澄撰，陳慶念校，《東遊日記》，收入《蒼南文獻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邊、1909 年赴奉天協助建設錦瑗鐵路，以及 1910 年於中國東北地區爆發的瘟疫為例，來觀察鄭孝胥在這個時期中多變性的日本「印象」，同時尋找鄭氏在這些日本「印象」中觀點與思想脈絡的演變。辛亥革命後，鄭孝胥的身份歷經了一種非他所願的改變：從即將上任的滿清官員，轉變成一個失權沒落的「前清遺老」。為了奉循儒家的「忠君」觀念，並取回失去的權力與政治舞臺，亦盼望君主制能重新恢復於中國，鄭孝胥投身於復辟派。²⁸如同前文所述，復辟派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既非主流，亦不具備群眾的支持。為尋求有力的協助，鄭孝胥逐漸將日本視為可以合作的對象，並轉變他對日本的觀感與態度。筆者擬以溥儀其自傳《我的前半生》、²⁹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之著作《紫禁城的黃昏》，³⁰搭配《鄭孝胥日記》中的史料內容，以觀察鄭孝胥這段時間的日本觀轉變的過程。

在溥儀選擇與日本軍部合作並共同創建滿洲國的過程中，鄭孝胥扮演了相當關鍵性的角色。滿洲國的創立讓鄭孝胥認為溥儀已踏出成功復辟的第一步，並證明他對於清室的忠心未曾改變，更讓他找到了一個期待已久的政治舞臺。從溥儀上任滿洲國執政後即聘任鄭孝胥為國務總理的事實來觀察，可看出鄭孝胥對溥儀的重要性。為了讓滿洲國的情勢更為穩定，並配合當時滿洲國宣揚「種族協和」與融合東西文化的發展方向，鄭孝胥提出儒家思想中的「王道主義」以作為滿洲國的建國方針。在第四章中，筆者將以鄭氏於《日記》中對於其王道主義的相關記述，以及一些相關的零星演講稿作為分析材料，³¹來探討鄭孝胥如何定位他自己的王道主義與日本儒學界中的王道政治論兩者之間的關連性。另外，孫中山在 1924 年於日本演講時揭發他的「大亞洲主義」，其中亦對王道思想做了一番剖析，³²筆者將以兩人對王道思想的解釋內容進行比較，並探討鄭氏如何轉變中國傳統儒家的王道政治思想。鄭孝胥的王道主義，是否真把滿洲國變成了一個如同烏托邦的樂土？此時他對於日本的觀感又為何？通過觀察鄭孝胥在生涯後期中與日本的互動過程，筆者將於本章節中處理這些問題。

²⁸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67.

²⁹ 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7。

³⁰ 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Hong Kong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1934.

³¹ 在滿洲國建立後，鄭孝胥大力推行自己的王道思想主張。例如在演講內容中，鄭氏就甚常提及他對於王道思想的界定與施行的方法。如〈王道內聖之學〉、〈王道廣義〉、〈王道推行之方法〉、〈王道與科學之關係〉、〈王道可望實行之明證〉與〈研究與實行王道之法〉等演說文。參見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局，1989，據滿洲圖書株式會社民國二十七年[1938]刊本影印），頁 58-76；鄭孝胥著，彭述先編輯，《鄭總理大臣王道講演集》，新京：福文盛印書局，1934。

³²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401-414。

第二章 早期生涯與際遇

在晚清文壇、中國近代史與中日近代關係史之中，鄭孝胥實為一位甚為重要的人物。然而後世史家多因他與日本合作的作為，而將其歸類於「漢奸」一類，並給予相當負面的評價與歷史定位。於本章中，筆者將綜合前人學者的研究成果，並分析鄭孝胥青年時期的師友網絡與詩作，試圖探究鄭孝胥於此一時期所面對的變局，以及他首次接觸日本後對這個國家的觀感。次之，筆者將嘗試以鄭孝胥對當時日本之觀感為例，和同處於晚清時期的其他寓日士人的日本觀感加以相互比較，並觀察中日甲午戰爭對鄭孝胥造成的影響，進而探討鄭氏對日本觀感的獨特性。

第一節 家學、科舉與幕客

閩學的興盛可謂福建地區學風鼎盛的主要原因。閩學自北宋起開始醞釀形成，南宋時由朱熹(1130-1200)集其精要而成一學派後，¹福建地區的文化風氣隨之日漸興盛。歷元、明兩代至清，閩學逐漸發展成全國性的重要學派。從明、清兩朝福建士人在當代科舉登科比例甚高的現象，²即可看出福建學風鼎盛，以及閩學對福建地區的深遠影響。再者，自明代起，地方教育不再只是為了中央政府選取傑出人才進入官僚系統而存在，還兼負培養人才與導正鄉里風俗的作用。植基於中央對於教育的重視，明、清兩代的地方教育可謂達到「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之目標。³在學風鼎盛與政府重視地方教育的交互影響下，福

¹ 「閩學」此一名詞始見於明代。針對閩學之定義，學界有數個說法。有學者認為，閩學即朱熹之學說，因此朱熹是閩學的開創者；也有學者認為，閩學的源流自北宋開始醞釀，而朱熹是將其集大成者。筆者認為，閩學是否就指朱熹之學說尚有待學界深入研究，但朱熹使閩學逐漸發揚，而成為全中國之重要思想潮流應可確定。參見：何綿山，《閩文化概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15-17；劉樹勛主編，《閩學源流》（收入許懷中主編，《福建思想文化史叢書》〔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頁 1-3。

² 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和《皇明進士登科考》的資料統計，明代自洪武四年辛亥科(1371)到崇禎十六年癸未科(1643)，共錄取進士 24876 人，其中福建進士共 2417 人，佔總人數約 9.7%，僅次於南直隸(4090 人)、浙江(3458 人)、江西(3117 人)，排名第四。而清代滿漢文進士總數，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的資料，為 26848 名，其中福建進士為 1399 名，佔總人數的 5.2%，次於江蘇、浙江、直隸、山東、河南與山西。參見：多洛肯，《明代福建進士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頁 62-63；李潤強，《清代進士群體與學術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42-49、64-68。

³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點校本），卷六十九，頁 1686。

建地區逐漸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文化精英份子的淵藪。

除了閩學深遠影響與明、清兩代中央政府積極的地方教育政策以外，重視對家族成員的教育也是造就福建地區學風鼎盛的原因之一，而此因素也隨時代遞嬗而益發重要。當家族中有某人因科舉而進入仕途時，為感念家族成員養育之恩，就將自身之學識與經驗往下傳承，此舉非但能體現所學的聖人之道，若族中子弟因此從科舉中脫穎而出進入仕途，還能鞏固並加強家族的社會地位。相對來說，由於中國長期的官僚政治，使得那些任官中、準備為官，或者由官場中退出的人擁有不少特權。特權不僅止於社會地位的改變，生活物質水準的提升、保障並積累財富更是受到重視。⁴基於此點，若家族中已有成員考取功名，除了該成員以外，其他家族成員希望族中子弟能見賢思齊，繼續考取功名的心境可想而知，這也促使他們特別注重家族教育，並督促他們的子弟勤奮向學，為家族謀求更高的地位與更多的財富。這種觀念造就出許多「以習舉業為世業」的家族，而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鄭孝胥，正是出身於此一類型的家族。

咸豐十年閏三月(1860年5月)，當時的江南地區正陷於太平天國所造成的戰禍之中。為躲避災厄，有一家人帶著尚在襁褓中的嬰孩，自蘇州返回福州閩侯故里避難，這個嬰孩便是鄭孝胥。⁵鄭孝胥的家族在當時已可算是一個「以習舉業為世業」的家族。葉參在《鄭孝胥傳》對鄭氏其家世有簡單的描述：

初為大族，世為農，至先生三世祖以官起家……曾祖鵬程，字松穀。

祖世倌，字稼庵。考守廉，字仲廉。⁶

文中只大略描述鄭孝胥的家族自曾祖鄭鵬程始為官並得宦顯，以及其曾祖、祖父與其父親的名號。據《閩侯縣志》記載，鄭孝胥的曾祖鄭鵬程為嘉慶元年(1796)丙辰進士。初任官於戶部雲南司主事，後任江西臨江知府和袁州知府。鄭鵬程有六個兒子，裡頭有四人考取舉人，包括了身為長子的鄭世倌。⁷鄭世倌之弟鄭世恭與其姪鄭守廉還在咸豐二年(1852)同時登科考取進士，鄭守廉即為鄭孝胥之父。從鄭鵬程開始，鄭家代代都有人經由科舉考取舉人、乃至於登科進士，家族重視科舉與教育的程度可見一斑。因此，稱鄭氏的家族為「書香世家」，亦不為過。

⁴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112-115。

⁵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局，1989），頁1。

⁶ 同前註，頁1。

⁷ 陳衍等纂，《閩侯縣志》卷83，（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民國二十二年[1933]抄本），頁339。

根據《鄭孝胥年譜簡編》⁸、《鄭孝胥傳》所述，鄭孝胥自小便甚為聰穎。當他叔祖初次授畢《爾雅》時，鄭孝胥便「輒能上口成誦」，這時候的他才只是個五、六歲的小孩。這種現象到了其少年時期更為明顯，而鄭孝胥在其詩作中也對自己年少時期的過人天分有所記載：

吾年十二熟《儀禮》，闇誦全部色不撓。《爾雅》、《急就》亦宿讀，當時志渠雲等道。⁹

雖然這些描述是出自於鄭孝胥本身，或許會有誇大或溢美之嫌，但他自小天資聰穎應可確定。因此家族中父執輩的期望與喜愛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從未間斷，尤其是鄭世恭，更是全力教導這個聰慧的姪孫。

鄭世恭在鄭孝胥的成長過程中給予相當程度的肯定與欣賞，也為鄭孝胥的人格特質造成了不少影響。天資聰穎的他，學習詩書文禮都比同輩迅速與傑出，這使得鄭孝胥逐漸養成自視甚高的處世態度。自知「余性孤冷，與人落落」的他，¹⁰對旁人的標準極高，甚至是家人也不例外。由於父親早逝，鄭孝胥也肩負起教導家中晚輩的責任。於此，他曾感嘆於家中兄弟無人可與自己相比：

命裡弟默文閱之，機緒略清，而誤用孟子諱。餘曰：「噫，了矣！」復閱仲嘉、蔚懷、輝弟等文，均不佳。料以今春無入學者。輝弟文稍暢，然野甚，多不順處。蓋自餘入學後，於今又三年，無繼起者矣。¹¹

文中提到的「裡弟」是鄭孝胥之弟鄭孝裡，字稚辛，出生於同治元年末(1863年1月)，幼其兄兩歲，¹²鄭守廉逝世後與兄一同受鄭世恭的指導，與鄭孝胥情感相當密切。在鄭孝胥家族的晚輩中，也以鄭孝裡的文筆最好，¹³但鄭孝胥依然認為其弟不夠傑出。家族中其他晚輩的詩文鄭孝胥更是給予「不佳」、「野甚」的嚴格評語，因而感嘆「無繼起者矣」。自此觀之，鄭孝胥的確是不輕易讚許他人的。這與他天資聰穎而自視甚高有所關聯。因此，不論是旁人或是鄭孝胥自己，都認為

⁸ 收入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579-590。

⁹ 鄭孝胥，〈黎受生遺鄭子尹書四種及巢經巢詩鈔〉，收入《海藏樓詩集》，頁22。

¹⁰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82年6月9日條，頁11。

¹¹ 同前書，1882年5月3日條，頁5-6。

¹² 鄭孝裡的卒年不詳。鄭孝裡於光緒十七年(1891)考取舉人後，歷充建造船塢監督兼管船政、浙江知縣、署福建西路觀察使。民國創建後任海軍總司令公署書記官長。

¹³ 錢基博在其作《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評論鄭孝裡有云：「能詩如其兄（指鄭孝胥）。廉悍不如乃兄，然婉約勝焉。」，鄭孝裡詩文的成就，與鄭孝胥的指導不無關係。參見：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收入《國學基礎文庫叢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243。

他是個孤高冷僻之人。而這項人格特質也伴隨鄭孝胥一生，未曾改變。¹⁴

歷經六年多的辛勤習業，鄭孝胥在光緒八年(1882)的夏天接受福州鄉試的考驗。但天氣的燥熱難耐使鄭孝胥甚為苦惱與不適，使他無法完全專心於運思構文上，¹⁵以致寫出的文章「殊不當意，慨然而已」。鄭孝胥認為自己的表現未如己意，自覺上榜無望，連放榜時都意興闌珊，不想前往觀看。但結果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栗哥要余同出觀報，余不往……裡弟午前即往報場，入夜始返，外間報已將盡，僅五經魁未出耳。栗哥亦返，余自意無望，拂帳就寢，未成寐，而呼聲入門，解元之報至矣。¹⁶

對向來自我期許甚高的鄭孝胥來說，考場失利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結果。除了有辱於家族中代代皆出舉人、進士的傳統以外，辜負叔祖的辛勤教導與期望更是讓鄭孝胥有「是天困我耶？」的感嘆。直到放榜之日深夜，當考取鄉試第一的喜訊傳入家門，才使鄭孝胥轉憂為喜，鬱悶盡去。鄭孝胥的寥寥數語深刻點明了他當時的心態，也再現千餘年來受科舉制度影響下，無數讀書人熱切企盼自己能夠「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心情。

清代科舉定制，鄉試結束後的隔年三月必須舉行會試，並於四月行殿試。¹⁷鄭孝胥便赴京參加光緒九年(1883)舉辦的會試。不同於鄉試應考時的殊無把握，鄭孝胥在會試時是甚有自信的。會試結束後，鄭孝胥與同一試場的士人齊聚，並出示自己在考場中所作之詩文，亦得到不少讚賞，這使他更有信心必能登科。¹⁸待當年四月(1883年5月)放榜消息發佈，有別於其他人憂心忡忡，「煩憂形於面，惘惘若有所喪」的失魂落魄樣，鄭孝胥倒是信心滿滿，全不當作一回事。¹⁹但鄭孝胥沒料到，自己居然會名落孫山。這對向來人生坦順的他來說，不啻為一次相當沉重的打擊，同時為鄭孝胥的人生帶來了改變。此一失利迫使他不能藉由科舉的方式順利的進入官僚體系，對此，鄭孝胥自然是相當失望的。於北京鬱鬱然停留了半年後，只能接受其妻舅吳學廉之聘，到江西廬江的岳家「授鑒泉二子讀」。

¹⁴ 楊曉波，〈鄭孝胥詩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頁22。

¹⁵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82年9月19、20日條，頁24-25。

¹⁶ 明、清兩朝正式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級。鄉試考中的稱舉人，而舉人中第一名者即是解元，亦稱解首。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82年7月28、29日條，頁30。

¹⁷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頁38-39。

¹⁸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83年4月22日、23日條，頁39-40。

¹⁹ 同前書，1883年5月17日條，頁43。

這對鄭孝胥來說，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選擇。鄭氏直到光緒十年底(1885年2月)才落寞的返回福州故里，而他也曾在其作品中透露出深刻的失落感：

夢既覺兮心然疑，下匡床兮褰羅帷。有厭厭之絳月，托夜堂而徘徊。
徘徊兮何其怨，綺疏兮天涯。漏促光辰，窗涵影弱，乍訝孤飛，旋
愁將落。²⁰

在落榜到返回故里約一年半的時間中，鄭孝胥自傷未能如願登科，讓他不若以往之自傲，而有「或月許日未嘗出戶」之態。然而鄭孝胥還是坦然接受這一個人生的變局，並未持續消沉下去。與其他士人會文會詩成為他生活中的主要活動和精神寄託。²¹其中他與陳衍(1856-1937)最為契合，²²兩人於光緒九年抵北京後即開始宣揚「同光體」，²³兩人逐漸成為同光體閩派詩人的關鍵人物，而同光體詩派也在兩人的討論與倡導中茁壯，成為晚清詩學的主要流派。唯晚清詩學流變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在此不贅。

獲悉鄭孝胥無法由科舉晉身仕途，只能回到福州韜光養晦的消息後，同鄉的陳寶琛(1848-1935)便欲將他推薦至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1837-1909)幕下。²⁴但鄭孝胥希望北行，陳寶琛因此決定薦鄭孝胥往謁李鴻章(1823-1901)並任其幕客。²⁵適巧鄭孝胥與李鴻章的家族成員有姻親關係，²⁶又以文才聞名，因此李鴻章對鄭孝胥投入自己幕下的選擇是樂觀其成的。在鄭孝胥在李鴻章幕府時期的活動中，除了與好友討論詩文與觀書心得、為李鴻章提出建議、制定策略以供參考以

²⁰ 鄭孝胥，〈擬謝靈運怨曉月賦〉，參見梁啟超主筆，吳貫因主編，《庸言》第2卷第3號（收入《民國珍稀期刊·庸言》第10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頁5155。

²¹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頁30。

²² 陳衍，字叔伊，號石遺。二十六歲舉鄉試，曾入劉銘傳、張之洞之幕。戊戌政變後倡導西學，望以其振中國之實業，1916年受邀總纂《福建通志》。陳衍詩學經博，善於評論當世文人詩作，更與鄭孝胥創建「同光體」詩派。

²³ 同光體，近代詩派之一，「同」和「光」是由清代同治和光緒這兩個年號而得名。同光體詩以學宋為宗，以生新為貴，以奇險為尚，提倡「詩人之言」與「學人之言」的結合。分為閩派、贛派與浙派三大支，贛派代表人物為陳三立，浙派代表人物為沈增植。參見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上冊，頁67。

²⁴ 陳寶琛，字伯潛，號弢庵、陶庵，福建閩縣人。同治七年(1868)進士，歷任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與張之洞等同稱「清流黨」，勇於諍諫。後於1911年任宣統帝溥儀之帝傅，清帝遜位後仍留清宮，並參與張勳復辟。

²⁵ 「幕府」即指地方官員私下聘用參謀人員的制度。在中國歷朝中，以清代最為盛行。幕府的成員通常被稱為「幕客」、「幕友」，主要目的是為聘請他們的官員出謀策劃、掌訴訟歲收、監控胥吏以防其營私舞弊，以及在為人處事上勸誡幕主等等。參見Folsom, Kenneth E.,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48-52.

²⁶ 鄭孝胥於1879年娶時任福建船政督辦的吳贊成(1823-1884)二女為妻，而吳贊成的長子與長女均與李鴻章之家族成員有婚姻關係，因此鄭孝胥能進入李鴻章幕府，以及隨李經方出使日本，與這層關係不無關聯。

外，他與外國使節的互動更值得注意。由於李鴻章當時為直隸總督兼總理衙門北洋通商大臣，因此必須處理上海以北所有條約口岸的對外通商事務，以及同外國使節討論並裁定地方性問題等。²⁷在處理這些對外問題的過程中，必然會與外國使節有所互動與接觸。由於公務繁多，李鴻章在鄭孝胥入幕後不久便要他為自己處理外國事務。正因如此，鄭孝胥得到與這些外國使節或辦事人員聯繫的機會，同時還可接觸他們的文化與思想。鄭孝胥曾將與當時天津海關稅務司，來自德國的德瑾琳(Gustav von Detring, 1842-1913)的對話加以記載，²⁸正可作為一個觀察當時鄭孝胥如何評論西方思想的材料：

晚，德瑾琳來。德言，德皇之才，泰西諸國皆服之。對曰：「西國尚智能，智能勝者則服之；中國不尚智能，名分在者則聽之。此中西之所以異也。」²⁹

德瑾琳與李鴻章交情匪淺，在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期，自始至終都與李鴻章保持著密切的聯繫。³⁰因此鄭孝胥與德瑾琳有機會能夠互動對談並討論時事。在某次談論到彼此國家領導人的才能對話過程中，由於德意志帝國(1871-1945)方盛，³¹德瑾琳便自豪德皇以才幹而使歐洲各國服膺之。然鄭孝胥卻以中國的名分大義加以反駁，並以「此乃中西文化的差異之處」為論，暗地諷刺西方文化的粗蠻與落後。以此為例，便可瞭解當時鄭孝胥對於西方文化的立場與態度。大體來說，這個時候的鄭孝胥依然持有「天朝觀」的觀念，認為自幼及受到其薰陶的中國儒家文化，是比西方要來得優秀的。這也是當時中國士人對於西方文化與思想的普遍性立場。

與西方人物的接觸讓鄭孝胥有了瞭解洋務的機會，但能與幕府中其他通達識體、瞭解洋務的幕客進行談論與互動，才真正拓展了鄭孝胥的視野。自同治九年(1870)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開始，李鴻章對於通曉洋務的人才亟亟以求。然而當時中國士人多還是將科舉登科作為首要目標，願意瞭解西方思想，學習西方技術的

²⁷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一個新政策的呈現，1870-1875〉（收入劉廣京、朱昌峻編，陳絳編校，《李鴻章評傳—中國近代化的起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58-90。

²⁸ 德瑾琳於 1864 年抵達中國，自 1877 年至 1904 年之間先後三次擔任天津海關稅務司的職務，因此與李鴻章建立友誼，並參與許多中國外交上的事務。後受清廷總理衙門之請託，創建了中國郵政，並大力建設與擴展英國在天津的租界設施。1913 年於天津逝世。

²⁹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85 年 9 月 17 日條，頁 71。

³⁰ Folsom, Kenneth E.,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pp. 153-154.

³¹ 在普法戰爭獲得勝利的普魯士王國於 1871 年統一當時德國諸邦，成立德意志帝國。此後德意志帝國在德皇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與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領導下，成為當時歐洲強權，並於 1882 年 5 月與奧匈帝國、義大利訂立「三國同盟」(Dreibund)，加強鞏固德國在歐洲的地位。

人實乃稀少，因此李鴻章曾有「但有貝之財，無貝之才，不獨遠遜西方，抑實不如日本」之言，³²感嘆當時中國缺乏瞭解洋務士人的窘境。有鑒於此，李鴻章更是致力於聘攬懂洋務的中國士人入幕，並以他的幕府來當作一個培養人才及學習西方思想與技術的環境。近程目標是為解決缺乏瞭解洋務人才之難題，遠程目標則是為了國家來儲才，以備所需。推動幼童留美此一政策，正是李鴻章亟欲培養洋務人才的具體表現。待這些學生被命令返國後(1881)，許多人都進入了李鴻章的幕府，而李鴻章也將洋務事宜都交給他們來協助理。其中，後來成為李鴻章機要秘書、翻譯和內勤總管的羅豐祿(1850-1901)因與鄭孝胥同鄉，³⁴所以與鄭孝胥最為交好。羅豐祿由於幼年留學海外，英文能力甚優，然受傳統詩學的薰陶未如鄭孝胥之深，因而時常請教鄭孝胥撰文、為學之方。在兩人切磋時，或多或少也談論到西洋列國的狀況與局勢，能讓鄭孝胥對於當時世界的局勢有更多的了解與認識：

午后，稷臣來，譯中堂與英印度輔政司接談語，道緬甸構兵及西藏通商事，傍晚方去。³⁵

此篇內記的內容發生於 1885 年 11 月，時值英國出兵緬甸，³⁶並欲清廷開放西藏通商。³⁷李鴻章希望與英國方面商談，使事態不致於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於是李鴻章的幕客成員，因此鄭孝胥能夠相當迅速的獲知當時國際間的時勢與事

³² 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0)一封給曾國藩的書信中提到當時中國欲行西化，必須先解決人才過少的問題。參見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二十八年[1902]鉛印本），卷 14，頁 586。

³³ Folsom, Kenneth E.,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pp. 138-139.

³⁴ 羅豐祿，字稷臣，與嚴復同為首批赴歐留學的學生。光緒六年(1880)返回中國後，成為李鴻章的外交顧問兼翻譯。1896 年被任命為駐英公使，1901 年改任駐俄公使，同年病故。

³⁵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85 年 11 月 25 日條，頁 79。

³⁶ 緬甸是清代朝貢體系的成員之一。1824 年，由於緬甸王國的擴張政策與東印度公司發生衝突，英國派兵攻擊緬甸，是為第一次英緬戰爭。1852 年兩國再度發生戰爭，緬甸不敵。十年後兩國簽訂了條約，英國可在緬甸通商。1885 年因緬甸未守條約內容，再啟戰端。隔年英國併吞緬甸，宣布緬甸為英屬印度的一省。清廷基於對緬甸的宗主權，向英國抗議，但也並未派兵加以阻止。後雙方於 1886 年 7 月簽訂《緬甸條約》，清廷承認英國併吞緬甸的事實，而英國允許緬甸美食年向清廷進貢一次。不過此後緬甸進貢也僅止於 1895 年那一次，再無進貢之舉。

³⁷ 在肇因於「馬嘉理事件」(Margary Incident, 1875)而簽定的《煙臺條約》之附件《另議專條》中，清廷便已允許英國可從北京派人經甘肅、青海和四川進入西藏，或由印度進入西藏。但此一規定受到西藏人民的堅決反對，因此英國並未派人進入西藏。1886 年，英國組成探險隊進入西藏。此時英緬第三次戰爭才剛結束，英國帶兵進入西藏不免引起清廷的疑慮，希望英國能暫時停止進入西藏。後中英雙方達成協議簽訂《緬甸條約》，清廷承認英國併吞緬甸，而英國也答應暫時停止派員進入西藏的行動。

件，並且為李鴻章策劃計謀以供應對。這對於鄭孝胥來說影響甚為深遠。除了能自其他幕客那邊獲悉世界局勢以外，更可貴者在於增加他處理與西方各國相關外交事務的寶貴經驗。爾後鄭孝胥能夠赴日，便與此經驗有相當程度之關聯。

綜合言之，鄭孝胥出身於學風鼎盛的福建地區，自小即受家學薰陶，加上天資優穎，因此受到相當程度的欣賞與期待，其中又以叔祖鄭世恭對他的影響最為深遠。於鄉試中順利考取解元的鄭孝胥，卻無法於會試中登科，這對他造成了不小的打擊，而鄭孝胥欲入官途一展抱負的理想也暫時受到阻撓。但因陳寶琛的推薦，以及姻親關係，鄭孝胥遂投李鴻章幕下。在為期約四年的幕客生涯中，鄭孝胥頻繁的與外國使節或人員互動，並首次接觸西方文化與思想。而鄭孝胥從其他幕客處所獲得的初步國際觀，以及協助李鴻章處理洋務的寶貴經驗，都是他未來能受到推薦擔任駐日人員的重要原因。

第二節 「此風既東來」：「師日」、「仿日」與「輕日」

自 1889 年以後，由於鄭孝胥考取內閣中書，後又改官同知而分發江南，因此他的活動範圍便從福州轉移到江蘇、南京一帶，並與當地有名的士人交遊。³⁸例如先前與鄭孝胥僅有書信往來的張謇(1853-1926)，便於此時與鄭孝胥有甚為頻繁的交誼和往來。³⁹除了與士人交遊以外，鄭孝胥依然對時政保持高度的注意，也評論清廷「朝政之弛，黯然不能為懷」，⁴⁰對國家前途多舛的情勢感到憂心。翌年(1890)，鄭孝胥又返北京充鑲紅旗官學堂教習。⁴¹一心想要施展抱負的鄭孝胥對此職位自然感到不滿，一事無成的鬱悶更使他感嘆有志難伸：

署中時來云，某日當趨公。賃車便應去，車聲何玲瓏……笑談破無俚，神情終囁囁。說歸漸可厭，畫餅飢豈充。回頭看庭樹，誰能送飛鴻？⁴²

令鄭孝胥感到鬱悶的官學教習生涯持續了約一年有餘。此時，一道請調的奏摺卻使鄭孝胥的人生大為轉變。在光緒十六年七月(1890 年 9 月)被任命為出使日本大

³⁸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 2。

³⁹ 張謇，字季直，號啬庵，江蘇南通人。四十一歲(1894)登科，授翰林院修撰。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決心以實業與教育交相為用，挽救中國之危局。原支持君主立憲，民國成立後轉為支持共和。後返鄉致力於實業、教育、文化、慈善、水利與交通等事業，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與實業家。

⁴⁰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89 年 3 月 9 日條，頁 135。

⁴¹ 楊曉波，〈鄭孝胥詩歌研究〉，頁 23。

⁴² 鄭孝胥，〈家書至卻寄〉，《海藏樓詩集》頁 7。

臣，同時也是李鴻章嗣子的李經方(1855-1934)，奏調鄭孝胥東渡日本出任駐日本使節館的書記官。⁴³鄭孝胥之所以能得到李經方的推薦，與其曾入李鴻章幕府頗有關聯。由於鄭孝胥於任李鴻章幕客時積累不少處理洋務，以及與外國人員交涉的經驗。因此既有文采與實務經驗的鄭孝胥，自然成為即將出任駐日大使的李經方希望招攬的人才，這也使得鄭孝胥能夠脫離「從嘲先生癡，涸轍枯微官」⁴⁴的苦悶生活，進入一個從未到過的新國度。

光緒十七年四月(1891年5月)登船離開上海後，途經長崎、馬關、神戶等地，鄭孝胥於四月底抵達使節館的所在地橫濱。甫抵目的地的鄭孝胥，初次接觸當時正值明治維新而全力西化的日本。因看到許多平生未見的新奇事物而大開眼界，⁴⁵而有「豪舉京華在眼前，誰知海外有今年」之感。⁴⁶就《日記》中內容觀之，鄭孝胥雖出任書記官，但工作並不算太過繁重，主要就是替李經方撰寫公文，以及回復信件的工作。如此一來，也使得鄭孝胥有較多的時間能觀察日本的政經現況與西化思想對日本之影響。也因工作性質的緣故，讓鄭孝胥還能結識不少當時寓日的中國士人，以及崇尚中國文化的日本士人。在與這些士人的交遊與詩文交誼中，促使鄭孝胥能藉其深入瞭解日本的政治狀況與文化水準，並初步建立他在日本人際網絡之基礎。這對鄭孝胥往後的生涯，具有深遠的影響。

由於當時的日本正逢明治維新，力求西化，這使得鄭孝胥在日本有更多機會來觀察、研究西方文化與思潮對這個國家的影響。一開始，鄭孝胥先從日本書籍來增加對於這個國家的認識。他或買或借，收集到《明治時勢史》、《明治開化史》與《日本外史》等書來研讀，並「編紀其事」以供未來參考之用。⁴⁷為了更深入的探究西方文化與思想，鄭孝胥還聘請一位通曉洋文的中國士人來幫助他學習英文，並向這位中國士人提到當時中國只重西方文化的表面，卻不注重瞭解西方文化思想源由的歪風：

中國風氣，懶而無恆，所以不振。君在歐洲久，但學歐人之勤與信與知大體，則為得其大矣。世習洋務，為得其脫帽、執手、啖洋菜、呂宋菸耳，宜其為歐人所輕也。⁴⁸

⁴³ 李經方，字伯行，號端甫，安徽合肥人，生父為李鴻章的六弟，後過繼給李鴻章為嗣長子。1890年被任命為出使日本大臣，甲午戰爭結束後與其父赴日議和，並簽訂馬關條約。後出任駐英大使、郵傳部左侍郎等職。

⁴⁴ 鄭孝胥，〈官學雜詩〉，《海藏樓詩集》頁5。

⁴⁵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1年6月9日條，頁204。

⁴⁶ 鄭孝胥，〈八月二十六芝口張飲〉，《海藏樓詩集》頁15。

⁴⁷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1年6月20日條，頁210。

⁴⁸ 同前書，1891年6月13日條，頁206。

這番話點出了鄭孝胥對於當時中國只效法西方「船堅砲利」的不滿。清廷雖推行自強運動，然而僅重視西方列強興盛的表面，以為只要學習表面皮毛就可如同西方國家一樣強盛的膚淺想法，終將「為歐人所輕」。鄭孝胥也了解，唯有學習西方列強講求勤奮、信用，與長遠眼光的態度，才能導正中國長久以來「懶而無恆」的敗壞風氣。基於此理由，鄭孝胥更欲瞭解日本何以西化如此成功的原因。待徹底瞭解其原因後再加以效法，就可使中國成功西化而富強，他也自詡能為中國找到這個關鍵所在：

中原民情弊，隱患在心腹。此邦俗亦偷，交誼聊云睦。誰能任茲事，
起造斯世福。微官欲何道，一飽解千辱。⁴⁹

在此段詩文中鄭孝胥清楚表明自己觀察日本西化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讓中國的人民能夠擺脫落後西方各國的困境。進一步分析他的詩文可以得知，鄭孝胥認為日本雖是一個民風淺俗的國家，不若自己祖國的文化那麼淵遠流長。但只要能從與日本官員或的士人交誼互動中，來瞭解他們能夠成功西化的原因，「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就能為中國萬千的人民帶向富強康樂的未來。而他也認為自己能夠負起這艱困的責任，有著「縱有千辱吾亦往之」的堅定決心。

鄭孝胥的作為與決心很快就受到李經方的重視，並認為鄭孝胥「顧諸友皆文人，不諳公務，唯足下可為之助耳」，⁵⁰對其器重的程度可見一斑。此後李經方更為信賴鄭孝胥，並將其升為筑地大阪副領事，⁵¹派任他作為代表，以與日本文人進行品評詩文的活動。事實上，自 1871 年中日兩國正式建交起至 1890 年代初，中國所派遣的駐日代表多是能文善詩工書法的文人學者，因此當時的中國駐日使館對日本愛好漢學士人來說，就是交流中國漢學的最佳場所。⁵²如此一來，在與日本文人詩酬唱和的文化交流活動中，鄭孝胥便得以有機會接觸到日本當時對中國漢學有濃烈興趣的日本文人。不過時值明治維新的日本卻因全力推行西化運動並提倡西學，導致中國漢學在日本學術界的影響不若以往之深遠。但部分依然崇敬中國漢學的日本士人還是渴望能自與中國士人的互動中，汲取中國的文化。⁵³因此鄭孝胥在與日本士人的互動過程，多是日本士人詢問他有關於中國傳統文

⁴⁹ 鄭孝胥，〈立秋永田町日枝山下新居作〉，《海藏樓詩集》頁 20。

⁵⁰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1 年 6 月 27 日條，頁 212-213。

⁵¹ 秦國經主編，唐益年、葉秀雲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六冊（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265。

⁵² 王曉秋等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歷史卷》（收入周一良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頁 284。

⁵³ 王寶平，〈晚清文人與日本—光緒年間寓日文人考〉，《日本學刊》，1998 年第 4 期，頁 148。

化，或是中國文學、詩文之類的疑問。針對這些問題或要求，鄭孝胥也頗樂於回應。他曾在一封與日本漢學士人來往的書信中回復道：

聞欲以大稿見示，極所樂讀。僕治詩十餘年，略有所得。見貴國士人才氣足用，欠講求耳。因足下發其鄙論，或可稍振風氣。⁵⁴

除了樂見部分日本士人依舊景仰中國的漢學文化以外，這段文字更見鄭孝胥那種欲以自身才學「指導」日本士人文風的充份自信。前文提到，鄭孝胥在中日兩國文化的比較上，存在著甚為明顯的優越感。在他的觀念中，日本雖然已成功推行西化，同時也收到可觀的成果，這值得中國參考並加以學習。但在文化方面來說，日本依舊比不上中國。對於日本文人作品，鄭孝胥是毫不留情的加以批評：

日人譯著《高松保郎斷腕記題後一首》，丐〔蓋〕欽差評覽者，其文殊無法意，故此都之名宿也。⁵⁵

他在詩作中也透露出對日本士人作品水準的不以為然：

此都號文士，浮躁多不實。盛名如賴襄，語助未究兮。⁵⁶

文中提到的賴襄(1781-1833)是日本甚有名氣的文學家。他以二十餘年精力寫作而成的《日本外史》(1826)，對德川幕府末期的思想影響良深。從時人論賴襄為「三百年來古文家領袖」的說法，⁵⁷不難看出賴襄在日本文學史上的成就與地位。然而鄭孝胥仍對其作品加以嚴詞抨擊，並認為這些日本漢學士人的才學甚為不實。如遇有日本士人批評中國儒家文化，鄭孝胥更是難以苟同，在鄭孝胥的思想體系中，儒家文化是不容批評與挑戰的。曾有日本士人在詩作中批評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學思想已然落後，不需重視，鄭孝胥給予義正嚴詞的反駁：

貴國自改學西法以來，蒸蒸日上，漸即富強，極為可喜。然漢學益衰，時務之士恨不舉而廢之。時務之士之輕漢學久矣，亦由吾黨學者多浮薄自喜之徒有以招侮也。足下自今以往，如能立身于敦厚，益為有體有用之學，勿徒以一得自矜，則貴國之漢學或可振于既

⁵⁴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1年8月29日條，頁229。

⁵⁵ 同前書，1891年7月19日條，頁218。

⁵⁶ 鄭孝胥，〈冬日雜詩〉，《海藏樓詩集》頁25。

⁵⁷ 賴襄，原名久太郎，字子成，號山陽。父親是有名的漢學家賴春水。對史學、文學、經世致用之學都有深厚的興趣。其著作有《日本外史》與《日本政記》等，黃遵憲稱其「國人無不知其名，三百年來古文家之領袖也」。參見關儀一郎、關義直共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東京：琳琅閣書店，1981），頁563。

絕，一洗時俗之詬病，固大善矣。⁵⁸

緊扣「因行西法而輕漢學」的論點，鄭孝胥說明日本因遽行西化而忽視中國儒家文化的缺失。隨著明治維新運動的開展，日本逐漸走上獨立發展的近代化道路，整個日本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並帶來了富強與繁榮。但鄭孝胥認為過度快速的西化，會讓日本人民驕矜自得，並忘卻影響日本更為長久的中國漢學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鄭孝胥在他的論點中還諷刺某些中國文人並未做好宣揚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責任，反倒成為日本重西化而不重中國漢學文化的幫兇。他認為，不論是「恨漢學不舉」的日本士人，或是「好浮薄自喜」的中國學者，都應該學習敦厚的立身態度，感受以德化教人、「有體有用」的中國儒家學術思想，才是處世為學的根本之道。

光緒十八年(1892)初，鄭孝胥因岳母之喪而返回中國，半年後再度赴日。翌年(1893)受新任日本出使大臣汪鳳藻(1851-1918)之薦，⁵⁹再由筑地領事升任為神戶大阪總領事。⁶⁰鄭孝胥任此職位後，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八月清廷因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被召回為止，再無變動。鄭孝胥二次抵日後，他與日本文人詩文唱酬的活動漸少，取而代之的是處理駐日華僑之間，或是駐日華僑與日本人民的民事糾紛。⁶¹雖然無法如同任書記官時期那樣進行文化交流，但藉由積累處理民事案件的經驗，也讓鄭孝胥能以不同的角度去認識日本。加之駐日時間益久，均促使鄭孝胥對於日本的政局與民情有了更進一步的體認與瞭解。此後，鄭孝胥將審視的眼光放大到對日本整體政局的觀察，也就是不再將焦點僅聚焦於因推行西化而漠視中國漢學的文化層面，而是開始批評明治維新推行西化的整體成敗得失。此外更以日本的西化為例，對這些西化政策加以分析，甚至探討民主觀念是否適用於當時的中國。針對這些問題，鄭孝胥曾以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而在光緒十五年(1890)設立的日本帝國議會其發生的亂象為例，⁶²來論述推行西化對日本政局的影響：

⁵⁸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3年1月7日條，頁334。

⁵⁹ 汪鳳藻，字雲章，號芝房，江蘇元和縣人。同治二年(1863)入上海廣方言館英文班，成為清朝培養的第一批外文學生，學成後開始翻譯西方有關法律與經濟的著作。光緒十七年(1891)汪鳳藻被清政府任命為使日大臣，隔年赴日。1894年因甲午戰爭爆發而歸國。

⁶⁰ 秦國經主編，唐益年、葉秀雲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六冊，頁265。

⁶¹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頁51。

⁶² 為因應自1880年開始風行的「國會開設請願運動」，於1888年2月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正式賦予日本國會設置的法源依據，並得以辦理大選選出議員。但國會開啟後，追求富國強兵的明治政府與主張節減經費的議員為經費問題出現對立，進而造成社會風氣浮動不安。後明治政府因此解散國會並重新選舉議員。

既而議員欲節國費，與政府不合，於是罷議員之至者數百人，遣大臣布告國中，約以五月后更舉議員。民間大嘩，益欲與政府為難，黨人相持，從而煽動……國中之得民望者，皆不主西法者。如此數人執政，而亂可弭，猶為幸也，但恐一動而難遏耳。余曰：「天敗之以為學西法者之戒，未可知也。」⁶³

明治維新的序幕開啟之後，日本的有識之士大多渴望新政府能一掃過去德川幕府時期封建體制的弊害，轉為實行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度。但此要求並未隨即被明治政府接納。因此，以要求日本明治政府設立國會，以及盡速實行君主立憲制為訴求的自由民權浪潮便如火如荼的展開。直至 1890 年，明治政府正式設置國會，成為亞洲最早的立憲政體國家後，日本才逐步走向君主立憲與內閣制的政治體制。鄭孝胥觀察日本國會議員、政黨與政府的對立，以及政黨政治的情形，並認為此一現象將是造成日本政局動盪與否的重要關鍵，還評論這是「學西法者之戒」。由此觀之，這時候的鄭孝胥對於君主立憲、國會制度是否能適用於中國，抱持著保留的態度。事實上，針對當時日本的民權熱潮，鄭孝胥並未給予肯定的評價。他與友人曾有一番對話：

余語曰：「中國能改為民主乎？」對曰：「不能。」余曰：「君臣上下乃數千年相承之禮。中國以億兆人而奉一人，皇帝之貴，不亦宜乎。」⁶⁴

鄭孝胥在此段對話中，明白提出民主不適用於當時中國的看法。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奉皇帝為廣大人民之上的傳統。若貿然實施西化民主，除了違背傳統，無益於政府或君主的權力之提升，更有可能使中國政局如日本一樣，混亂而不可收拾。這並非中國所需要的富強之方，更非萬千黎民之福。

不僅止於評論日本的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鄭孝胥更是把觀察的觸角延伸到日本的貿易、交通、乃至於教育制度等等，以探究日本在推行西化於各層面後的影響及其利弊，並加以分析。鄭孝胥在他的觀察中認為，日本推行西化的關鍵在於以工商來做立國之根本。廣造鐵路與設置新式學校，均是以使工商業發達，或是培養新式工商業人才的前提下而實施的整體政策。⁶⁵這些都是日本物質文明水準突飛猛進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國欠缺的、需要效法的。鄭孝胥在其詩作中，更是呼籲中國須盡速效法日本以工商立國的態度：

⁶³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2 年 1 月 3 日條，頁 260-261。

⁶⁴ 同前書，1891 年 11 月 28 日條，頁 252。

⁶⁵ 鄭孝胥曾與友人提及他對於當時日本的整體觀察及其評論，這些內容筆者將於第三章提及。

運會今何世，更霸起西方。誰能安士農？為聞逐工商。賈胡合千百，
其國旋富強。此風既東來，凌厲世莫當。日本類兒戲，變化如風狂。
天機已可見，人心奈披猖。⁶⁶

文中鄭孝胥再次強調工商立國的重要性。他認為，崇尚工商的風氣是世界局勢的潮流，清廷政府與中國士民必須重視這個現象。這種重商主義的眼光，也是當時改良主義派的中國士人所抱持的共通觀點。⁶⁷從詩文中亦可看出鄭孝胥還是存在著輕視日本的觀念。雖說日本已經開始實施西化，他還是認為日本對於西化的各項措施依舊不夠成熟。但如此「兒戲」的態度，卻帶來相當程度的進步與改變。倘清廷能結合固有的漢學文化優勢，再推行西方列強工商立國的精神，如此方式下所推行的西化，才能獲得效果。從前那種只是學習「得其脫帽、執手、啖洋菜」表面功夫的作法，終將會被淘汰。不過，鄭孝胥在詩文中只論述西方列強重視工商商業的經濟層面，並無提及西方的民權運動、設置議會與君主立憲政體等政治現象。這與他反對在當時中國設置議會或實行政黨政治的立場是相互呼應的。⁶⁸

綜合以上論述，鄭孝胥對於這個首次接觸的國家之觀點，可歸納成下面數點：第一，他同意日本推行西化是成功的，但僅止於物質生活的進步，與其以工商立國的態度。鄭孝胥認為，日本知識份子因政府推行西化，而捨棄了長久以來影響日本深遠的中國儒學文化是不恰當的。中國的文化淵遠流長且德化遠播，並不是重視工商的西方文化可以比擬。在其言論中鄭孝胥多次強調，日本應該遵循中國儒家漢學文化的內涵，輔以西方文化的工商立國思想，才是實行西化的最佳方法。自此也可看出鄭孝胥在中日兩國的文化比較上，其立場依然是抱持著中國文化較為優秀的論點。第二，承續著中國文化較為優越的看法，鄭孝胥認為當時的清廷並未自思想體制為出發點來實行西化，而只是學習西方列強的表面事務，才會被日本給超越。他還認為，日本推行西化取得成功者多為物質文明方面。至於有關制度文明的西化措施，如日本政局因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所出現的情形，他並不認同，並推論此現象將成為評斷日本整體西化是否成功的關鍵，也是清廷欲行西化時必須注意的要點。由此可以看出，鄭孝胥並不認為議會與政黨政治能適用於當時的中國政局。

⁶⁶ 鄭孝胥，〈冬日雜詩〉，《海藏樓詩集》頁 24。

⁶⁷ 鄭海麟，《黃遵憲傳》（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95。

⁶⁸ 此時因革命派力量尚為薄弱，以致於鄭孝胥還未強烈感受到革命勢力的威脅，所以他不支持改為君主立憲。但至 1905 年同盟會成立後革命勢力大興，感到威脅的鄭孝胥於是開始倡導立憲運動，企圖以較為溫和的方式來達成清廷的革新，並在 1906 年 11 月與張謇等人於上海設立「預備立憲公會」，以與革命勢力進行對抗。參照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5），頁 7-8。

鄭孝胥此時的日本觀點有其特殊性，而將其觀點與同時期曾經寓日的中國士人，以及與當時身處中國的官吏與士民的觀點加以相互比較，可使鄭氏對於日本此一國家的觀點更為立體與清晰。從光緒三年(1877)清廷首次派遣駐日使節團起，中國對於日本的知識與觀感就不再是較為片面與零碎的。身為首任出使日本大臣的何如璋(1838-1891)，以及使節團參贊的黃遵憲(1848-1905)，他們都肩負著鞏固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與觀察日本政治局勢、經濟交通與風俗民情的重要責任。⁶⁹以往中國若要認識日本，主要的管道無非是藉由曾赴日本人士所帶回來的資訊，或者是部分介紹日本的著作與詩歌的內容。介紹日本的相關書籍在清朝中葉開始出現，然因其作者多未親臨日本觀察，只能憑當時口傳資訊或因襲舊說，綜其想像而編之。在如此方式下所編寫的文字內容，訛誤百出的情形是無可避免的。⁷⁰直到何如璋與使節團成員赴日後，他們將其所目睹之景象寫為考察記、遊記等作品以後，中國才開始真正的認識日本。比如何如璋將其見聞撰寫成《使東述略》，黃遵憲則詳述對於日本的研究，以寫成《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這些作品均為作者親身所歷，其正確性與可靠性自然大為提高。而這些作品的文字內容，正是研究當時中日交流與中國士人對日本觀感的重要材料。筆者也將以何如璋與黃遵憲兩人為當時寓日中國士人之例，嘗試比較此兩人對於日本之觀感，並探究這些觀點與鄭孝胥觀點的異同之處。

何如璋於光緒三年(1877)的十一月抵日，正逢明治政府欲以推行西化來改造傳統日本的初期階段。因此西方文化與日本傳統漢學價值觀的碰撞與摩擦現象，自然也會比鄭孝胥駐日時期來的更為明顯。此一現象引起了何如璋的注意與關切，對此他有所評論：

近趨歐俗，上自官府，下及學校，凡制度、器物、語言、文字，靡然以泰西為式。而遺老逸民，不得志之士，尚有敦故習、談漢學、硜硜以舊俗自守者，足矜已。⁷¹

來自中國的何如璋，見到日本雖處於全力推行西化的風潮中，但仍有士人對西化風潮不以為然而依舊重視中國漢學的情形感到甚為自得。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現象與鄭孝胥如出一轍。他認為日本雖全力推行西化，但思想體系與文化價值應

⁶⁹ 何如璋，字子峨，廣東大埔人。同治七年(1868)進士。光緒三年(1877)以李鴻章之薦任出使日本大臣，五年後卸任。在日期間多辦理琉球交涉，格於形勢，未能有所作為。返國後任福建船政大臣。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慶人。光緒二年(1876)中舉，隔年東渡日本，任駐日本使館參贊。後歷任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駐新加坡總領事。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出使日本大臣。後返國參與戊戌維新運動。戊戌政變後辭官返鄉，光緒三十一年(1905)病逝。

⁷⁰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73。

⁷¹ 何如璋，《使東述略》（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頁27。

該繼續依循著中國的漢學文化與儒家思想。造成如此心態的原因，可將其解釋為由於中國曾於唐宋時期創造璀璨的文化，並對周邊各國造成深遠的影響。如今，中國依然為泱泱大國，因此鄰近中國的日本還是必須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才有助於日本的發展。這是一種文化上的「自負」心態。⁷²

除了中國儒學在日本的定位以外，對於西化風潮的莫可抵禦，並感日本因西化而使國內的物質文明有突飛猛進之狀，何如璋的看法與鄭孝胥頗為相近。他曾提到西化的風氣是時局所致，「風會所趨，固有不克自主乎」，⁷³而日本正是順應此波風潮而做出變動。在《使東述略》中，何如璋以甚多篇幅提到當時日本因推行西化有成，使得交通、教育、軍事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他也提到中國必須要把握這波西化的風潮，加速實行培養人才、充實軍備、整飭吏治等政策。若還是如同先前所保持的苟安心態，不肯正視西方列國強盛的事實，中國將失去強盛的機會，「殆非所以安海內、制四方之術也」。⁷⁴領導地位也將不保，轉為被日本取代。這與鄭孝胥對於日本的觀感甚為契合。不過兩人對於日本能夠成功推行西化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釋。鄭孝胥認為日本明治政府學習到西方以工商立國的精神，輔以優秀人才制定國策，其國勢自然蒸蒸日上而漸富強。然何如璋將日本能夠推行順利西化的因素歸咎於「時機」與「趨勢」。⁷⁵他認為日本把握了此一時間點，才能獲得成功：

德川氏狼狽失據，武權日微；而一二幹濟之才，遂得乘時以制其變，強公室、杜私門、廢封建、改郡縣，舉數百年積弊，次第更而張之，如反手然，又何易也……抑時事之轉移，固自有其會耶？此不可得而知之矣。⁷⁶

文中可以清楚看到何如璋將日本的轉變歸功於代表時機的「會」，對於日本效法工商立國精神的態度卻無提及，這與鄭孝胥的觀點是有所差異的。再者，由於何如璋駐日時，明治維新尚處於初步推行的狀態，日本政局也剛脫離戰爭的混亂而恢復平穩，⁷⁷很多西化的措施與制度還未步上軌道，遭鄭孝胥頗多批評的日本議

⁷² 黃福慶，〈論中國人的日本觀—以戴季陶的「日本論」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頁64-65。

⁷³ 何如璋，《使東述略》，頁21。

⁷⁴ 同前註，頁17-18。

⁷⁵ 鍾叔河，〈甲午之前的日本觀〉（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1冊），頁62。

⁷⁶ 何如璋，《使東述略》，頁23。

⁷⁷ 由於明治維新提出一連串的改革與新政，造成日本士族特權喪失，生活困苦。西鄉隆盛(1828-1877)因征韓論的失敗於1873年下野後，便在鹿兒島興辦私學，廣收士族子弟，儼然成為反對明治政府的一大勢力。1877年2月，西鄉舉兵造反，明治政府傾全國之師與其激戰，史稱「西南戰爭」。為時八個月，後西鄉軍戰敗，明治政府徹底剿滅反對勢力，漸趨穩固。

會制度與政黨政治等自由民權的浪潮，此時也還未出現，因此何如璋對於日本政治制度未能提出較為精細的見解與評論，甚為可惜。

同為首次赴日駐使團的成員，黃遵憲在日本停留的時間比何如璋更久，因此他對於日本的觀察比何如璋更為全面與深入。赴日後，黃遵憲感於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和瞭解存在很大的誤會，並對於當時中國士人「聞見狹陋，於外事向不措意」的自大心態有所不滿，⁷⁸因此他認為有必要深入、系統性的瞭解日本的歷史和現狀，才能使中國人能夠清晰的認識日本並加以效法。此後黃遵憲充分運用公務閒暇的時間，收集相關的資料與書籍，詳細考究日本歷史沿革與風土民情，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過程，將之編為《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兩本書，希望自己的祖國能夠藉此「借鑒鄰國，作匡時之策」。⁷⁹這兩本書在中國出版傳佈後，的確為當時中國注重洋務的官吏與士人帶來廣大的影響，甚至促成了戊戌變法的出現。⁸⁰為觀察黃遵憲對日觀感的内容與特點，並與鄭孝胥的觀點做一比較，以《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為分析之對象應是較為適當的，尤其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更是藉由「外史氏曰」的口吻，對日本各方面的現象來提出自我見解，這正是了解黃遵憲對於日本觀感的最佳材料。

考察黃遵憲所保持的立場，他認為日本西化是全面成功的，他也希望中國能夠完全學習日本來進行西化。他指出中國如欲富強，必須效法日本全面西化，才能獲得如同日本明治維新推行西化的進步成果。黃遵憲對日本整體西化的了解超越了當時的寓日中國士人。就經濟層面來說，包括鄭孝胥在內的中國寓日士人，均提到日本西化的成功是學習西方的重商主義、以工商為立國精神的態度，然黃遵憲觀察更為透徹。他曾針對日本明治政府為解決政府財政匱乏而學習西方國家發行國債之一事，提出自己的見解：

外史氏曰：中國未聞有國債也。周既東遷，王室衰微，赧王負債至筑臺避之，天下後世以為恥笑……顧余考泰西諸國，莫不有國債……又況富商巨室，屢輸於公，則下之於上，患難與同，憂樂與共，相維相繫之義日益深，而國本日益固。⁸¹

⁷⁸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序》，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據光緒二十四年[1898]長沙富文堂重刊本），頁6。

⁷⁹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初印本跋》，同前書，頁69。

⁸⁰ 《日本國志》的內容比《日本雜事詩》來的更為廣大與深刻，因此較受中國官吏與士人的重視與推崇。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正式刻行後，即刻受到維新派士人的注重。康有為結識黃遵憲之後，便提出「中國如行變法應效日本」的主張。梁啟超更是大力宣傳，還將《日本國志》列為湖南時務學堂的必讀之書，自此即可見《日本國志》對維新派士人的影響程度。

⁸¹ 黃遵憲，《日本國志·食貨志》，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下冊，頁1196-1197。

中國人對於「債」的傳統觀點多為負面的。自古以來中國人多認為，當「債務」出現於個人、團體，乃至於國家的財政狀況時，多半帶有「不好的」、「不該公開」的意涵。倘若被公開有債務，那麼常會招致旁人異樣的眼光與批評。放大到國家層面來看，在傳統觀念中，當國家能夠進行重大的建設，或是為拓展疆土而連年舉兵，那麼當時國家的財庫一定是富饒充溢，否則如何支撐國家巨大的開銷？若國家財政窘迫，就會加徵重賦，從人民手中收取民間財富。因此國家只有可能因戰事失利而舉外債，並不會向人民舉債。然黃遵憲經由對日本的觀察，了解國家發行國債的必要性。對西方國家來說，國家向人民舉債是代表人民對於國家的一種投資方式，國家也能藉由這些款項來進行重大政策的實施，能使國家更為興盛，人民的生活水準也能隨之提升。黃遵憲對日本能實行國債制度是贊同的，而他也希望藉由對日本實行國債制度的介紹，以供清廷作為參考。⁸²以此為例，這一點是包括鄭孝胥等當時其他的寓日中國士人所未觀察到的。他們僅以重商主義的角度，來說明日本西化的成功因素。黃遵憲則是更加深入的探究日本的其他相關政策，並研究這些政策背後的涵義與動機。經過觀察之後，黃遵憲肯定日本對於實行西化所做出的努力，並認為日本徹底學習西方經濟的政策與措施是值得清廷效法的。

前文提到黃遵憲認為中國可以完全效法日本進行西化。而他又是如何看待日本士人因崇尚西化而不再重視中國漢學的現象？針對這個問題，黃遵憲解釋的角度與鄭孝胥有所差異：

夫日本所傳之漢學也，如此其久，其習漢學也，如此其盛，而今日顧幾幾欲廢之，則以所得者不過無用之漢學，芻狗焉耳，糟粕焉耳……夫辭章之末藝，心性之空談，皆儒者末流之失，其去道本不可以道里計；而日本之學者，乃唯此事求。⁸³

黃遵憲認為，當時日本所崇尚的中國漢學，並非中國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日本漢學多注重文字與詩藝，或者流於哲學層面的空談。儒家學說中經世致用的理論，日本士人並未深入的探究。加之儒學在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具有特殊的地位與影響，⁸⁴使得當時的日本儒學出現多種流派與學說，並對於許多中國傳統的儒家

⁸² 清廷於光緒二十年(1895)第一次發行國債，發行額度為一千一百餘萬兩，月息七厘，以地丁關稅作為擔保品。黃遵憲的主張與此措施之實行應有關聯。參見《中國公債史料》（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頁366。

⁸³ 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下冊，頁1409。

⁸⁴ 由於日本德川幕府建立於社會階級制度的基礎之上，因此維持現有社會階級結構的意識與打壓興盛於日本戰國時代的反抗意識，成為幕府統治階層相當重視的問題。而中國儒學，特別是朱子學中的倫理觀念，正可供幕府用來強化階級制度的意識，因此儒學即受德川幕府當局

思想觀點有著不同的解釋而相互辯駁。⁸⁵這種現象的產生導致黃遵憲認為當時的日本儒學流於空談，失去應有的中心思想。1851 年的「黑船事件」更造成了中國儒學的失勢。面對西方國家的強大壓力，德川幕府不得不開放持續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藉由對西方事物與思想的接觸，並眼見西方國家的富強，使得不少日本士人認為儒學並沒有辦法使他們如同西方國家般強盛，於是批評儒學的風潮隨之漸起。黃遵憲認為，日本士人仍然需要重視漢學。但他並非如同何如璋與鄭孝胥以「日本文化須受中國文化影響」為出發點。他認為，漢學之所以於日本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由於它的實際作用，「方今西學盛行，然不通漢學者，至不能譯其文」。⁸⁶又，他認為日本明治政府能夠推翻德川幕府而建立，所依賴的「尊王攘夷」之觀念，也是由中國漢學的倫理觀內容演化而來。基於這些實際作用與需要，黃遵憲認為漢學依然能夠在日本學界占有一席之地，「是以知漢學之必將再興也」。黃遵憲還提醒日本士人，切莫過於學習西方文化與思想，反將自身的文化傳統與歷史給遺忘殆盡。他說：

今歐米諸國，互相往來。世之論者，好遠驚博，輒驚其強盛，以為事事皆可取法，而以己國為鄙陋無足道……日本立國兩千餘年，風俗溫良，政教純美，嘉言懿行，不絕書于史。吾以為執萬國之史以相比較，未必其遂遜於人。⁸⁷

黃氏未對日本當時輕視漢學或中國文化的現象加以大肆批評，⁸⁸還不忘提醒日本士人重視他們自身的文化與歷史之美。由此可見黃遵憲對日本的了解與認知程度之深刻。

從鄭孝胥當時對於日本的觀感來看，他對日本在明治維新中建立議會制度，並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改革是持保留立場的。他也不認為中國需要效法這種政治改革。然而黃遵憲在對於中國是否需要效法日本進行政治改革的問題上，抱持著與鄭孝胥對立的論點。黃氏可說是將日本明治維新中的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實行

或各諸侯所重視，因而大興。參見永田廣志著，陳應年等譯，《日本哲學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 33-41。

⁸⁵ 德川公繼宗七十年祝賀記念會，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東京都：岩波書房，1984），頁 4-10。

⁸⁶ 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下冊，頁 1410。

⁸⁷ 黃遵憲，《皇朝金鑒序》，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上冊，頁 265。

⁸⁸ 有學者提出黃遵憲對於日本改行西曆一事，一開始是抱持著強烈的反對態度。但因他後因出使英美，對西方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之後，黃氏對於日本捨中國立法而行西方立法之政策的反對態度就不再如此明顯。參見王立群，〈從《日本雜事詩》的修改看黃遵憲日本觀的嬗變〉，收入《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9 期（2006），頁 87-91。

君主立憲政體之過程加以全面性、系統性介紹到中國的先鋒。⁸⁹由於日本人民曾為了催促當局設立完善的議會制度，與明治政府有過一番抗爭。因抗爭所導致的社會亂象，正是鄭孝胥批評日本議會制度的主要論點。然而黃遵憲卻認為，日本效法西方國家建立議會制度，是「以公國是而伸民權，意甚美也」，⁹⁰而給予甚為正面的評價。黃氏並對於這種未曾出現於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加以分析：

為議員者，已由民薦。薦而不當，民自任之。苟害於事，民亦自受……
民自以為分官之權，謀己之利，而官無籌費之名，得因民之利以治
民之事。其所議之當否，官又得操縱取捨於期間，終不致偏菴偏枯，
使豪農富商罔利以為民害。固議會者，設法之至巧也。⁹¹

剖析議會制度的利弊處之後，黃遵憲認為議會制度是促成人民與政府之間彼此權益達到平衡的一個巧妙方法。在議會制度中，人民不再只能聽從或接受政府的措施，他們現在可以藉由此一制度，來為自身謀取更好的福利。政府方面也並非從此就失去了對人民的統治權，官方力量依然可以藉由議會制度來影響民意，避免民意受到特定人士的操控或利用。黃遵憲認為這種政治制度可以兼顧兩者利益之所需，因而論此制度為「至巧」。實際上，他認為議會制度是日本明治政府必須所歷經的一個必經過程，同時也促使日本更為進步。⁹²

對於日本的政黨政治，黃遵憲也做了相當細膩的觀察。他發現，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夠強盛的根本原因，與政黨組織有密切的關聯，這是因為政黨組織能夠凝聚較多數人的意志，進而對整個社會或國家造成影響，他說：

余觀泰西人之行事，類以聯合力為之。自國家行政，待於商賈營業……無不藉眾人之力以成事……故能維持眾人之力而不渙散，其橫行世界莫之能抗者，恃此術也。嘗考其國俗，無一事不立會，無一人不結黨，眾人習之其利，故眾人各私其黨。⁹³

黃氏點出「結黨」與「聯合力」之間的聯繫，並論述「聯合力」是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強盛於當世的一個關鍵。而日本也效法西方人民樂於結黨的習氣，組織起相當多的黨會並踴躍參與，形成「無事不有會，無人不入會」的熱潮。黃遵憲認為，正是這種凝聚力與團結性，才能讓日本的明治維新順利推行各方面的改革，

⁸⁹ 鄭海麟，《黃遵憲傳》，頁 205。

⁹⁰ 黃遵憲，《日本國志·職官志二》，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下冊，頁 1135。

⁹¹ 同前註，頁 1135。

⁹² 黃遵憲，《日本國志·國統志三》，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下冊，頁 926。

⁹³ 黃遵憲，《日本國志·禮俗志四》，同前書，頁 1493。

並獲得成功。⁹⁴同時黃氏也對政黨政治的弊端提出見解。由於政黨彼此需相互競爭才能獲得政權，當新的政黨掌權時，常將屬於前一個掌權政黨的官員「廢而易置之」，使得政局不能安穩。黃遵憲提到：

舉舊日之政體改而更張之，政令為之一變，譬漢、唐、宋、明之黨禍，不啻十百千倍，斯亦流弊不可不知者也。⁹⁵

政黨的變動亦會伴隨著人事與政策的變更，此即為政黨政治的一大特點，時至今日依然未有改變。黃遵憲憂心這種變動是否將會如同中國歷史上的數次黨禍一般，對國家整體造成巨大的負面效應與影響。自此可以看出，黃遵憲雖認為政黨可以凝聚眾人的意識並促進團結，並藉由政黨之間的競爭來使國家更為富強，然而政黨因政權交替與變動是否會為國家發展與政局帶來負面的影響？黃氏認為這是必須加以觀察之處，不可不慎。與推薦議會制度的立場相比，黃遵憲對於政黨政治持較為謹慎的態度。

綜合來看，黃遵憲對於日本的整體觀感大略可分為兩個層面。第一，日本明治維新於各方面均推行西化，「百務并修，氣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遺餘力」，⁹⁶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第二，清廷政府應全盤參考日本的改革模式與過程，盡速為當時的中國謀求進步。黃氏與鄭孝胥不同之處，在於黃氏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措施皆可效法與學習，學得越多，進步越快；而鄭孝胥認為日本改革的成功僅限於物質器物方面，中國可以參考仿效日本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然而其他方面並不需要效法日本全盤西化。事實上，鄭孝胥日後曾針對黃遵憲實行全盤西化的主張加以批評，謂其為「口西國之新說而身中國之舊習」之語。⁹⁷

筆者以何如璋與黃遵憲作為與鄭孝胥比較的對象，探究這三位曾經赴日的晚清知識分子對於日本觀感的異同之處。而當時中國的官吏與士民，又是如何看待日本這個國家？通過對於近代中國士民對於日本的觀感之觀察，亦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突顯鄭孝胥其日本觀的內涵與特點。

中國早自漢朝就知道有日本的存在。⁹⁸但直至鴉片戰爭(1842)前後，中國對於日本的認知程度依然是比較模糊的。到了1874年，日本以人民被臺灣原住民殺

⁹⁴ 鄭海麟，《黃遵憲傳》，頁 219。

⁹⁵ 黃遵憲，《日本國志·禮俗志四》，收入陳錚主編，《黃遵憲全集》下冊，頁 1493。

⁹⁶ 黃遵憲，《日本國志自序》，同前書，頁 817。

⁹⁷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7 年 9 月 3 日條，頁 616。

⁹⁸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參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點校本），頁 1658。

害為由，派兵攻擊臺灣，這才使得中國士民開始重視這個東邊的鄰國。然而除了部分思想較為開明的士人、或是前文提到某些曾赴日本，親身對日本加以觀察或了解的士民以外，認為日本還是個「東夷小國」的想法，仍為當時中國士民對日觀感之主流思潮。而對於日本自1868年起開始推行的明治維新，大部份的中國官吏與士民也多以「雕蟲小技」觀之，並未加以重視。

這些士民對日本侵略擴張的行徑雖有認識，但對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實際情況卻並未詳知，他們仍自豪於清廷對日本的影響力。以張之洞在光緒六年(1880)的一篇奏摺為例，他提到縱使兩國如有衝突，只要清廷派軍封鎖日本附近的海上交通並斷其通商管道，「相持一年，日本窮矣」。⁹⁹另一個例子是李鴻章。他在光緒八年(1882)一篇奏文中提及「中國地大物博，但能合力以圖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勝算」，¹⁰⁰文字裡明白顯示他對於當時清廷國勢的自信，以及對於日本的輕視。張之洞為晚清官吏中支持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李鴻章更是長久以來主持清廷政府的洋務及外交事務的首腦。這兩人與洋務運動都有緊密之關聯，對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應有一定程度的瞭解，然而從他們的言論中，仍可感受到對日本的輕視，而當時清廷其他官吏或士人輕視日本的程度，也就不言而喻。這種「輕日」觀瀰漫於當時的中國官場中，並造成影響。日後清廷統治階層與皇室權貴未顧海防重要性，而將原本欲使用於建立北洋艦隊的經費給揮霍殆盡，與這種「輕日」的思想不無關聯。¹⁰¹

與「輕日」思想對立的，即為部分思想較為開明、曾經到過日本，欲以藉由日本來學習西方思想而使中國進步的士民之「師日」思想，而此「師日」思想之重要代表，即為黃遵憲對於希望清廷效法日本的相關論調。此論調已於前文中提及，在此不贅。也有部分士民主張當時的中國可以東鄰日本為仿效的對象，然而僅只於器物制度等物質文明方面，思想文化還是須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為主要的思想。這種「仿日」的思想參雜了「師日」與「輕日」，但論其成分仍以後者居多。鄭孝胥於此時的日本觀可歸納於此種「仿日」的思想體系。總合論之，在甲午戰爭爆發以前，中國士民對於日本的觀感，不出「輕日」、「仿日」與「師日」三種立論。然而抱持「仿日」和「師日」立場的中國士人終究是少數，並無法對當時的中國局勢與中日兩國之間的互動作出關鍵性的影響。至於多數中國士民所抱持

⁹⁹ 張之洞，〈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折〉（收入收入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一冊〔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71。

¹⁰⁰ 李鴻章撰，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奏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景印上海商務印書館刊本），卷四十四，頁19。

¹⁰¹ 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頁494-505。

的「輕日」觀點，則使得清廷對日本強盛的原因與影響加以忽視，中國也失去了藉由學習日本來進行近代化的良機。此後中國亦逐漸失去主導東亞情勢的地位，而被日本所取代。

綜合前述，鄭孝胥赴日後乃藉由閱讀日本書刊、與日本文人的互動，以及在處理外交相關事務的過程中，來逐步建立他自身對於日本此一國家的觀感。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在器物與物質方面獲得成功，因此他抱持「仿日」的立場，認為清廷可以仿效日本，使中國於物質文明的層面取得進步的成果。但鄭孝胥對於日本實行西化後的文化現象或政體是輕視的，因此他認為中國不需與日本同樣崇尚西化。將鄭孝胥此時的對日本的觀點加以分析，可以發現他對於當時日本明治維新後物質文明的進步頗為重視，但卻未能如黃遵憲一般深入探究日本進行西化政策的背後意義與思想根源。然而與當時身處中國的官吏和士民來比較，鄭孝胥對日本的觀感雖多少帶有輕視日本的成分，但並非是完全的「輕日」，這是必須加以界定與注意的。

第三節 「其端詎難闕」：中日甲午戰爭對鄭孝胥的影響

因任駐外使節代表，鄭孝胥對於當時國際情勢可說甚為關注，其中又以歐洲各國間的軍備競賽最讓他感到憂慮，而有「歐禍固尤亟於亞哉」之言論。¹⁰²然自光緒二十年(1894)起，鄭氏將關注的焦點自原本的歐洲，漸轉移到東亞地區中、朝、日三國的互動過程。自 1875 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之後，日本勢力開始進入並影響朝鮮半島的政局。待甲申事變(1884)爆發後，中日兩國均更為重視自身在朝鮮地區的權益與影響力。由於日本對俄國勢力進入朝鮮半島甚為忌憚，假如俄國控制朝鮮，將危及日本的「利益線」範圍，¹⁰³因此日本圖謀朝鮮益急，朝鮮半島的局勢也更加混亂。到了 1894 年 3 月，朝鮮農民不堪忍受生活困苦與當時朝鮮李氏王朝的貪婪腐敗，引發了「東學黨之亂」。此一事件終使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完全失控。同年七月中日兩國開戰，史稱「甲午戰爭」。後清廷戰敗，日本因此取得了臺灣作為殖民地，並使其加快對中韓兩國的侵略步調。這場戰爭對東亞的國際關係與局勢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論其為近代中日關係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不為過，而此一歷史事件也成為中國人對於日本觀感演變的一

¹⁰²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3 年 10 月 21 日條，頁 377。

¹⁰³ 時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山縣有朋(1838-1922)於 1890 年提出日本「主權線」與「利益線」的分野，並強調若有其他國家勢力妨礙日本控制朝鮮者，日本將不辭動用武力的決心。參見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17-20。

個轉折點。¹⁰⁴那麼，當時擔任清廷駐日外交代表的鄭孝胥，是如何看待這場突如其來的變局？日本獲勝、清廷戰敗的結局又對他帶來了何種程度的影響？筆者將嘗試探究鄭孝胥對於這場戰爭的言論與立場，並觀察此一事件對於鄭氏其日本觀感的轉變。

直至光緒二十年(1894)的六月，鄭孝胥雖因朝鮮亂局與日益熾而感到憂慮，但他並不認為中日兩國會因此而開啟戰端，¹⁰⁵他與日本友人的友好相處亦未有所改變。然而隨著中日兩國對於朝鮮問題的對立情勢逐漸升高，促使鄭孝胥不得不正視兩國開戰的可能性及其影響。自認對當時東亞局勢有所了解的鄭孝胥，認為日本不應為朝鮮問題與中國開戰。他提到：

然則廟堂之謀，其豫見俄羅斯之必為吾害，斯其養力蓄慮以待北境之發難，昭昭然矣。故朝鮮之衅，夫人知其將啟；而自日本啟之，則日本之狂愚不可救者也。¹⁰⁶

鄭孝胥論述來自北方的俄國，是清廷最需要去防備的對象。而日本若以朝鮮問題而與中國開戰，實乃不智之舉。在鄭孝胥的論點中，他認為日本應與中國共同防範來自俄國的威脅，而非因爭奪朝鮮而與中國一戰。如果兩國開戰，將使俄國坐收漁翁之利，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是很大的威脅。因此他認為兩國並無開戰之必要，若日本果啟戰端，那將是「狂愚」之舉。換言之，鄭孝胥已或多或少感受到日本欲對清廷開戰的企圖，但他認為此一企圖對日本來說，將是損人不利己的一種舉動。然而日本因欲提高自身在東亞局勢的國際地位，以及擴大國內財界亟需的貿易版圖，對朝鮮發動軍事行動已為必然之發展。此時李鴻章察覺到日本開戰的意圖，希望以和談來解決中日兩國之間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於是他向英國與俄國展開遊說，希望兩國能夠出面調停。然而英國態度並不積極，俄國與日本之間又已有默契，至此李鴻章的計畫可謂完全落空，中日兩國勢必一戰。而英俄兩國的默許態度，無疑為日本出兵朝鮮的舉動，打了一劑強心針。¹⁰⁷決心開戰的日本便於同年八月向清廷宣戰。另一方面，清廷基於李鴻章欲以英俄出面調停的計

¹⁰⁴ 王曉秋，〈甲午戰爭前後中國人日本觀的轉變〉（收入戚其章、王如繪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58。

¹⁰⁵ 當時俄國駐日領事因日本報紙記載中國駐日使節即將撤離在日華商之事詢問鄭孝胥，鄭氏以「妄傳」來回答，並去函要報社對其報導內容加以改正。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4年6月26日條，頁422。

¹⁰⁶ 同前書，1894年7月19日條，頁427。

¹⁰⁷ 當時俄國內部對於中日兩國朝鮮問題的處理方式，有數派不同意見。然因當時俄國正興建西伯利亞鐵路，而英美兩國對日本派軍的狀況並未強烈反對，最後俄國決定與日本達成互不侵犯的約定。

畫失敗，加上主戰派言論的影響，也決定與日本作戰。¹⁰⁸聽聞開戰消息的鄭氏，終究證明了自己的論點並未成真而備感無奈。在留下了「吾儕自尊俎，世事奈干戈」的詩句之後，¹⁰⁹鄭孝胥奉令離開日本。

這時的中國士民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的？受到「輕日」觀念的影響，在甲午戰爭初期，中國官吏與士民對於戰局多抱持著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擁有明顯的優勢，日本並非中國之敵手。倘若日本與中國開戰，將如螳臂當車般脆弱而不堪一擊。因此以中國之力，斷無敗於日本之慮。也有官吏認為日本雖因明治維新而有進步，但仍未具備足夠的資源來進行這場戰爭，「國小民貧本不支」，¹¹⁰判斷日本的國力無法配合軍隊的行動，所以日軍對於清廷也不會造成即刻的危機。植基於對日本的認知未清，以及固有的「天朝觀念」，清廷官吏對於中國必然於這場戰爭中勝出，可說是充滿信心。與官僚階層相比，當時中國民間輿論對於日本的輕視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以《申報》為例，在甲午戰爭初期，也就是光緒二十年(1894)七月的各篇社論中，有其論日本過於狂妄，「乃不自量力，輕啟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勢矣」，¹¹¹或論日本軍力素質低落，「此種烏合之眾，以勁兵搗之，如發蒙振落耳」。¹¹²由這些時論之內容，可以想見當時中國民間輿論對於日本的輕視程度。綜合論之，當時的中國除了極少數有識之士以外，上至國家大吏，下至黎民百姓，他們多對清廷過度信賴，而對敵手日本過度輕視。而鄭孝胥就在舉國上下均感甲午戰爭必勝的氛圍中，於八月中旬返抵中國。

不同於清廷官吏與士民對於戰事的樂觀態度，鄭孝胥對於清廷能否在這場戰爭中取得勝利並未抱太大的期望。隨著兩國間的情勢日漸緊張，鄭氏於此時對於日本的態度也做出改變，但也僅止於將從前稱呼日本人的字語由「日人」改成了「倭人」，雖含有較於輕視與不滿的意味，但他並未如同當時主流輿論一般，將日本的開戰行為看作是不自量力的舉動。即便鄭孝胥不滿日本於明治維新中重西法輕漢學的做法並加以批評，但他曾親身體會日本在物質文明與制度方面的改革及進步，並深刻了解日本在明治維新成功推行後的豐碩成果，致使他對於中國能否在這場戰事中勝出，採取較為保守與謹慎的態度。甫抵中國不到一月，他就對

¹⁰⁸ 主戰派士人對李鴻章主和的態度感到不滿，主張與日本一戰。此一論點對光緒皇帝造成了影響，至此清廷中樞對日本的態度漸趨強硬，開始備戰。參見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 59-77。

¹⁰⁹ 鄭孝胥，〈留別日本神戶各官〉，收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4年8月1日條，頁 430。

¹¹⁰ 袁昶，〈重有感〉，收入《于湖小集》第二冊（收入袁昶撰，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漸西村舍叢刊》，臺北，藝文出版社，1966，據光緒年間彙刊本），頁 13。

¹¹¹ 《申報》（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2-1987），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94.07.28)，〈先發制人說〉。

¹¹² 《申報》，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九日(1894.07.21)，〈論中國為朝鮮事不可不與日本一戰〉。

李鴻章選用人才的適切性提出了質疑與憂慮。¹¹³質疑的言論猶言在耳，清廷的北洋艦隊在黃海大敗的消息很快的傳回中國。鄭氏聞此消息除痛心之外，更大肆批評李鴻章，認為李氏應完全負起北洋艦隊戰敗的責任：

合肥（指李鴻章）耄而驕，平日居心行事，專以苟且偷安為得計，使朝鮮事竟立定，當膺功賞，恐天道忌盈，未必能如其愿，一也。中國近年習氣甚重，自上至下不務名實，徒為矯飾，日趨陋劣，雖朝廷初示整頓，然豈能遽革？以此朝綱而當艱鉅，亦未必有成，二也。¹¹⁴

於此段評語中，鄭孝胥充分表達對這位昔日曾受他相當敬重之長官的失望與不滿。除了「行事苟且偷安」讓李鴻章失去了先發制人的先機以外，他還指出朝政的廢弛與官場的積習，加重了清廷因未能掌握重要關鍵而對整體戰局所造成的負面效應與影響。主事者未能積極主動，而輔佐的官員不是對軍事一無所知，就是平時驕矜怠惰，遇事則驚慌失措，「早知其不足恃矣」。¹¹⁵值得注意者，鄭孝胥於評論中並未提到日本是因物質上的船堅砲利，或因明治維新的成功改革而獲得這場勝利。其主要立論，還是在於強調這場戰爭是由於清廷本身的怠惰與腐敗，以及主事者的消極態度而以失敗作收。換言之，此時他並不認為日本於明治維新實行後所獲得的進步成果，是決定中日雙方戰局的主要因素。

肇因於在黃海的失利，剩餘的北洋艦隊為保留其殘存的實力而往威海衛撤退，這也代表黃海的控制權落入日本的聯合艦隊手中，清廷賴以自保的海上屏障消失殆盡，日軍侵入遼東半島已無可避免。隨著日軍攻勢益急，戰局對清廷來說更是每況愈下。中國士民也不再如同先前那樣自信滿滿，取而代之的是氣急敗壞與失望。這些向來把日本視為蕞爾小島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急著想找出日本何以能夠超越中國的原因。而曾經赴日考察、遊歷與任官的中國士人，便是這些傳統士民現成的諮詢對象。時任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也想明白日本成功的原由與經過。於是，他找來了與自己有些交情的鄭孝胥，希望藉由與鄭氏的談話，能夠解決自己心中的疑惑：

制軍（指張之洞）曰：「日本蓄意東方，其謀已久。在彼國者獨無先機之見乎？」對曰：「欲攻而後備兵，欲拒而後設防，此中國廢

¹¹³ 鄭孝胥於光緒二十年(1894)的8月16日抵達上海，在9月5日的日記中，就對李鴻章的用人準則加以批評，論其「如以鼠駕轅，使豚犁田耳」。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4年9月5日條，頁434。

¹¹⁴ 同前書，1894年9月20日條，頁436。

¹¹⁵ 同前書，1894年9月20日條，頁436。

弛之症耳。若西方諸國以及日本，常備之兵日日可戰，時時備御，豈有臨事張皇，與人可以窺哉。」¹¹⁶

張之洞已體認到日本欲向東亞擴張的計畫實行已久，其蓄謀更非一時即定。此時的日本再也不是先前認為只要「相持一年即窮矣」的落後國家。然而，張之洞更想要知道造成中日兩國之間的如此差異的原因何在？這是長久以來身處中國的他所不能通曉的。回應張之洞的疑問，鄭孝胥清楚的提出原因所在。表面上，鄭氏認為日本採行西方國家的兵制，因此戰鬥力強盛。¹¹⁷實際上，鄭氏還是把焦點擺在「朝政廢弛」這個關鍵因素，「中朝時久弛，文武苟以嬉」，¹¹⁸並批評此一關鍵因素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與先前不同的是，鄭孝胥此時承認日本對中國的意圖「其謀已久」，這與他先前認為日本不會對中國宣戰的主張是有所改變的。

改變先前相信日本不會攻擊中國的想法之後，鄭孝胥在甲午戰爭中所採取的立場是堅決主戰，絕不談和。光緒二十年(1894)末，清廷內部主張談和的聲音逐漸增加。曾任出使日本大臣的李經方，當時被認為是代表清廷進行雙方談和的內定人選。李經方曾託人詢問鄭氏一同前往日本談和的意願，卻被鄭孝胥一口回絕。¹¹⁹對鄭孝胥來說，這樣的和談並非「議和」，而是「投降」。倘若真進行和談，那麼清廷將再也無法將主動權重新奪回，而成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因此鄭孝胥採取主戰到底的立場，並提出持久戰觀念，即使遷都也在所不惜。¹²⁰要是清廷一意求和，將招致無法想像的後果：

朝廷能堅持力戰，不過數月，倭必自困。縱多所喪失，即至突犯陵闕，乘輿播遷，而中國人心尚不至失，創深痛巨，時事或有可為也。如屈意乞和，苟求目前之安，仍括天下之膏血以償鄰敵，此為強彼而自弱。戰事甫息，積習更張。所謂臥薪嘗膽以求雪恥，固必無之事而漢人憤怨，仇視滿洲，叛者四起，一舉而失中國，可立待矣。

¹¹⁶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4年11月12日條，頁447。

¹¹⁷ 明治維新後，日本行徵兵制，男子凡滿20歲即被編入兵籍，再依其身體條件與技藝加以區分為常備、後備與國民兵三種，以備緩急。參見黃遵憲，《日本國志·兵志一》，收入《黃遵憲全集》下冊，頁1238。

¹¹⁸ 鄭孝胥，〈紀對南皮尚書語〉，《海藏樓詩集》頁44。

¹¹⁹ 「余笑曰：『使吾從軍，往死日本可也。朝事如此，吾何顏復見日人乎。』」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4年12月7日條，頁451。

¹²⁰ 當時朝廷的主戰派官員們大多提出持久戰的構想，預想的時間從數月到十年都有。然持久戰便代表著巨大的損失，主戰派官員對這些預期的損失程度大多諱言不談，而主張遷都以代表抵抗到底的決心。參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卷39頁8-23；卷43頁5-38。

鄭孝胥在文中提及，持續與日本進行作戰才是清廷所必須採取的唯一方法，儘管將會帶來許多損失，然國家命數在此一役，損失是在所難免的。若不持續作戰下去，「因敗以待和」，¹²²失敗者僅能走上和談一路。然而談和不但讓強鄰日本坐收巨利，甚至朝中的不良陋習與怠惰態度也將因此而無法控制，更有可能引發人民的強烈不滿群起反抗，造成清廷的覆滅與敗亡，鄭孝胥對朝廷欲行和議的憂心與痛惡由此可見。雖然主戰派官員與士民持續的大聲疾呼，但清廷的統治集團無視這些官員與市民的請求，仍然持續進行和議行動的籌劃與準備。

到了光緒二十年的十二月下旬(1895年1月)，清軍無論在陸戰亦或海戰皆大勢已去，無法在重要會戰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戰果。對中國不利至極的戰局發展藉由報紙與口耳相傳的方式往全國各地流通，獲知了此一情勢的鄭孝胥，也只能發出「歐制亞，漢叛滿，可立而待也」的悲嘆，¹²³並且開始調整自己對於和議強烈反對的立場。鄭氏希望清廷中央能夠徹底了解失敗的原因，藉此做出某種程度的改革，「更新政令，造鐵路，講吏治，振商業，修戰具」；再派一名通曉中日國情的官員到日本進行游說，而非談和，「曉以利害，與之罷戰修睦」，如此將為兩國帶來可貴的和平。從鄭孝胥的說法可以發現，此時的他依然抱持著中國傳統士人的優越感，認為以言語的方式，就能使日本退兵謀和。同時，鄭氏相當希望清廷能夠指派他去擔任這項工作，同時他也自詡能夠順利的達成這個任務，「吾奉命而行，必能折其氣而發其衷矣」。¹²⁴然而清廷直到簽訂馬關條約為止，僅希望國際間列強為其調停，以早日訂立和約，並沒有進行派出官員到日本進行游說的舉動，日本也未曾主動與中國提出謀和的要求，反而是加緊攻勢以求徹底擊垮清廷。至此，鄭孝胥欲擔任兩國「說客」的企盼，再無實現之日。

威海衛之役的戰敗造成北洋艦隊的覆滅，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1836-1895)自殺殉國。¹²⁵1895年2月，甲午戰爭已大勢底定，清廷敗北，只能求和。同年三月，李鴻章奉派赴日，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1841-1909)等人共同商討和約事宜。鄭孝胥對此也僅能表達出憤怒與莫可奈何的感嘆，「念時事如此，悵然不樂」。¹²⁶待《馬關條約》的內容於同年四月傳回中國後，舉國嘩然，反對換約之聲一時

¹²¹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4年12月25日條，頁455。

¹²² 王闓運，〈與李少荃書〉，收入王闓運著，馬積高主編，《湘綺樓詩文集》第二冊（湖南：岳麓書社，1996），頁68。

¹²³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5年1月8日條，頁460。

¹²⁴ 同前書，1895年1月17日條，頁463。

¹²⁵ 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372。

¹²⁶ 鄭孝胥於1895年2月便聽聞李鴻章將往日本議和之消息，並大肆批評：「果有此命，合肥一

大起。許多官員紛紛起而諫諍，希望促使朝廷廢約，認為再度開啟戰端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當時各省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也聯合組織了一次請願活動，同樣也是訴求和約內容太過苛刻而朝廷應拒絕換約以廢之，史稱「公車上書」。¹²⁷「拒和」成為當時舉國風從的大趨勢。

先前採取主戰態度的鄭孝胥，也是此一風潮的跟隨者。除了贊同毀約以外，鄭氏主張朝廷先須遷都，才能使毀約的舉動順利進行。¹²⁸在一封寫給張之洞的信函中，鄭孝胥更加清楚的闡明他對於廢約的支持，並建議清廷如何巧妙運用國際外交情勢來獲取列強之協助，以成此舉：

英素有結中國以拒俄之心，視中國不足恃，則其謀亦變……今中國方為日本所逼脅，各國環視，各思自利，兼弱攻昧，豈肯相助。計惟有遷都毀約，亟伸天下之氣，遴派公正通達之大臣，速赴英國，訂立密約，與之同利害，圖富強，而以直省興造鐵路為先務，以賂日者賂英，則英必從。如朝廷果為此圖，挽救全局，或猶未晚。¹²⁹

鄭孝胥提出將英國視為可與之合作的對象，是因為中英兩國都將俄國視為潛在的敵人。而今日本以和約要脅中國，鄭氏則希望引進英國方面的勢力來制衡日本的企圖。事實上，當時除鄭孝胥以外，朝廷中主戰派官員的要角如沈曾植(1850-1922)，也曾與張之洞商討聯合英國以保臺灣一地的可能性。¹³⁰然而英國對此並無興趣，此議也未有結果。

眼見以慈禧為首的統治集團，不顧苛刻條約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而一心求和，讓鄭孝胥更是心急。鄭氏尤著重於割讓國土給予日本此一點。以清廷的根本重地京師與東三省為對象，鄭孝胥強烈警告朝中主事者倘使和約簽訂，使日本獲得遼東半島，則其根本重地將「相繼受逼而不能守，他日之棄乃真棄也」。¹³¹然而鄭孝胥與其他官員、士民的諫諍，還是無法阻撓清廷中央簽訂和約的決定。後雖有俄、德、法三國干涉之事，使中國能以贖款收回遼東半島，但這也僅是「前門拒

自引決；不然，則請於香港會議，差可免辱。」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5年2月19日條，頁470；1895年3月21日條，頁476。

¹²⁷ 光緒二十一年(1895)京師會試，康有為與梁啟超發動廣東、湖南舉人上書都察院，請求拒約，其他各省舉人紛起響應。《馬關條約》互換之前，康又邀集十八省舉人共一千二百餘名，於五月二日做一大規模之請願，即為「公車上書」。

¹²⁸ 鄭孝胥提到「苟戀京師，智者不能謀也。」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5年4月21日條，頁483。

¹²⁹ 鄭孝胥，〈上南皮啓〉，同前書，1895年4月22日條，頁485。

¹³⁰ 張之洞，《致臺北唐撫臺》，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電報，收入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八冊，頁6277-6278。

¹³¹ 《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5年4月23日條，頁486。

一虎，後門進三狼」，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加不利。至於臺灣方面，由於不能接受將被割據給日本的決定，臺灣人民於 1895 年 5 月底推舉原任臺灣巡撫的唐景崧(1841-1903)與劉永福(1837-1917)、丘逢甲(1864-1912)等人脫離清廷控制，共組臺灣民主國之後，鄭孝胥曾有意東渡臺灣，望能提供協助一同抵抗日本，此一舉動也受到張之洞的默許。但後因局勢太險，鄭氏無法搭船出航，僅能「恨吾無力助之」，¹³²無法改變日本統治臺灣的事實。對於日本這個「潛在性的敵人」，鄭孝胥也只能空自嘆恨了。

第四節 小結

興盛的閩學學風以及對家族成員教育水準的重視，是培養鄭孝胥具有深厚國學素養與內涵的主要原因。不過鄭孝胥在考場上並不如意，致使他無法藉由科舉的方式順利的進入宦途生涯，這是鄭孝胥在人生中首次面臨的重大變局。後受陳寶琛之薦，鄭孝胥前往李鴻章幕下任其幕客，協助辦理政務。由於李鴻章與各國人士均有接觸，因此鄭孝胥便可從中了解與認識西方各國的狀況與局勢，同時吸收李鴻章幕下其他曾經具有出使派駐西洋國家的幕客之國際觀，進而建構比起當時傳統中國士人較為進步的觀點；而在協助李鴻章處理外交政事的過程中，鄭孝胥更積累了不少處理洋務事宜的寶貴經驗。爾後鄭孝胥能夠奉派赴日擔任外交人員，便與此經驗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因具有處理洋務事宜的經驗，而被評為「於交涉事宜頗有講錄」的鄭孝胥，於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受薦出任駐日本使節館的書記官。初抵日本，鄭氏對於這個陌生國度的一切均感好奇，因此努力收集資訊來了解這個國家。在觀察日本明治維新，並與日本文人互動的過程當中，鄭孝胥發現當時的中國雖也推行西化，但僅止於表面的制度，並未學習到西方列強講求勤奮、信用，與長遠眼光的內在態度與精神。為求導正中國長久以來怠惰與廢弛的風氣，鄭孝胥自詡能通過對明治維新的觀察，而為中國尋找到成功的關鍵所在。然而，他同時也指出日本因全力推行西化，以至於忽略或輕視長久以來影響日本深遠的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是一個錯誤的想法。與黃遵憲主張「師日」、大多數中國傳統士民的「輕日」立場加以比較，鄭孝胥雖肯定日本在明治維新在某些方面的成果，但他認為中國

¹³² 鄭孝胥在遼東半島的爭論暫告落幕之後，便將心力投注在思考阻止日本佔據臺灣之謀。1895 年 5 月中旬，鄭孝胥與張之洞及共同思考如何提供援助給人在臺灣的唐景崧。5 月下旬，鄭氏決意東渡臺灣，張之洞默許之。然而當時海上航路已因戰事中斷，東渡之舉因而作罷。數日後，日軍於 6 月 3 號攻陷基隆，唐景崧棄臺灣民主國總統一職，隔日即乘德國輪船內渡廈門。參見黃昭堂著，廖為智翻譯，《臺灣民主國之研究》（臺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頁 75-81；《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5 年 5 月 16 日-31 日條，頁 492-497。

只需在器物與制度方面仿效日本西化即可。中國傳統的文化還是要優於西方的文化，中國僅要將某些西方國家所講求的態度與精神加以學習，便可跟上西方列強的腳步。鄭孝胥抱持的是「仿日」的立場。

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中斷了鄭孝胥的駐日生涯。在開戰之前，鄭孝胥認為日本不應該對中國作戰，而是要提防俄國對於東亞地區的侵略舉動。然而國際情勢的巧妙演變，日本終究對中國宣戰。返國之後，鄭孝胥並不像多數中國官員與士民那樣輕視日本，並對戰情感到樂觀。相對的，鄭氏抱持著較為保守的立場，並修改他對於日本的態度，呈現出趨於敵視的傾向，同時採取主戰到底的態度。但隨著中國在整體戰局中的逐漸失利，清廷內部逐漸傳出議和之聲。如同許多中國官員與士民一樣，鄭孝胥對此憂心忡忡，認為若走向談和一途、割讓國土，將造成滿清政權的加速敗亡。然而清廷的統治集團並未接受這些訴求，一味求和，使得鄭孝胥僅只能感嘆時勢弄人，亦悲自身無力改變之。

在中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後，鄭孝胥是否還與日本有所互動？若有互動，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對日本採取敵視的立場與觀點該如何調適？而此調適的結果將會對鄭孝胥的日本觀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筆者將在下面的章節加以討論這些問題，以期對鄭孝胥的日本觀變動脈絡與過程能有更深一層的認知與了解。



第三章 日本觀的定調過程

甲午戰爭的爆發中止了鄭孝胥的駐日生涯，同時促使鄭孝胥以不同的角度與態度重新調整對日本的想法與觀感。在鄭氏擔任駐日使節時，雖對日本就政治改革與過度西化方面提出批評，但他當時對於日本的觀感整體來說是友善的。然而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讓鄭孝胥清楚體認到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意圖，並讓他的對日觀感漸趨向於敵視。但考察鄭氏的日記與事蹟，他與日本人士依舊持續互動，對日本的觀感也隨時間與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出現了轉變的情形。在本章節中，筆者將以鄭孝胥對日本的觀感態度做為主軸，試圖以清廷變法革新、國際外交情勢與民初政體轉變等三個主題為例，來論述鄭孝胥於中日甲午戰爭後其日本觀的演變過程及其影響。

第一節 「敵人」，亦或「朋友」：對日本立場的改變

儘管有許多官吏與士民反對簽訂和約、割讓國土，清廷的統治集團終究還是同意承認《馬關條約》的內容。期望清廷能夠廢約力戰到底，並引進英國勢力來制衡日本的鄭孝胥，面對清廷長久以來苟且偏安的風氣也只能徒呼負負，一籌莫展。另一方面，有鑑於在戰爭中的慘敗，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均希望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當作是重振中國往日光輝的出路。鄭孝胥此時也將注意力轉於改革當時中國的內政問題，並表現出他支持「維新」風潮的立場。當鄭孝胥自日本歸國後，即於 1894 年 11 月受張之洞邀請，進入其幕府任事，頗受重用。¹認為清廷亟需改革的張之洞，便希望具有駐日經歷的鄭孝胥能參考他駐日時在日本的見聞與感想，進而規劃出一套能夠符合中國情勢，又能及早收其效果的改革良方。很快的，鄭孝胥便提出自己的見解：清廷需要改革維新，並應從軍制與鐵路政策兩方面來著手。²

¹ 時人對此事的描述是：「具疏稱其材堪大用，得旨賞道員。當時湖北官場，言必稱鄭總文案，其勢可見矣。」參見陳贛一，〈記鄭孝胥〉，收入汪辟疆著，《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551；《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4 年 11 月 19 日條，頁 448。

² 《馬關條約》於 1895 年 5 月雙方換約後，張之洞曾詢問鄭孝胥「今有何策可以補救」，鄭孝胥答：「再借洋債，速造鐵路……大振商務，專練陸軍，未知可救於滅亡否耳。」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895 年 5 月 11 日條，頁 491。

為何要從這兩方面來進行改革？這是一個考察鄭孝胥之思想與其對日本觀感的切入之處。與鄭孝胥相對的，則是康有為(1858-1927)於1895年5月上奏給光緒皇之陳情書中的改革方針與措施。³康氏尤重於藉由改革政治制度與行政體系，從根本上加以改變，也就是「變法」，進而達到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會有此一想法，主要還是針對自強運動的失敗。體認到自強運動只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因此康有為才會以「變法」為訴求。同時康氏認為帝制有其缺陷，因此希望學習進步國家的政治與行政制度，將帝制改為君主立憲制。⁴然而鄭孝胥並不支持由政治制度出發的改革。與對於明治維新的觀感相同，鄭氏認為中國若進行改革，應該遵守一個準則，就是保持中國長久以來所依循的道統，維持自身優良的傳統儒家文化。筆者已在前文藉由鄭孝胥與日本文人的互動過程，及其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觀察，來說明儒家文化的優越感乃鄭氏思想體系的一個準則，鄭孝胥是不能允許儒家文化被取代的。因此鄭氏認為，若要改革只需由軍制與鐵路政策方面下手便可，康有為提出由制度面的根本性質改革，是不必要的。鄭孝胥曾經對於中國改革是否要全然效法日本此一問題，提出他個人的見解與看法：

竊為泰西之勢，如日方中，雖盈而必昃。中國之機，如弓既撓，可弛而更張。及日本變法利害所呈，得神州因時緩急所在。其自通商以來，特以勸工為重……鐵道周於國內，則呼應皆通；巡捕遍於民間，則盜竊盡斂。其務營外勢，而府藏足支，實自取法歐人，而體段粗具。利固驗矣，害亦隨之。租稅太重，則民弗克堪也；刑法太輕，則下無所畏也。黨會愈盛，則奸人得以煽其徒也；議會既開，則政府莫能安其位也。⁵

此段對日本效法西方變法其利弊的評論，出自於鄭孝胥在駐日時期寄回中國的某封信件中。⁶信中鄭孝胥對於日本明治維新做出一個總體性的剖析，就明治政府重視工業與鐵道方面的發展的用心，鄭氏是感到認同與欣賞的。但他也表示對明

³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收入湯志均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14-136。

⁴ 蕭公權指出，康有為在其著作《孔子改制考》中表達他對於中國帝制的不滿。康有為認為雖然帝制有助於統一政權的建立，然而也產生許多流弊。由於已經實行兩千餘年的專制，導致中國停滯在較為低層的社會發展階層，而不能達到「大同世界」的美境。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76。

⁵ 黃慶澄撰，陳慶念點校，《東遊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據光緒二十年[1894]二月東甌咏古齋初刻本），頁37。

⁶ 黃慶澄(1863-1904)，蒼南陳東縣（今署錢庫縣）人，曾於光緒十九年(1893)五月赴日考察，為期二個月，受到當時駐日公使汪鳳藻的接待，並會晤駐日的使節與辦事人員。在其作《東遊日記》中，黃氏曾與鄭孝胥見面，並讚揚鄭氏乃「根器清峭，胸次廣博」。黃慶澄還節錄鄭孝胥寫給某閩省官員的一段書信內容，來稱讚鄭孝胥「於日本大勢瞭如指掌」，因此「特節存之」。同前書，頁36-37。

治維新一些弊處的憂慮，例如「租稅太重」、「刑法太輕」，以及因實行君主立憲制與代議制度而使得中央政府「莫能安其位」等等，這些相形之下傾向於制度層面的變革，鄭孝胥多看為明治維新的弊病。換言之，藉由對明治維新弊病處的批評，來說明西方文化或制度不如中國傳統文化，才是鄭孝胥所要強調的重點。中國如欲行改革，可以日本為借鏡，效法明治維新對於工業、鐵路或軍制的改革。然而對制度、政體方面等根本方面的改革，鄭氏是認為不妥當、不必要的，因此中國也沒有必要去加以學習，也不需要將帝制改為君主立憲制。

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起，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士人持續宣傳變法的迫切，而變法的訴求同時也被清廷的重臣如翁同龢(1830-1904)、張之洞等人逐漸接納，⁷間接也影響光緒帝支持當時的變法風潮。從該年起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清廷中央屢頒有關新政之詔諭，例如練習新式陸軍、設立京師大學堂、辦理礦務等命令，以此可看出光緒本身對於變法新政的重視與期待。⁸光緒二十四年(1898)，變法維新的運動進入高潮。康有為將仿洋改制的效法對象集中與西方列強與日本兩方面，尤以日本為重。康氏認為由於日本與中國的地理環境與風俗都頗為類似，兩國在實施變法之前的社會狀況與國際處境亦相去不多，所以容易學習與效法其維新經驗。因此當時的維新派士人多認為以日本為師來效法西方列強，是變法的一條捷徑。⁹而身為維新派士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啟超(1873-1929)，曾將藉由學習日本明治維新而於中國施行變革的理由說明的甚為直接：

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¹⁰

⁷ 翁同龢字叔平，號松禪，是同治帝跟光緒帝的兩代帝師。官至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翁同龢的長兄翁同書於安徽巡撫任其中遭李鴻章彈劾問斬，遂造成翁同龢與李終生不合。他贊成實行維新變法，並推薦康有為。然而也因為這層關係，在戊戌變法前夕，遭慈禧太后強命光緒帝將其罷職歸里，永不敘用，後病逝于故里安徽。

⁸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316。

⁹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參見黃彰健編，《康有為戊戌真奏議》（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74），頁100。

¹⁰ 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據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頁54。

梁氏所著眼之處，乃在於若以日本為效法對象，中國施行改革所花費的時間將會降到最低。如此一來，清廷改革的措施將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改革的腳步甚至能夠後來居上，凌駕西方各國或日本。¹¹

那麼鄭孝胥又是如何看待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首的維新派士人，欲以日本為師而行變法改革的舉動？直至光緒二十三年的五月(1897年6月)，鄭孝胥依然感嘆當時清廷多數官吏的風氣敗壞與弛廢，「朝官酸黠飾文儒，外官獷鄙矜走趨」，¹²認為這些官員僅關心自己的利益，毫無為國家社稷奉獻心力的忠誠可言，只能「吾屬為虜深可吁」，為中國人民的哀憐命運感到惋惜。對於維新派士人宣揚效法日本明治維新，行「中國維新」的意圖，鄭孝胥並未發表強烈支持或反對的言論，但他對於維新主事者則持保留的態度。¹³ 至於在鄭孝胥當時的思想脈絡中，該如何界定日本在清廷實行變法革新以圖強盛應該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是伙伴，亦或敵人？筆者將於後文提及。

前文論述鄭孝胥認為中國欲行改革，須從鐵路路政與軍制方面著手，才有效果。1897年8月，鄭孝胥曾與友人提到有關盛宣懷(1844-1916)重新興建淞滬鐵路一事。¹⁴鄭氏認為除了要詳細規劃車站動線、行李送運，以及火車停發的時間以外，尤重要者，是要尋找一個適當的人才來管理淞滬鐵路的運行，使上述要事整齊劃一，如此才能讓這條鐵路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

董(懂)其事者必得毫不肯通融苟且而又耐勞者乃可。如目前無人，
宜向日本火車公司雇用上等者一人，副者一人，熟習車站者二人，
足矣。¹⁵

這是鄭孝胥首次提到聘用日本人材的論述，當中更透露出一個值得觀察的思考觀點。鄭氏認為，要尋找到符合兼具「完全不肯通融苟且」與「耐勞」的人材，才

¹¹ 康有為曾謂：「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參見康有為編，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1953年刊本），頁42。

¹² 鄭孝胥，〈趨府〉，《海藏樓詩集》，頁74。

¹³ 與變法維新的「意圖」相比，鄭孝胥對於大力鼓吹變法維新的主要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則有所批評。他以康有為的著作《新學偽經考》為由，批評康有為「類病狂者之所為」，謂其言論過於荒誕；而對梁啟超、譚嗣同等「新朝進士」，則論其「以蕩檢逾闌為才氣，以奔竟招搖為作用」，批評這些康有為的追隨者是「不能成氣候，而興亂則有餘」。戊戌政變後，鄭更以「半瓶醋」來比喻康、梁兩人矣。

¹⁴ 淞滬鐵路是中國最早建成的一條鐵路，原為吳淞鐵路，由英資怡和洋行投資興建，1876年7月3日，從天后宮北（河南北路、塘沽路口）到江灣段通車營業，引起轟動。8月3日，因碾斃一名士兵，沿途居民阻止列車繼續運行。10月24日，清政府出銀28萬餘兩買下，並於次年10月予以拆毀。1897年，盛宣懷重建該條鐵路，1898年9月1日通車。

¹⁵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7年8月29日條，頁614。

能有效管理這中國第一條鐵路。值得注意者，他認為這樣的人材並非英國人，也非德國人，更非美國人，而是出自日本。鄭孝胥的評論除了可以看出他對於鐵路政策方面的注意與關心，尤重要者，是他認為日本人材具有某些西方國家人材所未具備的特性與優點。而這些特性與優點，正可供當時的中國來加以運用。此一看法將對鄭孝胥往後的生涯造成巨大的影響。與甲午戰爭時的對日觀感相比，鄭孝胥調整了他對於日本的態度，敵視不再是唯一的選項。

除了鐵路路政，外交情勢的發展也是鄭孝胥相當關注的一個部分。筆者已於前文說明，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鄭氏便提出中日兩國應聯手共同抵禦俄國對於亞洲大陸的侵略意圖之主張；待清廷於甲午戰爭戰敗，即將與日本換訂《馬關條約》之刻，他又提出引進英國勢力來制衡日本的想法。對應著國際情勢的詭譎多變，鄭孝胥不斷發展與改變自己的外交觀點，而其立意無疑是希望為當時的清廷尋求一個最有利的外交立場。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所發生的膠州灣事件，¹⁶便是一個觀察鄭孝胥外交觀點的佳例。

在德國向清廷強行租借膠州灣的事件發生後，鄭孝胥再一次對中國外交情勢的險峻感到憂心忡忡，並發「天下可拭目以觀中國之狼狽矣」之嘆。¹⁷然而此一事件不單僅造成中國方面的損失，西方列強與日本均將膠州灣事件視為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指標。俄國在中國政策上以領土擴張為優先要務，而攫取不凍之海港更是此一政策的最主要目標。¹⁸眼見德國不花一兵一卒，就可順利占有膠州灣，俄國欲於中國取得不凍海港的企圖愈更加明顯。因此俄國便以協助清廷向德國交涉膠州灣事宜為理由，派遣艦隊駛往遼東半島，並要中國方面擇一港口供其停靠，「以示各國中俄聯盟之證」，¹⁹1897年12月，俄國艦隊強行駛入旅順過冬。俄國的此一舉動造成英國與日本的震動與緊張。英國因感其於中國之利益受到嚴重威脅，於是願意支持中國拒絕俄國欲占領旅順地區的意圖。日本對於俄國的舉動更形緊張。自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以後，日本即以俄國為最大之假想敵而大舉擴

¹⁶ 在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事件之後，有鑑於西方各國在東亞多擁有軍事基地可供經營亞洲大陸的事務，如英國據有香港，法國控制越南的北部港，俄國亦占領著膠東一帶等等，德國也希望能在遠東攫取一處島嶼或港灣，以作為軍勢與商務基地之用途。於是德國以兩名德國傳教士於1897年7月11日在山東被殺害之事件，向清廷強行租借膠州灣，租期99年，此為「膠州灣事件」。

¹⁷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7年12月18日條，頁633。

¹⁸ 王曾才，《中英外交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79），頁89。

¹⁹ 時使俄大使楊儒(?-1902)，曾在電報中謂俄國政府提到「德事願效力而難於措詞，或請中國指定港口，俾泊俄艦，示各國中俄聯盟之證」。然楊儒也感受到俄國之用意非善，而有「貌示交好，恐不足恃」的評語。參見楊儒，〈使俄楊儒致總署俄外部云德事願效力但俄貌示交好恐不足恃電〉，收入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第127卷，頁27-28。

軍，而日俄在朝鮮半島上的利益衝突更使兩國之間的局勢愈加緊張。²⁰雖然日本與俄國曾在 1896 年 5 月與 6 月簽訂備忘錄及議定書，明確規定兩國在朝鮮半島的均勢，²¹但俄國依然持續進行對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地區的滲透之意圖，致使日本對俄國的作為感到不滿與恐懼，兩國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就在這樣子的激化之下，促使日本與英國因阻止俄國在華擴張的立場相同，逐漸相互攀援。²²

得知日英兩國逐漸交好的消息，對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來說，是具有相當程度之激勵作用的。與李鴻章聯俄制日的外交立場不同，張之洞向來將俄國視為中國最大的假想敵。²³至甲午戰爭爆發，張之洞曾經主張聯英以制日，「英遠倭近，英緩倭急，英乃強鄰尚存大體，倭乃兇盜毫無天理」。²⁴待清廷與日本的戰事結束後，張之洞又回復先前聯絡其他各國抵抗俄國的立場。由於日本甚為重視清廷部分重臣在朝廷中央與地方的影響力，²⁵並察覺到張之洞抗俄的態度，日本便於 1897 年底派人對他進行遊說，目的在於希望能夠藉此使張之洞接受聯英日拒俄德的看法，進而影響清廷當局對於外交事務的規劃與走向。

事實上，日本方面的努力的確起了作用。自日本使臣神尾光臣(1855-1927)、宇都宮太郎(1861-1922)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上旬(1899 年 1 月)抵達湖北進行遊說後，張之洞認為日本感於唇亡齒寒的道理，「中國固危，倭四面皆受強鄰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聯英聯中以抗俄、德，而徒自保」，因此其聯絡中國的意圖乃發自於至誠。²⁶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說法後，張之洞連上了數道電奏給位於京畿的總理衙門，內容均在強調為對抗俄、德的聯手，中國應該正視與英、日結盟

²⁰ 張富強，〈「三國還遼」前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及其外交轉折〉，收入中研院近史所主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頁 122-129。

²¹ 日本雖然藉由中日甲午戰爭而將中國於朝鮮的影響力削弱至最低點，也加強了對於朝鮮政權的控制力。但這也導致朝鮮人民的反抗，並造成俄國勢力趁虛而入，而有朝鮮親俄派勢力的抬頭。為避免衝突擴大，因此兩國簽訂條約，規限彼此對朝鮮的介入程度。參見依田憲家著，卞立強等譯，《簡明日本通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頁 258-259。

²² 日本在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發生後，始知如欲往中國擴張勢力範圍，必須與歐美列強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才能維護與保證自身在華的利益。而在 1895 年，就有「必於俄英兩國擇一家以攬絡」的主張出現於日本政壇中。後因日俄兩國在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問題上的矛盾，日本便希望拉攏英國對抗之。英國方面也希望藉由日本來牽制俄國對東亞地區的侵略腳步，促使兩國在 1902 年簽訂了第一次同盟條約與軍事協定。

²³ 在張之洞的外交體系思想中，「借力使力」與「連結英日」是其主要的特點，其中心思想是與海權國家交結合作，因此必須對陸權國家的俄國加以提防；而李鴻章則認為陸權國家才是清廷利益與共的對象，並主張恃俄國為強援的態度，兩人的外交思想是大相逕庭的。參見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 344-350。

²⁴ 張之洞，〈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致總署電〉，收入苑書義、孫華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三冊（北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 2041。

²⁵ 除了張之洞以外，日本亦派員向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1831-1900)遊說，也對其造成了影響。參見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0），頁 153-154。

²⁶ 張之洞，〈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致總署電〉，收入苑書義、孫華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三冊，頁 2112。

的可能性。²⁷張之洞提出結盟的著眼處，在於清廷如與英、日同盟，除了可以抵抗德、俄結盟後對中國的侵略意圖以外，更可以夷制夷，「豫(預)防而羈縻之，免其硬占橫行」，²⁸將英日兩國對於中國的擴張可能性降到最低。這才是張之洞提倡聯英日以制德俄的真正意涵。不過總理衙門方面對張之洞的提議並不重視。以「若遽連橫，恐北方之患必起」為由，²⁹認為如中國明確表態與英、日結盟的立場，必立將遭受德、俄兩國的攻擊與威脅，造成不可收拾之後果。況且考量各國均以自身的外交利益為優先要務，貿然決定同盟將是不智之舉，於是婉拒了張之洞的建議。

關心國際局勢的鄭孝胥很快了解到當時東亞外交情勢的走向，並感受到張之洞欲利用日、英與德、俄兩者之間於中國擴張領土的立場的矛盾，試圖阻止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與瓜分之意圖。在一次前往謁見張之洞的行程中，鄭孝胥自張之洞處得知日本曾使人來勸聯英拒德一事，提出自己的見解：

所言日本使人來勸聯英拒德事。南皮欲余皆日人川上者赴日一行，而電奏尚未奉旨。余曰：「日人既有此意，胡不言之於總署？宜令彼公使自言，而我公助之乃可爾。」南皮曰：「此事宜熟計。」³⁰

根據張之洞的電奏內容，鄭孝胥所提到的「日人川上」，為日本陸軍二等提督川上操六(1848-1899)。經過游說之後，張之洞除了希望朝廷中央能早日處理與英日結盟的問題，更預擬派鄭孝胥赴日，來探查日本方面的情形。如前所述，鄭氏發現到張之洞對於聯英日之舉的熱切期盼，已然近乎衝動的程度。因此他勸告張之洞，茲事體大，必須謹慎從事。張之洞也接受了鄭孝胥的勸言。

基本上，對於聯合英日的外交策略，鄭孝胥採取認同的立場。雖然他希望張之洞對此舉應以謹慎的態度來處理，以避免因過分急切而招致不必要的損失，不過鄭氏對張之洞有意派遣自己再赴日本擔任外交說客，聯絡兩國之間的合作事宜，則是感到相當振奮。在與友人的一席對談中，鄭孝胥透露了自己躍躍欲試的興奮心情：

²⁷ 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三年的十二月(1898年1月)一個月中，共發了九封電報，其電報內容多提及與英、日同盟的重要性與急切性，並希望清廷中央能審慎重視。但清廷中央擔憂若真與英日同盟，勢必激怒俄國，而遭受不可想像的禍害。因此對於張之洞的提議，並未採行。

²⁸ 張之洞，〈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未刻致總署電〉，收入苑書義、孫華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三冊，頁2115。

²⁹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戌刻總署來電〉，同前書，頁2113。

³⁰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8年1月8日條，頁636。

今中國事急，我輩匹夫雖懷濟世之具，勢不得展，固也，有機會於此，日本方欲聯中國以自壯，如令孝胥游於日本，歲資以數千金，恣使交結豪酋及國中文人，不過年餘，當可傾動數萬人，下能輔中原之民會，上可助朝廷之交涉。脫諸戎肆毒於華夏，則借日人之力以鼓各省之氣。興中國，強亞洲，庶幾可為也。昔漢高與陳平金三萬斤使謀西楚，張魏公假園中老兵數十萬金使賈海外，嗚呼，今不復有斯人耶？³¹

從這段話來加以觀察，鄭孝胥相當殷切期盼自己能有再度赴日以擔任說客的契機，並毛遂自薦之。尋找一個適當的舞臺，以供自己實現經世濟民的理想，正是數千年來中國士子最為關注的一個人生目標。如今年近不惑的鄭孝胥，熱切希望自己能夠得到清廷的全力支持，讓他能夠在日本交結官吏與士民，並憑藉這些人脈所帶來的影響力而推動中國的興盛，進而使整個亞洲更為強大，不再屈於西方列國之下。在此可以看出鄭孝胥將日本定位為「可一同致力於興盛亞洲」的伙伴性質，與早先駐日時所透露出只要「仿日」即可的態度可謂更深了一層，突顯出他對於日本觀感的轉變程度。他還以漢代名臣陳平與南宋抗金名將張俊為例，³²來比喻自己若能實現理想，其貢獻將能與這兩人之事蹟並駕齊驅。由此觀之，鄭孝胥對於自己若能赴日進行遊說工作所帶來的成就，充滿了自信、企盼與期待；而他對於中日兩國如能攜手合作而產生的正面作用與影響，更是抱持著十分樂觀的態度。

儘管由於總理衙門的反對，張之洞的攏絡英、日之主張並未獲得清廷的採行，鄭孝胥的企盼再度落空，但並無損鄭孝胥把日本當作「興亞洲」伙伴的觀點與認知。同年(1898)五月「亞細亞協會」在上海的成立，則更進一步證明了並非僅有鄭氏抱持此種觀念，聯合日本以興亞的主張，可謂為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思潮之一。由於膠州灣事件引發的刺激之下，「聯英日以防德俄」的主張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力漸深，這對於主張清廷在外交事務上應盡速聯日的人士，如鄭孝胥、鄭觀應(1842-1922)等人來說，³³無疑的增強了他們的信心，此乃亞細亞協會

³¹ 鄭孝胥的記憶或許有誤。根據《史記》記載，漢高祖劉邦給了陳平四萬金去從事對項羽勢力的離間工作，而非鄭孝胥於此處所提到的三萬金。參見司馬遷著，《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2055；《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8年2月20日條，頁643-644。

³² 此處亦為鄭孝胥謬誤之處。文中提及「張魏公假園中老兵數十萬金使賈海外」一事，並非張浚事跡，而是張俊(1086-1154)之軼事。參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69。

³³ 鄭觀應向主聯夷制夷之思想，然而其聯盟對象又因時而異。光緒十年(1884)他力主中英結盟，以抗俄、日。三國干涉遼遼時期，則有聯俄的傾向，後又主聯英、日以抗俄。大抵來說，他對英、日印象較佳。針對聯日之主張，他呼籲清廷應該早日忘去兩國在甲午戰爭中的仇恨而與日本合作：「惟同在亞洲互相攻擊，唇亡則齒寒，徒為漁人得利。中國宜開誠布公，勿念前

出現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則是創立於 1880 年的日本政治團體「興亞會」長久以來對於中國的影響。³⁴藉由當時的日本駐上海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1868-1934)幫助下，鄭孝胥與鄭觀應開始擬定亞細亞協會的相關規定與宗旨，希望讓此一協會步上軌道而順利運行。

就在擬定亞細亞協會章程的過程中，鄭孝胥與日本領事小田切卻出現了立場相左的局面。雙方爭議的焦點在於《亞細亞協會創辦大旨》的最後一條協定，其內容如下：

本會或遇有同洲有失和之事，在會諸人皆宜設法排解，使歸親睦。

35

針對這條約定，日本代表小田切因無法給予確切的承諾，而不願將這條規約加入《亞細亞協會創辦大旨》中。然而此條乃是亞細亞協會創立的根本要旨，鄭孝胥對此絕不退讓，並嚴正的申明了自己的態度：

鄭陶齋(鄭觀應)來字，云所擬第六條協會大旨，日本領事小田切欲刪去……余曰：「此不可去，必去此條，僕當辭會。」³⁶

其後鄭觀應為解決兩者之間的重大歧見，而提出了解決的方法：條目仍擬，但在條文下方加註「日本會員有不願廝(斯)條者」，³⁷鄭孝胥與小田切勉強接受這一個折衷方案，亞細亞協會才得以繼續下去。此一事件的發生對雙方都造成了影響。就日本方面來說，此後以亞細亞協會名義所舉辦的聚會，小田切為避免尷尬都沒有出席；而對於鄭孝胥來說，這個事件則讓他對日本產生了些許的疑慮，並降低了鄭氏對於亞細亞協會的興趣與參與程度，³⁸而將其焦點擺在對光緒帝與康有為等人推行的戊戌變法上。

仇，亦與日合……庶不為西半球各國所侵害也。」參見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頁 142-143；鄭觀應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799。

³⁴ 日本興亞會於 1880 年在東京成立，前身為清廷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與當時的日本內務卿大久保利通(1830-1878)發起成立的「振亞社」。興亞會設有中國語學校，而小田切萬壽之助即為該校學生。興亞會的成員於 1880 年代初期常至中國上海活動，並對上海的知識界發生影響。

³⁵ 鄭觀應，〈亞細亞協會創辦大旨〉，收入鄭觀應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218。

³⁶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8 年 6 月 6 日條，頁 659。

³⁷ 此為《鄭觀應集》的內容，鄭孝胥在其日記內則記載「日本會員有不欲存此條者」。參見鄭觀應，〈亞細亞協會創辦大旨〉，收入鄭觀應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頁 218；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8 年 6 月 6 日條，頁 659。

³⁸ 易惠莉，〈鄭觀應評傳〉，收入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545-547。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6月)，在看完康有為所進呈的著名作品《俄彼德變政記》與《日本變政考》後，光緒帝決意學習日本，下詔「明定國是」，要以明治維新為藍圖推行革新與變法，試圖振興頹舊的滿清帝國。正當戊戌變法迅速的在中國推行之際，同年八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將來華參訪的消息震撼了中國的政壇與知識界。日本對於清廷推行的變法與革新過程一直有所觀察。與日本民間對於戊戌維新採取同情、積極支持，或呼籲給予援助的立場大為不同，³⁹日本政府當局對於戊戌維新的態度是多頭進行的。日本政府優先關切的是清廷內部掌權集團的消長與變化。如此一來，日本才能藉由中國局勢的變化來為自身謀求在華的最大利益。⁴⁰同時，他們持續對於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滿清官員如張之洞、劉坤一等，或是思想較開放，偏向主張聯日的士人如譚嗣同(1865-1898)、唐才常(1867-1900)等進行遊說，希望增進他們對日本的友好程度以圖拉攏。⁴¹

1898年6月，大隈重信(1838-1922)接替伊藤博文組閣。成為在野政客的伊藤博文，透露將往朝鮮與中國一遊的行程。消息傳到中國後，隨即在中國政壇掀起一陣波瀾。雖然伊藤博文宣稱並無肩負日本官方之外交使命，而是以私人的身分來中國遊歷，然而因正逢推行戊戌變法之際，伊藤來訪的消息格外引起注目。由於伊藤博文在明治維新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維新派士人因而甚為振奮，認為這將是深入了解日本明治維新不可或缺的良機。另一方面，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人士對伊藤的來訪則懷有戒慎之心。守舊派勢力擔憂伊藤此行之目的，在於傳達日本政府支持維新派人士的決定。若果真如此，他們要密謀傾翻以光緒帝為代表的維新勢力將更為艱難。⁴²綜和上述，伊藤博文來訪的消息受到中國政壇的強烈注目，是顯而易見的。

針對伊藤博文的來訪，關注於維新變法發展的鄭孝胥又抱持何種看法？在接獲伊藤博文即將來華的消息後，鄭孝胥於光緒二十四年的七月底(1898年8月中旬)與張之洞曾就這一事件與戊戌變法的局勢互相討論，鄭孝胥先是述說自己對於維新變法的成敗持悲觀態度，並提到他對於伊藤博文一事的看法：

南皮邀入談，在抱冰堂。余極論宜及時破蠲積習以天下之志氣，因言：「舉世方共保護積弊，非變法之世也。今京師元黃顛沛，是非混淆，觀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兩湖，天下之中，亟當養士、勸商、

³⁹ 王曉秋，《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北京：崑崙出版社，2005），頁131-133。

⁴⁰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0），頁177。

⁴¹ 茅海建、鄭匡民，〈日本政府對於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收入《歷史研究》第3期(2004)，頁64。

⁴² 王曉秋，《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頁120。

興工、勵吏，以待北方之變。」又勸俟伊藤博文來華，可薦為客卿。

南皮甚震其論而不能用也。⁴³

戊戌變法甫推行兩月，鄭孝胥已不認為這些維新派士人將會有所成就，也無法為中國帶來正面的效益。正因如此，鄭氏希望張之洞能夠養精蓄銳，以待維新派失勢後能重回清廷的權力中心圈。值得注意者，在於鄭孝胥提議張之洞可在伊藤博文訪華後邀聘為客卿，並借其才智與經驗來幫助中國，進而實行較為妥善的改革方式。然則張之洞認為鄭孝胥的觀點太過激進，尤以養士以待京城變局之論，讓張之洞無法接受而未加以採行。

對照於中國維新派士人對於伊藤到來的期待，這位日本前首相於 1898 年的 9 月中旬抵達中國。不過在伊藤與康有為見面並長談過後，雙方對於日本支持清廷維新派士人的討論並無太多交集，康有為對這次會談也僅留下了「故見伊藤博文而不請救援」的話語。⁴⁴伊藤博文雖在與 9 月 20 日與光緒帝會面後，翌日即爆發政變。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光緒帝則被幽禁，維新派官吏或士民多被罷黜或問監判刑，戊戌維新也以失敗作收。由於政局丕變，伊藤博文僅能在拜會張之洞與劉坤一後，於 1898 年 10 月下旬返日。綜合以上所述，鄭孝胥將伊藤博文來訪視為能對中國改革帶來正面之效用一事，是可以確定的。他並不希望由那些「不足有成」的維新派士人出面來聘請伊藤任其顧問，而是以夙負盛名的滿清重臣如張之洞等上奏薦之，以免浪費了這個大好良機。但鄭孝胥的主張並未實現。除了張之洞的反對以外，鄭氏亦無法料及政局的巨大轉變。伴隨著戊戌維新的結束，鄭孝胥辭去了他在總理衙門的職位，⁴⁵再度回到武昌擔任張之洞的幕客參謀。

綜合前論，戊戌變法的施行促使鄭孝胥對於日本的立場又重新回到較為友好的傾向，也讓鄭氏感受到日本似乎有意幫助中國進行改革，卻因戊戌政變的發生而嘎然中止。此後鄭孝胥對於日本的立場或印象將會隨著中、日之間的局勢而有何改變？筆者將在下文中繼續說明。

⁴³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8 年 8 月 13 日條，頁 671。

⁴⁴ 康同壁編，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 1953 年刊本），頁 60。

⁴⁵ 鄭孝胥曾受光緒帝之召見，並於 1898 年 9 月 4 日到 5 日入宮陳策，建議光緒應早日練就一支常備兵，以供國家使用。後光緒帝於 9 月 10 日諭鄭孝胥「以道員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鄭氏始得直接參與清廷最高決策機關的資格。參見鄭孝胥，〈七月二十召對紀恩〉，《海藏樓詩集》，頁 88-89；《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8 年 9 月 5 日條、9 月 9 日條，頁 675-678。

第二節 多變的日本「印象」

為避免受到當時朝廷大肆搜捕維新派士人的風波連累，鄭孝胥回任張之洞幕下。或許是對當時的政局感到灰心，亦不滿於慈禧太后把持朝政，⁴⁶鄭氏對於政情顯得不若以往關切，而是將心力投注於他最感興趣的鐵路上，出任京漢鐵路的南段總辦，及兼任漢口鐵路學堂校長，以培養相關人才。⁴⁷在這段時間中，鄭孝胥對日本的評論甚少，以及與日本之間的互動也降至低點，僅提出清廷當局必須妥善處理停留於日本並受其保護的康有為、梁啟超一事。⁴⁸直到光緒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爆發了義和團事件後，鄭孝胥才重新把焦點轉回於對清廷政局的關心，並勸告張之洞必須穩定江南情勢，以避免亂象與戰火從直隸與山東一帶繼續往華中、華南地區蔓延。⁴⁹至光緒二十九年一月(1903年2月)，鄭孝胥才應張之洞命，卸下在漢口的鐵路路政職位，赴上海出任製造局總辦。後旋因廣西亂起，受時任兩廣總督的岑春煊(1861-1933)之薦，同年六月被任命為廣西邊防督辦，並率湖北新軍部隊武建軍至廣西龍州平亂。因甚為有功，當時皆稱鄭孝胥為「鄭龍州」。

為了平定廣西邊境盜匪之亂，鄭孝胥於廣西的施政均偏重於軍備與彈劾舊任官員方面，以求迅速壓制亂局。待局勢平穩後，鄭氏便開始進行內政方面的工作，同時大力支持與推動廣西學生至日本留學，希望能為廣西一地培養出熟悉國際局勢與實務的人才。⁵⁰鄭孝胥鼓勵優秀子弟前往日本留學的思想其來有自。早在1901年，鄭氏便有意派其子姪學習農務，後卻因故未決。⁵¹與支持留學制度相呼應的，是他對於科舉制度的不滿。在清廷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科舉以前，鄭孝胥對於這個已經持續千餘年，並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官吏選拔主要制度頗有微詞：

有陶模奏辦大學堂及武備學堂二折，請罷科舉以免學堂之阻礙。其論甚當。余昨語陳士可曰：「子見西人之檢疫乎？船來自有疫口岸

⁴⁶ 鄭孝胥曾於日記中嚴厲批評慈禧干預朝政，論其「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昌被如此，其能久乎？」同前書，1898年12月6日條，頁699。

⁴⁷ 《鄭孝胥年譜簡編》，收入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頁584。

⁴⁸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898年12月20日條，頁702-703。

⁴⁹ 鄭孝胥向張之洞轉達列強的意願，希望張與劉坤一能夠「正拳匪之罪」，才能夠「保兩宮、全中國」，當下張之洞雖未能立即決定，然其後還是與李鴻章、盛宣懷、劉坤一等人提出「東南戶保」的協定，在東南各省違抗清廷中央要求支持義和團的命令，避免八國聯軍進攻江南。同前書，1900年7月9日條，頁762。

⁵⁰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頁146-154。

⁵¹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901年4月20日條，頁791。

者，嚴查入口，懼傳染也。今聚萬人於狴犴之中，寒暑飢疲，勞困焦思，更番以磨折之，使惡疫乘虛而熾，然後散於全省，是誠布疫之善法，吾不知其為科舉也。」⁵²

結合自己於科舉應試過程中的痛苦經驗，⁵³鄭孝胥更以防疫為例，巧妙的來暗喻他對於科舉制度的疑慮與不滿。這在當時中國傳統士民的識見中是甚為特殊的。此外，鄭孝胥考運非佳，雖在鄉試中考取第一，但在會試中卻名落孫山。因此在科舉中的不愉快，也連帶影響了鄭孝胥對於此一制度的好惡。

看出培養人才的急迫與重要，鄭孝胥於 1905 年 2 月起，與當時的廣西學政汪貽書(1864-?)選擇出幾位「文行較優」的廣西優秀子弟送往日本，學習各種學門的技藝與知識，並開始為這些留學生籌措經費，以供其安心學習。同時並希望能設立新式學堂，進而廣召於各學門有所專精者以充任教授。⁵⁴針對此點，汪貽書曾讚揚鄭孝胥的用意深遠。在復汪貽書的回信中，鄭孝胥提及了他對於派送中國子弟往日本留學的用意：

經營邊庭之策，非公(指汪貽書)有心人，孰能見及於此。雖在極陋之區，但有出洋遊學者數人，此地即未可輕視。胥縱病困垂去，猶欲勉任是事。前已送歸順曾嘯一人在日本，現仍將續籌遣學，以盡力為度。必有豪傑知我，不求諒於庸子也。⁵⁵

這段話充分說明了鄭孝胥的立意。他希望藉由將優秀子弟送往日本深造的這一個過程，讓廣西一地逐漸與國際潮流接軌，扭轉外界向來將廣西視為蠻荒地區的固有觀感。除此之外，鄭孝胥更可以此為起點，來實現自己長久以來對於改革的主張。在前文中，筆者已論述過鄭孝胥的改革思想，乃以效法日本的工業、鐵路與軍制為主要之訴求。而今他便從派遣人才到日本學習相關知識為起點，待這些優秀子弟學成歸國之後，自然就成為他實施改革的最佳助手與班底。⁵⁶首次感到距離自己的理想如此接近，鄭孝胥相當興奮。在預定上奏朝廷的奏章上，他也將送派學生出國一事，視為自己的得意政績。⁵⁷而有感於鄭孝胥對於留學的積極態

⁵² 同前書，1902 年 9 月 14 日條，頁 844。

⁵³ 鄭孝胥對自己在鄉試中的痛苦經歷有很生動的描述。他提到當時考場的天氣炎熱與不合理之處：「天狂熱，號中三步則設一爐，火光常熊熊，烘人焦躁欲死。」大抵這也刻劃出千餘年來應考士人的心聲。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一冊，1982 年 9 月 20 日、21 日條，頁 24-25。

⁵⁴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905 年 2 月 19 日條，頁 977。

⁵⁵ 同前書，1905 年 2 月 20 日條，頁 977。

⁵⁶ 鄭氏大力推廣廣西青年才俊前往日本遊學的時間點(1905-1906)，正是中國留學史上留日學生人數的最高峰。參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75)，頁 24-25。

⁵⁷ 鄭孝胥在其奏章《奏陳邊事三條》中提到自己在廣西的三大政績，分別是鋪設電線、練兵，

度，甚多龍州子弟亦登門拜訪鄭孝胥，向其透露對於遊學日本的期望，並希望鄭氏能夠在費用一事上加以資助。⁵⁸甚至在卸下廣西邊防督辦一職後，鄭孝胥依然對留學政策的推動與關注相當關切，在生活中見有優秀人才仍不忘勸說至日本學藝。⁵⁹由此可見，此時的鄭孝胥是將日本視為一個可讓中國人才精研專業知識與技術的重要媒介，可謂承續了早先鄭孝胥於戊戌變法中將日本視為「興亞洲」伙伴的思想脈絡。

自邊防督辦離職後，鄭孝胥的身分回歸為一介文人，並赴上海閑居。除至南京與友人討論時事與吟詩作對以外，他幾乎都在上海活動。⁶⁰肇因於 1842 年所簽訂的中英條約，上海於隔年成為中國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英國、美國和法國均陸續在上海設立居留地，此後逐漸演變成各國經營遠東的重要基地。自此時起，上海在中國與其他列強之國際關係中，具有樞紐性的地位。⁶¹正因如此，要稱當時的上海為遠東最富有國際化氣息的城市之一，亦不為過。身處於這個與國際脈動關聯異常深厚的城市，鄭孝胥的國際觀也隨之轉化與進步。雖未能於官場有所發揮，然而他對於濟世治民的理想仍一往初衷。鄭孝胥曾與友人提到對時下官吏識見短淺之不滿，並述說自己對於當時中國與國際情勢的觀察：

凡人胸有建功立名、安民濟世之志者，此如小兒帶有胎毒，將發天花，輕則傷面目，眾則喪性命，惟有輕世肆志之學足以救之；此如西法種痘者，預收其毒，使不得發。吾已種痘，當可免矣……今之用世者，率皆有分黨排外之見塞其胸中，則有賢者，亦無洞知中國之全體，欲救其危，毋怪其無從下手耳。生於今世紀而為亞洲人，宜通曉今世亞洲關於地球列國之趨勢，使我開通亞洲，只擇其大者急者扼要下手，則各國歷年所侵之亞洲，其經營之力皆不啻為我效力而已。此如西比(伯)利亞之鐵道，帕那馬(巴拿馬)之運河，一成之日，舉世旋轉而不自知，烏能區區爭論治理國際上之末務哉。⁶²

於此，鄭氏再度藉由疾病防治的觀念，來借喻他對時勢之看法。首先說明自己與當世其他懷有經世濟民之心的人才的不同處，在於鄭孝胥並不介意世俗的觀點並

以及派遣子弟赴日學習，待歸國後以興農工。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二冊，1905 年 4 月 17 日條，頁 987。

⁵⁸ 同前書，1905 年 10 月 9 日條，頁 1015。

⁵⁹ 同前書，1905 年 12 月 20 日條，頁 1021。

⁶⁰ 《鄭孝胥年譜簡編》，收入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頁 586。

⁶¹ 朱弘，〈近代上海的興起，1843-1862〉，收入汪暉、余國良編，《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 6-11。

⁶²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09 年 3 月 18 日條，頁 1181。

恣意而為之，也就是他所謂的「輕世肆志」。接著話鋒一轉，鄭孝胥將其觀察的框架從中國放大至亞洲，乃至於世界。他痛論舉世有心欲使中國進步者，不是汲汲於樹黨立派以分其利益，就是未能具有洞察中國整體局勢走向的能力，致使不知從何下手以圖改革。然若當局用鄭孝胥來主事改革，他自會從「其大者」、「急者」來著手開通，屆時中國便能與世界接軌而強盛，而不再僅限於只能與列強商訂不平等條約的困境之中。至於鄭孝胥心中的「至大至急者」為何？其答案甚為明顯，就是他素來所熱衷並關心的鐵路。若能建成一條鐵路開通中國與亞洲的關聯，中國便可將長久以來低劣的國際地位加以逆轉，而讓列強之力均為中國所用矣。鄭孝胥的意圖可謂深遠，只缺乏加以實現的契機與舞臺。宣統元年(1909)冬，東三省總督錫良(1853-1917)聽聞鄭孝胥對於鐵路路政的專業能力與素養，便決定邀約他至奉天規劃錦州至瑯瑯之鐵路(以下皆稱錦瑯鐵路)的相關事宜。這對鄭孝胥來說，正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大好機會。

投身於錦瑯鐵路的規劃之後，鄭孝胥開始研究相關問題，其中尤以東三省開放與否一事最受鄭氏之矚目。自清季以來，由於蘊藏著豐富的資源以及極具戰略價值之緣故，中國的東三省地區便是各國急欲占領或從中獲取利益的必爭之地，其中又以日、俄兩國對此地區的搶奪最為激烈。至 1904 年，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矛盾到達白熱化，乃有日俄戰爭的發生。這場戰爭直到隔年九月才結束，獲勝的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勢力範圍大增。其中最重要者，就是獲得了南滿鐵路的控制權。⁶³為避免被看作是發源地的東三省即將落入日、俄的控制中，清廷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1907 年 4 月)對東三省地方制度實施改革，並增設總督、巡撫等官職，表面上是方便管理，實際上是希望能引進各國之勢力與日、俄兩國相抗衡，⁶⁴但此一措施成效並不甚大。有鑑於此，錫良與當時的奉天巡撫程德全(1860-1930)提出引進美國方面的勢力與資本，⁶⁵建造一條平行於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新鐵路，來與日、俄兩國競爭，這便是錦瑯鐵路的興建背景。

那麼鄭孝胥對日、俄兩國在東北的控制，以及引進外國勢力以抗衡的措施又有何看法？當時新設的奉天諮議局對開放外國勢力來興建錦瑯鐵路抱持著反對

⁶³ 南滿鐵路，本屬於俄國所興建的中東鐵路南下支線的長春至旅順段，在 1897 年 8 月與中東鐵路幹線同時動工，至 1902 年 12 月完工，於 1903 年 7 月通車。日俄戰爭結束後，兩國於 1905 年的《朴次茅斯和約》規定以長春寬城子站為界，以南的中東鐵路交給日本，即改稱為南滿鐵路。

⁶⁴ 陶文釗，〈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1905-1910)〉，收入中研院近史所主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162。

⁶⁵ 錫良，〈錫良、程德全致樞垣遵旨籌借洋款議築錦瑯鐵路電〉，收入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宣統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第 9 卷，頁 33-34。

的看法，他們認為此舉將會引狼入室，造成不可彌補的後果。然而錫良的立場甚為堅決，就算丟官都在所不惜。對此，鄭孝胥提到了他的看法：

余告之(指錫良)曰：「民不信官，故有此見，不足怪也。然閉門非策，能擇人與之馳逐，外人亦不足懼。」⁶⁶

鄭氏對於開放東三省讓外國勢力進入之措施無疑是贊成的。對他來說，俄國與日本現今的定位是威脅中國於東北之主權的潛在敵人，尤以俄國為甚。但他對於當地人民會持反對的聲音也不感到意外。當地人民之所以會加以反對，是擔心若再開放別國勢力，會不會與日、俄狼狽為奸，讓自己的家鄉受到更大的危機？鄭孝胥認為，這是人民對國際情勢未能有所了解所造成，連帶使得他們不能明白錫良欲以引進他國勢力來制衡日、俄對東北的野心。因此鄭孝胥前往位於北京的資政院⁶⁷，和奉天的資政院代表們展開溝通：

錫帥(指錫良)主開放，是也；然必官對於民先行開放，使三省人民皆能起作主人，而能〔後〕可言對外開放耳。錫帥嘗托人邀我，如東三省人民願以我為總代表，實行開放之策，則吾當借箸一籌。⁶⁸

向奉天代表們說明來意之後，鄭孝胥除了希望當地民意可以支持官府的決定，更自詡未來能夠作為東三省的人民代表，為他們籌設將來開放之後的相關措施與配套作法。在鄭孝胥辛勤的奔走之下，待他於宣統二年正月(1910年2月)抵達奉天時，當地人民對於官府預定開放外國勢力的反對聲浪，已不如當初激烈。而為求早日能夠通盤了解東三省的概況，並洞悉當時各國於東三省的立場，如同當初首次赴日一般，於奉天暫時安頓後，鄭孝胥開始大量的閱讀相關的文件與書籍，亦由各種報刊上的相關報導來獲悉列強如俄國、日本、美國與英國等，對東三省的態度與策略；對於清廷於此地的人事沿革及措施，也是鄭孝胥觀察的一個重點。鄭氏為求慎重，更將大篇幅的將相關報導與知識或全抄，或節錄在《日記》中，以作為未來規畫與研究的根據。⁶⁹

察覺到中國即將引進美國勢力，並尋求英國方面的支持以建築新的鐵路來與自己的中東鐵路競爭，眼見自己的利益即將失去，俄國自然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

⁶⁶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0年1月3日條，頁1221。

⁶⁷ 清末立憲運動的議會準備機構。成立於1910年9月，終止於1912年初。由民國臨時參議院替代。資政院屬於中央機關，在各省則設諮議局，清廷希望以資政院與諮議局來奠定中國的議會制度基礎，待制度與風氣上軌道，才真正實行國會制度。

⁶⁸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0年1月4日條，頁1221。

⁶⁹ 鄭孝胥在宣統二年正月的日記中，可說是鉅細靡遺的將有關東三省的各類知識與現況記載於其中，一連持續十數天。同前書，1910年2月16日-27日條，頁1232-1237。

發生，而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可說是唇亡齒寒，因此日本的立場無疑與俄國相同。待中美雙方簽訂有關興建錦瑗鐵路的合同之後，日、俄兩國同時對中國與美國的外交機關發出嚴正聲明以表達抗議，俄國方面希望中國能夠放棄與美國共同建造錦瑗鐵路的計畫，而是與俄國合作，建造張家口到恰克圖的鐵路；⁷⁰日本駐中國的大使伊集院彥吉(1864-1924)更是寄發了立場相當強烈的信函，以近似恫嚇的語氣意圖阻止中國與美國共同興建錦瑗鐵路的決定。⁷¹

日俄兩國的反應已在鄭孝胥的預料之中。倘若迫於日、俄之壓力而放棄興建，又會與美國產生嫌隙。與日本的反應比較起來，鄭氏較關注俄國的態度，並打算以《樸資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中的條文來予以說明俄國此舉將危害到中國之主權並違反機會均等主義之嫌，同時也表達中國如有意於東三省興建鐵路，任何國家都沒有干預的權利。⁷²對此，鄭孝胥可謂是信心滿滿。從他與錫良商討如何解決錦瑗鐵路的問題之對話，就可看出鄭孝胥的從容：

清帥(指錫良)赴就於談錦愛(瑗)借款事，曰：「如日、俄阻撓，英、美責言，處於兩難，奈何？」余曰：「不害。督撫奉旨與議詳細合同，何所顧慮？今宜先收英、美之心。列國爭論，外部當之，非吾責也。」⁷³

對鄭孝胥來說，錫良的困擾可說是杞人憂天。他向錫良強調簽署錦瑗鐵路相關合同文件的正當性，於情於理來說，皆不須畏懼日、俄兩國的恫嚇與威脅。再者，他希望錫良應該將對策的重心著眼於和英、美兩國的配合上，及早爭取到這兩個國家對於中國的支持與奧援，便可擺脫來自於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與俄國的壓力及控制。再者，與英、美兩國之關係中，鄭孝胥認為早日拉攏英國以資抵抗中國在亞洲最大的敵人——俄國，實乃優先必要之舉。鄭氏進一步的陳述了他當時的國際觀：

東方勢力，惟英最強，我能聯英，縱日、俄挾私，亦不能無所忌憚。

⁷⁰ 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北京：三聯書店，1980)，頁327。

⁷¹ 伊集院在信函中提到「貴國政府於決定辦法之先，務須商允敝國政府。如或漠視敝國之地位，不與商酌，遽行定義，則兩國關係上惹起何等事故，殊難預料」，同前書，頁327-328。

⁷² 鄭孝胥計畫援《樸資茅斯條約》中的第三條與第四條之文以駁俄人。其中第三條條文為「除遼東半島租界權所及之地域不計外，現被日俄兩國軍隊占領及管理之滿洲全部，交還中國接收，實行政務；俄國政府聲明在滿洲領土上之利益，或優先的讓與，或專屬的讓與，有侵害中國主權及有違機會均等主義者，一概無之」。而第四條條文則為「日俄兩國彼此約定，凡中國在滿洲為發達商務工業起見，所有一切辦法列國視為當然者，不得阻礙」。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0年3月8日條，頁1242；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日露戰爭》第五冊(東京：巖南堂書店，2005)，頁535-536。

⁷³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0年3月11日條，頁1243。

德在歐勢強，在東則遠出英下。為東(三)省計，聯德以備俄則可，
以德代英則必不可。⁷⁴

在鄭孝胥的看法中，俄國一直是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勢力來源。至於英國則是他所認為在遠東勢力最為強大者。若要與俄國對抗，則必聯盟英國，才能與之對抗。能與俄國對抗，自然也可與日本對抗。由鄭氏的這段言論中，還可發現其對於德國的看法。他認為德國雖強，但其在亞洲亦或於中國的勢力與影響力都不如英國。因此鄭孝胥認為若以阻止俄國對於東三省的野心為前提，是可以結交德國的，但德國無法取代英國的影響力。錦璦鐵路終究未能興建，其關鍵正在於英國未能提供支持。鄭孝胥認為英國會因在華利益即將被日、俄瓜分而選擇與中國靠攏，但他不知道英國與日本早在 1902 年就已締結了英日同盟，對於日本在朝鮮、中國東北的經營，英國原則上都是默許的。⁷⁵由於英、日兩國之間的默契，因此對於有可能損害到日本利益的錦璦鐵路興建計畫，英國政府是抱持著不予支持的态度。僅有美國方面的資金，而未得到英國的支持，是不足與日、俄相抗衡的。因此，錦璦鐵路的計畫被迫中斷。鄭孝胥也只能帶著他對於東三省的研究成果與規劃藍圖無功而返，於宣統二年四月(1910 年 5 月)離開奉天，返回上海寓居。⁷⁶

未能順利築成錦璦鐵路，也無法阻止日、俄兩國在東三省地區的擴張意圖，鄭孝胥這趟東北行看似無所助益。但實際上，於東北地區停留約莫四個月的這段時間，鄭孝胥對當時國際情勢的觀察，塑造了他自己的國際觀；對東北地區的深入瞭解更奠定了未來鄭氏經營治理滿洲國的基礎認知。在籌劃錦璦鐵路的過程中，鄭孝胥徹底體認到當時的國際情勢，以及列強之間彼此的外交利益上的衝折與均衡。在外交場上，並無明顯的敵我之分。這種經驗比起他於李鴻章幕下任客時期，以及擔任駐日使節時期的經驗都來得更為實際與多變。而未能對國際時勢掌握更為精準，以至於無法成功拉攏外國勢力以為己用的教訓，更使鄭孝胥深感到自身對於處理外交事務能力的缺乏。「自知不量力，正坐疏且淺」，⁷⁷這句鄭孝胥描寫自己於外交事務陌生程度的詩句，道盡了他的感嘆。卻也因為如此，鄭

⁷⁴ 同前書，1910 年 4 月 18 日條，頁 1250-1251。

⁷⁵ 英國自日本幕府末期對外開放以來，就視其為位於東亞的抗俄前哨而加以利用。甲午戰爭與義和團事件更是充分證明了日本在東亞的價值。英國亦由日本於 1900 年欲占領廈門卻失敗的事件，認為日本既無與英國一爭高下的野心，也沒有這種能力，那麼與日本同盟可謂是利大於弊。而日本在占領廈門事件受到挫折後，也體認到如果要進一步擴張領土，必須獲得歐洲列強的支持才有可能。至此，兩國對於同盟的前提都有相同的立場，而同盟條文也於 1902 年簽訂。參見井上清著，宿久高等譯，《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臺北：華世出版社，1986），頁 145-155。

⁷⁶ 鄭孝胥於 1910 年 5 月 24 日離開奉天，而於 5 月 30 日抵達上海。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0 年 5 月 24 日、30 日條，頁 1257-1258。

⁷⁷ 鄭孝胥，〈寄達張貞午〉，《海藏樓詩集》，頁 201。

孝胥從此更加留意國際間的外交局勢與走向；爾後他對於東三省地區的持續關注，⁷⁸也使得鄭孝胥未來的人生將與中國東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此外，經過興建鐵路一事的折衝過程，也讓鄭孝胥體認到對於日本希望控制中國東北地區的意圖不可不慎，此時他對於日本的「印象」又接近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對日立場，將日本視為「具有潛在危險性的敵人」，但為了提範對中、日兩國來講都更有危險性的俄國，在外交上與日本合作並非不可行。由此觀之，在鄭孝胥的思想脈絡中，他還是希望能將日本視為一個可以合作的角色。

發生在宣統二年冬天(1911年1月)於東北地區爆發的鼠疫大流行，⁷⁹再度提供了一個觀察鄭孝胥展現其國際觀與外交手法，以及瞭解鄭氏其日本「印象」有所變動的機會。源起於俄國境內的鼠疫透過了鐵路的傳輸，將災情由地方性擴大為全面性，使得整個東北地區皆受疫情影響。其中又以人口總數超過十二萬人的哈爾濱疫情最為嚴重。⁸⁰這場奪去約六萬人性命的疫情，⁸¹不單造成了中國方面的損失，於東北有所經營的俄國與日本也蒙受其害。為了阻止鼠疫的蔓延並隔離病人，日、俄、中三國都希望能尋找出最有效的方法加以控制。由於中國於此地人口最眾，衛生條件與生活水準又相當低下，再加上對西方醫學技術的不信任與敵視，受疫情感染的死亡人口數亦為最多。⁸²俄國為求控制局勢，甚至準備派兵要焚毀中國人所居住的地區，並驅逐在東北重要都市的中國人。當時人也在東北的鄭孝胥看到了如此景況，便提出他對控制疫情的看法，以及建議中國在這場災難中應採取的外交態度：

防疫大事，世界各國皆利用「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之策，非慘忍也，乃不得已也。世界各國遇此患者，又利用「同風遇風，胡越一家」之策。蓋當此時，惟有同類拒害之意，毫無國際思想參入其間。中國政事素以姑息為主義，其知識、手段萬不足以施行防疫之政；苟坐聽蔓延，則外人必施其自救之辦法，更無交涉之可言矣。為今之計，惟有速令哈爾濱與俄合辦，奉天與日合辦，同心協力，捐除

⁷⁸ 鄭氏雖於1910年5月底因錦瑗鐵路無法興建一事離開東北，然他於同年9月又因友人之邀與關心東北情勢之由，再赴奉天，至此常往返於奉天、上海兩地。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0年9月13日條，頁1276。

⁷⁹ 此據《宣統政紀》之內容，當時朝廷甚為重視此事，並照錫良要求，撥發十五萬兩至東三省，以添購相關的防疫設備。參見《宣統政紀》卷46，收入《清實錄》第六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據1934年刊本影印），頁828-829。

⁸⁰ 曹樹基、李玉尚著，《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頁227-233。

⁸¹ 費克光(Carney T. Fisher)，〈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收入劉翠溶、伊懋可(Mark Elvin)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95），頁715。

⁸² 費克光，〈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收入《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頁718-725。

猜嫌，務使疫毒早息，則中國之名譽必可驟起，外人必將加敬，更不慮主權知或損也。⁸³

鄭孝胥對於俄國打算以焚燒華人居所並加以驅逐的手法，並未加以嚴厲批評或斥責，反倒是以「壯士斷腕」來解釋俄國採取這種方式的原因。加上鄭氏認為以中國凡事姑息處之的官僚習氣與低劣的科技水準，根本無法解決這場突如而來的嚴重危機。因此，鄭孝胥呼籲中國必須把握這次機會盡釋前嫌，然後與俄、日合作共同阻止疫情的蔓延。這樣除了能夠加速解決日益擴大的鼠疫流行外，還可改善與日、俄兩國的關係，更能使中國的聲譽傳播於國際舞臺，連帶也有助於主權的提升，並獲得其他西方國家的尊敬。與日、俄兩國合作控制疫情，對中國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在聽聞日本將於奉天設置防疫機關的消息之後，鄭孝胥便將他的看法告知給正為疫情焦頭爛額的錫良，要錫良盡快加入日本、俄國，一同對抗疫情，「非特無所損失，且可增鄰邦之感情。行之有效，則中國之名譽必將大震於世界。」⁸⁴錫良對於鄭孝胥的看法甚為激賞，並參考鄭孝胥的建議。⁸⁵非官方的民間醫療人員則於1910年11月與1911年2月先後成立了「哈爾濱防疫會」與「長春防疫會」，其中就有多名日本與俄國代表。1911年2月底更成立了「中日防疫會」，讓中日兩國的醫療人員可對東北地區的防疫問題進行商討。⁸⁶而鄭孝胥也從這次東北疫情風波深刻體會到一事：「外交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與敵人」，此時鄭孝胥對於日本的「印象」又從錦瑗鐵路一事中的「潛在敵人」定位，回到早先的「合作者」性質。

綜合前述，可以瞭解到鄭孝胥會因外交局勢與事件的不同，而將自己對於當時國際情勢的觀點與立場加以調整。另外，若以鄭孝胥對於日本的「印象」為切入點，便可發現他自赴廣西戍邊起，至東北瘟疫大傳染止這段大約十年的期間，對日本表現的態度有其變化過程。對他來說，日本可以是一個栽培中國青年子弟進階知識的媒介，又或者是一個對於中國持有控制意圖的競爭者，此後又回到先前將日本視為類似「伙伴」的定位，倡導與日本合作共同撲滅在東北流行的瘟疫。

⁸³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1年1月16日條，頁1302。

⁸⁴ 同前書，1911年1月16日條，頁1302。

⁸⁵ 此據《清史稿·錫良列傳》之內容中提到錫良的作法：「未幾，防疫事起，疫起俄境，言東清鐵路，逐處傳染，未浹旬，蔓延奉、吉、黑三省。俄、日群思干涉，錫良以防疫純屬內政，嚴起防治，三月而疫絕。十一國醫士來奉考察，開萬國鼠疫研究會於省署，錫良主議，咸起頌之。」由史料內容觀之，錫良將防疫問題看作「純屬內政」，可能並未採行鄭孝胥的建議。參見《清史稿》校註編輯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13冊（臺北：國史館，1986），頁10539。

⁸⁶ 焦潤明，〈1910-1911的東北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收入《近代史研究》第3期(2006)，頁117。

大體而言，鄭孝胥在這段時間對於日本的觀點與「印象」尚未固定，而是呈現出變動性的立場。在「合作者」與「潛在性敵人」之間，鄭孝胥還在找尋著自己對於日本這個國家的定位。針對此一問題，以鄭孝胥的言論來加以觀察，他對於日本的「印象」似乎還是比較傾向於「合作者」的層面。緊接著，筆者將於下文證明把日本視為「合作者」的此一傾向，將在鄭孝胥成為「前清遺老」並進行復辟事業後，演變為鄭孝胥對於日本「印象」與立場的基本論調。

第三節 「自信宿心難變易」：追尋復辟與日本的關聯性

至宣統二年末(1911)，清廷雖於立憲與議會制度方面進行程度不一的改革，然而改革的速度與措施卻流於緩慢與敷衍，⁸⁷這讓原本支持立憲運動的人士大為不滿，反對清廷的情緒迅速蔓延；而原本擔心清廷中央實行立憲制度會對其造成負面影響的革命派人士見此良機，更是大力宣傳革命的必要性，造成了全國性的騷動。至此，人心的浮動與不滿已達頂點，革命也到了一觸即發的局勢。

從種種跡象來看，清廷可謂氣數已盡，鄭孝胥卻依然不願放棄希望，試圖以一己之力來幫助清廷渡過這存亡之秋的關鍵。宣統三年五月(1911年6月)，人在北京的鄭氏接到諭令，授其為湖南布政使。接受諭令後，鄭孝胥旋與攝政王載灃(1883-1951)會面，再度提及先前希望中國能另造鐵路與俄國、日本的南滿鐵路對抗的主張，並論其為「中國自強千載一時之機遇」，要攝政王等人能夠加以重視，勿失良機。⁸⁸不過當時的清廷還有更迫切的難題等著處理，因此對於鄭孝胥的提議並未採行。對此鄭氏也不以為意，他熱切的希望自己能早日赴任布政使的職位，以期實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從他赴任前夕有感而發的言論，可以看出他對於這趟湖南之行的重視與企盼：

吾今挺身以入政界，殆如生翻手攜炸彈而來，必先掃除不正當之官場妖魔，次乃掃除不規則之輿論煙瘴，必衝過多數黑暗之反對，乃坐收萬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觀其效！雖不免大言之謬，然其蓋世冲天之奇氣，終不可誣也。⁸⁹

⁸⁷ 立憲派人士對於國會請願運動屢受清廷當局拖延已有不滿，待宣統三年四月(1911年5月)宣布內閣成員，其中多為滿人兼為皇族，更增長當時漢人士民對於清廷的厭惡情緒，轉而支持以武力推翻政府為主要訴求的革命派。參見張玉法著，《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2001)，頁57-59。

⁸⁸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1年6月21日條，頁1326-1327。

⁸⁹ 同前書，1911年7月19日條，頁1333。

從這些文字加以觀察，不難看出鄭孝胥對於此行的遠大意圖。除了要掃蕩該地為非作歹的貪官污吏之外，還要屏除當時對於清廷有害的各式輿論與亂象，讓湖南成為一個足以成為中國其他地區效法的模範省份。在赴任湖南布政使之際，鄭孝胥的這番言論，可說是為自己在將來的任期中能有良好的政績打了包票。

正當鄭孝胥還在北京參與議論官制的會議行程中，相鄰於湖南的湖北省於同年八月(1911年10月)發生兵變，辛亥革命正式揭開序幕。由於鄭氏人在京師，無法立刻回到長沙，而長沙距離事件的中心武昌又僅有百里之遙，亂象很快就影響到湖南。這時他已感此一事件將無法迅速弭平，因此希望清廷中央能盡速增援軍隊來討平革命黨。奈何亂局越演越烈，就連清廷的軍隊都無法有效遏止革命風潮的擴大。⁹⁰此時的鄭孝胥僅能在北方空自著急，對於南方的亂事一點辦法都沒有。除了在日記中大罵革命黨人作亂將使外國勢力漁翁得利，「反流毒全國以利他族，非仁義之事也」，⁹¹或是在其詩詞文字中陳訴「官身有束縛，債事非吾謀」的無力與憤恨以外，⁹²鄭孝胥只能眼睜睜看著各省獨立，溥儀遜位與民國共和政府建立，以及無奈的接受自己的身分歷經一個非他所願的轉變：從滿清官員到「前清遺老」。

如同中國歷史上許多因政治權力變遷而出現的遺民一般，鄭孝胥此時也面臨「仕」與「隱」的選擇，以及對於自身「政治與文化身分認同」的定位問題。⁹³鄭孝胥是無法為共和政府服務的。他對於「民國」兩字有著相當程度的負面情緒，終生不用。⁹⁴當他先前的好友如張謇、湯壽潛(1856-1917)為中華民國政府出仕後，鄭孝胥變嚴加批評，論其未守節操，甚至欲「作書以正罪」，⁹⁵以懲曾於清廷任官，後又擔任共和政府官職，無操守可言的士民。在他眼中，這些甘心為共和政府服務的前清遺老之罪孽，更甚於原本的革命黨人：

今日所見者只有亂臣、賊子及反覆小人三種人而已。亂臣之罪浮於

⁹⁰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04-408。

⁹¹ 鄭孝胥認為，革命黨人選在清廷改革制度未穩固之前而予以推翻，未必會對中國帶來多大好處，反之給與外國勢力有機可趁，尤以日本為甚。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1年10月27日條，頁1352-1353。

⁹² 鄭孝胥，〈續海藏樓雜詩〉，《海藏樓詩集》，頁221。

⁹³ 黃俊傑認為，當東亞儒者遭遇改朝換代的狀況而成為遺民之際，將會遭遇到兩個兩難問題：「仕」與「隱」的抉擇，以及「政治身分認同」與「文化身分認同」的融合或撕裂。而此兩難也昭示了一個現象：人處於具體情境的繫絆中，其自由的有限性。參見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163-186。

⁹⁴ 鄭孝胥曾對張謇在其書畫作品落款用「民國元年」以為紀年加以批評，論其「且不避淳字諱」；而鄭氏在其筆記中也從未使用過民國年號。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2年3月6日條，頁1456。

⁹⁵ 同前書，1911年11月30日條，頁1361。

賊子，反覆小人之罪又浮於亂臣，其餘皆難民也。⁹⁶

在政治立場上，鄭孝胥清楚顯示了他的態度，就是終生不為共和政府服務，絕不出任共和政府的官職。「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⁹⁷對鄭孝胥來說，他的「道」只存在於他所認同的君主政體之中，而非眼前這個「擾亂之期反恐延長」的民主憲政制度。⁹⁸

與文化認同的立場加以比較，選擇出仕與否的政治認同是較為單純的。對於前清遺老們來說，文化上的認同更為複雜、困惑。相異於先前「改姓易代」的變動，滿清皇室的崩潰更代表著中國幾千年來封建體制的消失。因此，前清遺老們所面臨的已非單純的朝代更迭，而是一個在政治、思想與文化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由於長久以來所奉行的儒家傳統文化與價值體系在此時受到嚴峻的挑戰，使得這些遺老們在精神上承受著龐大的壓力。而此一無形的壓力，也使他們欲在新、舊文化之間做出抉擇的時刻更顯矛盾。民國政府創建後，繼之而起的亂象與動盪更使遺老們感嘆世道的淪喪，同時加深了他們對於現狀的厭惡與對過去傳統的思念。

從文化層面的角度來加以觀察，對穩定的生活與社會固有秩序的冀求，或是為避免儒家思想走向淪亡，均可視為遺老們眷懷清朝的原因。⁹⁹生活中接連不斷的巨大變動，致使這些遺老無法以舊有的經歷來適應眼前的新局勢，進而造成一種安全感上的匱乏現象。遺老多為前清官員，或是擁有科名的學者或耆儒，而這種匱乏感的衝擊對於這些自幼即受儒家文化所薰陶的前清遺老來說，更顯強烈。為求實現恢復清廷的企盼，以及對共和政府與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社會亂象之反抗，更為了重新取回權力與地位的象徵，前清遺老積極倡議和從事復辟的舉動，是可以預見的。但遺老們在當時政治圈中多已失勢或邊緣化，無法具備政治實力；且以「復辟」為號召與訴求，自然難以獲得當時中國多數漢族士民的支持與響應，也就是群眾基礎的優勢。¹⁰⁰唯有借助於外來勢力的力量從旁佐之，並待共和政府局勢動盪不安之際而舉事，復辟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外來勢力具有其多樣性，其立場與動機均有所不同。因此，在「復辟」的前提下，如欲與外來勢力合作，外在上，遺老們得先改變某些訴求或目標，才有可能取得外來勢力的配合意願與協助；於內在層面中，這些遺老成員又勢必要

⁹⁶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2年3月8日條，頁1403。

⁹⁷ 邢昺，《論語注疏》（臺北：中華書局，1966，據阮刻本校刊聚珍倣宋版影印），卷8，頁3。

⁹⁸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1年12月30日條，頁1375。

⁹⁹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5），頁54。

¹⁰⁰ 同前註，頁65。

調整自身的理念與見解，以與業已改變的目標或主張相互配合，「復辟」的事業才能順利推展。這種發生於前清遺老此一特殊團體的內外轉變過程及其影響，以及瞭解為何出現如此轉變的原因，正是筆者撰寫本文關注的焦點所在。以鄭孝胥為例，身為前清遺老成員之一的他，為使復辟大業能夠順利推行與實現，也必須如同其他支持復辟的遺老一般，尋求外來勢力的協助。鄭氏尋求外來勢力的奧援過程，大略可分為三個對象或階段，分別是國內軍閥勢力、日本政府勢力，與日本關東軍部之勢力，其中也顯露出他對於日本觀點的改變過程。因此筆者將於下文處理鄭孝胥其日本觀在這段期間「如何轉變」與「為何轉變」的命題。

1914 年，在北京將總統職權擴張至極大程度的袁世凱，顯露出力求復活帝制的野心。袁氏積極推行帝制的舉動引起了清室遺老的注意，他們認為復辟大業露出了一道曙光，並希望袁世凱能在結束總統十年任期之後，將政權交還給遜帝宣統。¹⁰¹相較於其他遺老們對袁氏的期待，將袁世凱目為「亂臣」的鄭孝胥卻不作如是想。¹⁰²當 1912 年 6 月，北京政治圈仍處於動盪之際，袁世凱一封表明心跡，解釋自己並未懷有稱帝意圖的電函，¹⁰³就已受到鄭孝胥的質疑：

內閣總理未定，各黨競爭甚烈。袁世凱電告天下，自言「束髮讀書，心敬唐虞。二帝為世勤勞，不為己利，乃有疑其欲為第二之拿破崙者，皇天后土，可鑒此心」等語，真妄奴也。¹⁰⁴

針對袁世凱對外界質疑其動機的自我辯護，鄭孝胥非但評袁氏用心可疑以外，更以「妖狐露尾」來形容袁世凱的企圖已如司馬昭之心，人所皆知。¹⁰⁵鄭孝胥對於袁世凱的不信任感在此顯露無遺，而他也從未把袁世凱視為可讓宣統重新即位的可靠對象。在遺老們明白了袁世凱的意圖後，接續的歷史發展也證明了鄭孝胥的看法，袁世凱推行帝制是為了創建洪憲王朝，並非為宣統帝的復辟做準備。

袁世凱的稱帝之路並不順遂。由於國內有蔡鍔(1882-1916)之護國軍和以梁啟超為首的輿論力量攻擊，外交場上列強對於袁氏的帝制又多採消極的觀望心態，使得袁氏推行帝制困難重重。而北洋派舊部的不服與日本的反對，更是造成袁世凱帝制失敗的主要因素。¹⁰⁶待袁氏於 1916 年六月病逝後，再度引發了政局的波

¹⁰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423。

¹⁰²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2 年 2 月 17 日條，頁 1396。

¹⁰³ 袁世凱，〈致副總統及各省解釋猜疑電〉，收入陸純編，《袁大總統書牘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據民國三年[1914]刻本），頁 217。

¹⁰⁴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3 年 6 月 27 日條，頁 1422。

¹⁰⁵ 同前書，1913 年 6 月 27 日條，頁 1422。

¹⁰⁶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2001），頁 126-136。

瀾與亂象，大總統黎元洪(1864-1928)與國務總理段祺瑞(1865-1936)之間的「府院之爭」使得北京政局動盪不安。自共和政府建立後便開始密謀復辟的軍閥張勳(1854-1923)，在獲得來自德國方面的援助資金後，¹⁰⁷眼見機不可失，便與康有為等清室遺老於 1917 年七月一日率軍進入北京，並恭請溥儀出宮重登大寶，復辟至此可謂功成。不過復辟之舉很快遭受到各方的反對與攻擊。在內外交迫之下，這場「丁巳復辟」僅持續了短暫的十二天，隨著段祺瑞帶兵入京鎮壓，張勳逃入荷蘭使館尋求庇護後，遺老們的美夢又再度煙消雲散。

承前所論，鄭孝胥又是如何看待這場短暫的復辟？張勳並非鄭孝胥心目中預定的領導復辟之人選。在鄭氏的理念中，擁有過人的操守與軍事謀略，方能勝任帶領復辟此一重責大任。而此人並非袁世凱，亦非張勳，而是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受清廷任命署理陝西巡撫督辦軍務，並與當地革命軍血戰至 1912 年三月的升允(1858-1931)。¹⁰⁸鄭孝胥對於升允在陝西所表現出的氣節與忠勇由衷的佩服，並多次在其《日記》中提到他對於升允的推崇，更以元末名將王保保(?-1375)為例，¹⁰⁹來形容升允高貴的節義操守，以及對復辟派勢力的重要性。1916 年五月，袁世凱推動帝制宣告失敗，清室遺老對於因受袁氏政府打壓而停滯已久復辟大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如康有為於報紙發表言論，試圖向社會大眾宣揚為推行君主立憲而復辟的主張。¹¹⁰而鄭孝胥便於一場與友人的對談中，提到當時正於日本停留的升允，並透露他何以支持升允來帶頭進行復辟的理由：

余語許魯山曰：「升吉甫逃竄亡命，奔日年餘，而日人舉國重其忠義，稱其道德，今乃借其政府之力，歸圖復辟。孰謂中國無人！是亦少解袁世凱之穢矣。」¹¹¹

鄭氏在言談中再次讚揚了升允的忠義與道德，更認為這可以消去袁世凱稱帝後所帶來的「污穢」。另外，鄭孝胥在其言論中還提及了日本勢力對復辟的影響，他認為升允個人的崇高道德可作為號召日本的一個象徵，進而「借其政府之力」來

¹⁰⁷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頁 217。

¹⁰⁸ 升允，字吉甫，號素庵，蒙古鑲黃旗人。光緒八年(1882)考取舉人，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翌年任陝西巡撫。辛亥革命爆發後率兵與革命軍血戰，誓死不降，後袁世凱調兵圍剿，兵敗後流亡於蒙古與日本。升允支持張勳復辟，復辟失敗後，再度亡命於青島等地。1931 年逝於天津。

¹⁰⁹ 王保保，又名擴廓帖木兒(Köke Temür)。其父親為王姓漢人，其母為元末將領察罕帖木兒的姐姐，後其舅察罕帖木兒收王保保為養子。王保保為元末名將，忠於元朝而拒降於明。曾大敗徐達，後明太祖朱元璋曾謂「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參見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709-3713。

¹¹⁰ 康有為，〈中國今後籌安定策〉，收入康有為著，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十九冊（臺北：宏業出版社，1976），頁 229-236。

¹¹¹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6 年 5 月 24 日條，頁 1611。

達成復辟的事業。鄭氏在此提出引入日本勢力協助復辟的觀點是值得玩味的，而鄭孝胥就復辟一事與日本方面的接觸，及其觀點改變的過程，將在下文中提及。

雖然鄭孝胥相當欣賞升允，並將他視為帶領清室遺老進行復辟事業的最佳代表，但鄭氏也明白，要讓未擁有任何政治資源或軍事力量的升允在亂局之中推行復辟，不啻為荒誕之舉。如此一來，鄭孝胥只能退而求其次，改變心中認定主事復辟者應具備崇高節義的前提，與當時的實力者合作，方能實現復辟大業。而手中握有兵權，又對復辟念念不忘的張勳，就是適合的人選。升允更催促張勳要把握良機，早日舉事宣言復辟。¹¹²

張勳主導的復辟行動最終還是以失敗作收。從鄭孝胥《筆記》的內容中可以發現，鄭氏對於丁巳復辟發生前的圖謀與規劃所知甚稀。¹¹³另外，在溥儀於丁巳復辟成功後任命文武大小官員的諭令之中，也未見鄭孝胥之名列於其中。¹¹⁴以此可以推知，鄭孝胥並非此次復辟行動中的核心成員，亦可證明當時支持復辟勢力之內部存在著矛盾與分歧。¹¹⁵意識到他人的排擠與傾軋，鄭孝胥只能留在上海居所靜候時勢發展。然而北京城的人民多對復辟之舉甚無好感，¹¹⁶其他軍閥也不樂見張勳復辟成功所帶來的影響。不過數日，丁巳復辟就因段祺瑞率兵入京鎮壓而草草收場。對於這場僅持續十餘天即告失敗的復辟，鄭孝胥除了批評張勳無謀，「辱我幼主，羞當世之士」以外，¹¹⁷鄭孝胥更以「毫無計畫，妄舉大事，使人憤恨」等評語責備參與這場復辟的其他成員，同時並為丁巳復辟做一個很不客氣的結語：「知其必敗也」。¹¹⁸

對亟欲實現復辟事業的前清遺老們來說，丁巳復辟的失敗不啻為沈重的打擊。不過對鄭孝胥而言，此次復辟的失利還意味著一個事實：若僅以主事者的道德作為推動復辟的號召是行不通的，外國勢力的支持與否才是決定性的關鍵因

¹¹² 升允曾託囑鄭孝胥致函於張勳，內容旨要為催促張勳盡快發動復辟，以免錯失良機。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7年6月5日條，頁1666。

¹¹³ 鄭孝胥提到丁巳復辟乃「由青島與上海諸君合謀之，而獨避我。」同前書，1917年7月29日條，頁1675。

¹¹⁴ 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350-367。

¹¹⁵ 章開沅認為，推動丁巳復辟之成員可分為兩派，一以張勳為首，另一派則以升允為首，兩派相互爭權。後張勳派得勢，因此升允僅受封為大學士，一個空有名聲而無實權的職位。參見章開沅，《章開沅學術論著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573-574。

¹¹⁶ 除了漢族人民厭惡復辟帶來的政局動盪，連滿人旗民對於復辟也抱持反對立場，認為張勳是效法王莽，復辟只是欺宣統帝年幼而行盜國之實。參見許指嚴，《復辟半月記》，收入《近代筆記史料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據1917年北京交通印書館版本），頁50-52。

¹¹⁷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7年7月9日條，頁1672。

¹¹⁸ 同前書，1917年7月29日條，頁1675。

素。如無外國勢力支持，便無資源與兵力可驅應用，復辟成功的機率自然微乎其微。體認到此一事實後，鄭孝胥逐漸做出轉變，將焦點置於聯繫外國勢力之層面，而不再重視尋求一個能夠承當復辟重責的「負重望者」。欲得他國幫助，必先對該國政情具有深厚的瞭解，且在該國擁有豐富的人脈關係，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對鄭氏來說，最符合這些條件的國家，就是日本。而鄭孝胥的轉向，正與日本當時對於中國的大陸政策互相契合。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政情亂象紛呈，內部不穩之際，對於外交情勢與事務自然缺乏反應能力，促使日本政府有可乘之機。倘若中國政局稍穩，日本方面便進行分化工作，以利其大陸擴張。¹¹⁹以日本的角度來看，復辟正是造成中國政局環境亂象的一股勢力，因此他們願意對復辟派人士提供協助。但若以國家的名義支持中國前清遺老們的復辟行動，似有過於明火執仗之嫌。因此與鄭孝胥的初步聯絡工作，便由部分大陸政策的激進主義者，外交機關的低階官員，或是日本軍方相關人士來擔任。¹²⁰

前文提到自張勳復辟失敗後，更加深鄭孝胥對於外國勢力支持與否影響復辟成功甚深的認知。此後，爭取日本方面對復辟事業的支持，便成為鄭氏此後人生的重大目標。在某次他與新識日本友人的會面場合中，曾與該日本友人就中國復辟的問題做出討論。藉由兩人對於復辟此一話題的對答過程，即可瞭解此時鄭孝胥對於日本勢力的抱持的態度及期待：

森茂偕其友新橋榮次郎來訪……（新橋）問：「必若何而後可以統一？」余曰：「非兵力不行……惟挾兵力而行復辟之事，名正言順，亂者自滅」。……問：「兵力雖足，而無人主張復辟，奈何？」曰：「明目張膽斥共和者為亂臣賊子，則吾能為也，惜無力耳。」問：「公（指鄭孝胥）不甚出力，力何自而生，此公之責也。」曰：「使日本能助我軍械、兵費，則吾力可以漸展。然觀於升允久居日本，而日政府淡漠視之，故度其不能助我也。」問：「升允太守舊，恐不能定中國之亂。日政府究不知中國主張復辟者更有何人，何以助之？」曰：「此我之責也。伺機會生時，吾當求助於日本。雖無濟，亦不以為恥。」新橋乃曰：「善。吾當往廣東，歸國之日，當為公

¹¹⁹ 陳豐祥，《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臺北：金禾出版社，1992），頁7。

¹²⁰ 鄭孝胥自1912年起即與不少日本人士有密切的互動，如宗方小次郎、內田良平、佃信夫等人均有聯繫，從鄭氏與這些人的言談中，可看出多為試探日本當局是否支持復辟，或藉由這些人轉達尋求資源協助的訊息。而這些人均為當時日本大陸政策的激進擁護者。另外，鄭孝胥也與日本外交人員、日本陸、海軍方面人物有所聯繫，其對話與互動過程均散見於《鄭孝胥日記》第三冊與第四冊。

覓機會。可乎？」余曰：「感子後意，毋忘今日之言！」¹²¹

面對日本友人漸進式的詢問，從鄭孝胥的答覆內容中，正可看出他對於復辟想法的來龍去脈。鄭氏不斷強調必須要有兵力與錢財的支持，復辟之舉始能持續下去。只須有了日本方面的支持，就可將復辟的主張傳達出去，使中外皆知。比較出乎鄭氏意料之外的，是日本人對於升允的評價。長久以來將升允當作帶領復辟不二人選的鄭孝胥，首次從外國人口中聽到了對於升允的評論便趨於負面，其訝異可想而知。但鄭氏並無做出不以為然的反應，而是轉變自己先前的觀念，不再堅持以升允為對象來訴求復辟，而是直接與日本方面聯絡並尋求支援。文末還提到兩人達成共識，雖然僅止於口惠的形式，但可看出鄭孝胥對如此程度的「支持」已甚為看重。此後鄭氏也不再提及升允於復辟中的重要性，他決定以自己的力量來達成心中的目標。

有趣的是，對復辟耗盡心力的鄭孝胥，直到民國十二年(1923)的八月才受到溥儀的兩位帝師陳寶琛與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之薦，¹²²首次覲見到他朝思暮想的天子。溥儀對於這次會面留下深刻的正面印象，對鄭孝胥的信任與期待也日益深厚。¹²³察覺到溥儀的復辟意識因外在環境的影響而逐漸升高的情形，並感於日本願意於溥儀受難時提供協助的友好態度，¹²⁴鄭孝胥更加快了尋求日本方面支援的腳步。

伴隨著與日本方面接觸頻率的逐漸增加，鄭孝胥開始感受到日本勢力之中也是暗潮洶湧，日本政府與軍部的意見常有分歧或相左，並非如想像中那般一致。事實上，與日本政府與外交當局的謹慎相比，日本軍部對於大陸政策的立場是較為激進的。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發動了一連串的戰爭，也都獲得了勝利的戰果。如此的歷史事實提升了軍部在日本政治結構中的特殊性與重要性。然而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之際，日本社會出現了現代化的轉型現象，民主思想的風潮開始影響日本社會與人民，這對重視階級制度和享有特殊地位的軍部來說是一種危機。¹²⁵

¹²¹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8年3月9日條，頁1716。

¹²² 於前文中已提及陳寶琛與鄭孝胥的同鄉關係。再者，莊士敦與鄭氏先前便有互動，加上兩人對於整頓皇室內部財產與罷退宮中太監的議題上立場相同，因此對於陳寶琛的薦舉，莊士敦並未反對，還評論鄭孝胥為「於中國二十五年來最欽佩的一位中國人」。參見 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Hong Kong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1934.), p342-344.

¹²³ 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7），頁115。

¹²⁴ 由於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民國十三年(1924)十一月馮玉祥率兵攻佔北京，並廢止民國元年所頒佈的《優待清室條件》，將溥儀逐出紫禁城。日本方面認為溥儀「奇貨可居」，應盡力拉攏以圖利用，因此日本使館庇護溥儀，並幫助其移居天津。參見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頁382-423。

¹²⁵ 陳豐祥，《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頁272-273。

有鑑於此，軍部必須反抗日漸興盛的政黨政治與協商性質的外交法則，挑起戰爭，才能重新喚醒人民對於軍人的重視與愛戴。在希望挑起戰爭的前提之下，軍部大力支持以擴張領土為主要訴求的大陸政策，其中又以派駐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最甚。

由於日本外交機關與日本軍部在大陸政策上的步調明顯不一，促使擁護溥儀的遺老們分為兩派。大體而言，鄭孝胥初期是傾向與日本的外交機關合作的，而主張與軍部合作的代表人物則是羅振玉(1866-1940)，兩派成員甚常在溥儀面前就相關議題針鋒相對。¹²⁶日本外交當局與軍部之間的對立更是尖銳。對於兩者之間的齟齬，鄭孝胥就曾在其筆記中提及一個鮮明的例子：

上(指溥儀)命陳寶琛、鄭孝胥、胡嗣瑗、劉驥業同見日人佃信夫。
頃之，復命入對。日本領事有田在坐，佃信夫不悅，面稱上不誠意，
彼不能罄其所言，遂辭退。¹²⁷

代表軍部勢力的佃信夫一見還有日本外交事務人員在場，¹²⁸竟不顧與溥儀之約與眾人觀感，直接以「無法暢其言論」為由憤而離席以示抗議。從這個寫實的案例可讓我們瞭解到當時日本軍方的氣焰與姿態之高傲，以及與外交體系互不相讓的程度已到達白熱化的階段。然而鄭孝胥最終還是選擇藉助日本軍方的力量來推行復辟，而非先前所認同的日本政府與外交機關。

鄭孝胥會做出如此抉擇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日本政府方面針對溥儀等人的復辟事業一直無法給予一個正面的確切答覆，而透露出保守消極、隱晦不明的態度。¹²⁹對這些多已步入暮年的前清遺老們來說，能夠在有生之年實現復辟的理想，是他們一生之所願。倘若無止境的拖延下去，勢必無法目睹溥儀重登皇位的那一刻。相形之下，日本軍部對復辟透露出積極支持的態度，這是溥儀與鄭孝胥所樂於見到的。第二、對於當時國際上甚為風行的共產主義風潮開始在中國境內散佈之局勢，是另一個讓鄭孝胥憂心的因素。共產主義強力反對階級制度的存

¹²⁶ 贊成與日本外交機關合作的代表人物為陳寶琛。鄭孝胥認同陳寶琛的觀點，並對羅振玉主張與日本軍方合作的態度加以批評。參見《鄭孝胥日記》第四冊，1925年2月18日條，頁2042-2043；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頁467-468。

¹²⁷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四冊，1925年12月7日條，頁2076。

¹²⁸ 佃信夫，號斗南，乃為一位對大陸政策抱持激進態度的著名代表人物。對滿蒙問題與中國復辟派甚為關注，並與復辟派人士如鄭孝胥、升允、張勳等人均有所接觸。

¹²⁹ 日本外交領事曾對復辟派人士提到日本政府於復辟一事的觀點：(1)溥儀應暫時安於現狀，如果再行復辟並失敗，那麼皇室必受其害。(2)以歷史為例，由君主制度改為民主制度是較為平順的，但要反其道而行勢必困難許多。而日本政府保守緩慢的步調與溥儀、鄭孝胥等人的訴求南轅北轍，因此便逐漸加深與立場激進急切的日本軍部方面之合作程度。參見《鄭孝胥日記》第四冊，1926年6月2日條，頁2103。

在，然復辟之舉就是在恢復從前的君臣制度之體制，兩者必定發生衝突。因此對亟欲復辟的溥儀與其擁護者來說，共產主義風潮之盛行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這也導致鄭孝胥對於當時中國華北地區嚴重的赤化風潮極度不安，並極力批評共產主義的學說，試圖消弭其對復辟之舉的阻礙與負面影響。¹³⁰

為了避免因夜長夢多而生變的情形出現，鄭孝胥再度改變自己的態度，從一開始主張與日本政府及外交機關合作，轉為與日本軍部方面逐漸靠攏，並鼓吹藉其力量來推行復辟。而早先提倡與日本軍部勢力合作的羅振玉此時已不再如同先前受溥儀重視，¹³¹如此一來，鄭孝胥便成為溥儀對日本聯繫的唯一窗口，而他的抉擇也對溥儀造成了影響。在鄭孝胥日復一日的勸說之下，溥儀逐漸接受將日本軍部視為欲施行復辟的一個優先選項，但仍舊未決定是否就此投靠日本軍部之勢力。直至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與影響，才成為溥儀決定要完全與日本軍部合作的關鍵點。雖然主張維護自主統治權的清室遺老提出諫言，要溥儀謹慎思考與日本軍部合作，否則將喪失統治權力，¹³²但對溥儀來說，無論再多的警告與勸誡都比不上外界所帶來的刺激，¹³³與日本軍部合作已勢在必行，並走上創建滿洲國之途。有鑑於此，擔心成為「賣國者」、「民族罪人」的遺老如陳寶琛等人，不願成為日本控制的對象，因此選擇不參與建立滿洲國，但他們仍然不願分割與溥儀的情感，直至人生結束之前還以溥儀的處境為念。¹³⁴至於主張充分與日本軍部合作，並將滿洲國視為實現溥儀復辟大業之基礎的鄭孝胥來說，這時的他，已將日本軍部定義為一個最可靠的「合作者」，依靠日本軍部的支持，便能逐步讓傳統的君主制於中國再度重現。然而，目睹滿洲國建立固然可喜和興奮，但如何於日本軍部手中爭取對於滿洲國的自主統治權，並建立滿洲國國民對於此一國家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將是鄭孝胥接下來所必須面對的課題與責任。

第四節 小結

肇因於清廷在甲午戰爭的慘敗，中國掀起了追求變法改革的風潮。鄭孝胥肯定「變法」本身背後的意義與作用，但對於當時主事者康有為、梁啟超提倡從政

¹³⁰ 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收入《新史學》18卷3期(2007)，頁71-73。

¹³¹ 溥儀，《我的前半生》，頁149-150。

¹³² 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頁61-67。

¹³³ 此指於1928年7月所發生的孫殿英東陵盜案。發生此事後，溥儀受到了極為強烈的刺激，並自論其復辟、復仇的思想，到達了一個「新的頂峰」。參見溥儀，《我的前半生》，頁166。

¹³⁴ 陳寶琛在逝世以前曾留下一封遺折，提到他對於溥儀的企盼：「修德乃可服人，得道方能多助。因人心之思舊，亟為遠大之圖。戎王業之偏安，宜有綢繆之計。」參見遼寧省檔案館編，《溥儀私藏偽滿密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頁119。

治制度與行政體系上著手的作法，則抱持著反對的看法。鄭氏認為，中國若進行改革，應該遵守一個準則：保持中國長久以來所依循的道統，以維持自身優良且獨一無二的傳統儒家文化。對於儒家文化的優越感乃鄭孝胥思想脈絡之中一個不變的守則，他是不能允許儒家文化被取代的。而他也以自己過去擔任駐日本使節的經歷為例，主張清廷施行改革只要由軍制與鐵路政策方面下手便可。另外，由於德國強佔膠州灣一事，國際外交場上出現了英國、日本同盟以抗俄國、德國的局勢。眼見如此，鄭孝胥調整自甲午戰爭後對日本的敵視態度，認為可以與日本合作，以對抗威脅最大的俄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訪華，讓當時維新派人士感到興奮，認為是與日本加強合作的契機，鄭孝胥更提出「聘伊藤為客卿」的主張，並與友人設立「亞細亞協會」以利推動雙方交流。然而這股聯合日本共同推行維新的風氣，卻因戊戌政變的發生而消逝無蹤。

自戊戌政變後到辛亥革命發生之前的這段時間，可說是鄭孝胥積累外交事務經驗與建立國際觀體系的重要時期，而其對於日本的印象也呈現出多變的傾向。筆者以鄭氏生涯中所面臨的三個事件為例，分別是鼓勵廣西優秀青年學子至日本遊學、籌造錦瓊鐵路以對抗俄國與日本所經營的南滿鐵路，以及於 1910 年的東北瘟疫大流行中，呼籲與日本、俄國進行防疫合作等事件為對象加以相互比較，來突顯出鄭孝胥在此段時期日本「印象」的多樣化。首先，鄭氏將日本的視為一個可讓專業人才精研知識與技術的媒介，以讓中國青年學習更高深的知識與技術，這與他於戊戌變法時期將日本視為「興亞洲」伙伴的思想脈絡相近。其後，鄭孝胥因其鐵路路政之長才，在 1909 年被邀聘至中國東北建造出一條鐵路，以期對抗俄國與日本所經營的南滿鐵路。面臨到俄國與日本的必然的反對姿態，鄭孝胥費盡心思加以應對。此時的他，又將日本視為一個對中國存在控制意圖的「潛在性敵人」。不過為了對付更具有立即威脅性的俄國，鄭孝胥主張在外交上中國還是可以與日本聯手以抵抗俄國；翌年所發生的東北瘟疫大流行，又讓鄭孝胥改變了他對日本的想法。為了撲滅瘟疫，鄭孝胥倡導與日本和俄國合作。如此一來，鄭孝胥再度把日本認定為「合作者」的角色。大體而論，鄭孝胥在這段時間對於日本的觀點與「印象」尚未固定，而是呈現出變動性的立場。以鄭孝胥的言論來加以觀察，他對於日本的「印象」似乎還是比較傾向於「合作者」的層面。

由於辛亥革命的爆發，鄭孝胥的身份地位歷經了一個非他所願的轉變：自滿清官員到「前清遺老」。為了體現儒家思想中的「忠君」觀念，也為了取回失去的權力與地位，鄭孝胥加入了復辟派的行列。在面臨張勳丁巳復辟失敗的衝擊後，鄭孝胥深刻體認到如要施行復辟，必須倚靠外來的強大勢力，才有成功的可能。在此前提下，鄭孝胥選擇與最為熟悉的日本進行合作。在察覺到日本政府與

外交機關對於推行復辟的保守態度與猶疑後，鄭孝胥轉而與立場較為積極的日本軍部接觸，並接受日本軍部對於復辟勢力的支持。同時鄭孝胥也憑藉著溥儀對他的器重而說服溥儀，使其不顧其他前清遺老對主權統治性與民族立場的擔憂和勸誡，決定與日本關東軍合作，進而走上創建滿洲國的路途。此時的鄭孝胥已將日本，尤其是軍部，視為一個最可靠的「合作者」，並成為此後鄭氏對於日本立場與觀點的基本論調。



第四章 「王道主義」與「日本觀」

自戊戌政變後到辛亥革命發生之前的這段時間，鄭孝胥與日本的頻繁接觸與互動讓他的日本觀與中日甲午戰爭甫結束時有明顯的不同。待清廷覆滅而民國建立後，為了實現復辟的目標，鄭孝胥將日本視為值得倚重的外來力量，並決定與態度較為積極的日本軍部合作，進而走上創建滿洲國的路途。建立滿洲國之後，鄭孝胥提出了以「王道主義」作為穩定滿洲國情勢的方針。筆者將嘗試於本章分析鄭氏詮釋「王道思想」的脈絡，並證明他欲以源自中國儒家的「王道」觀念來指導日本儒學界提出的「王道」論調之企圖。復次，藉由比較孫中山於「大亞洲主義」演講中對「王道」的相關論述，試圖了解鄭孝胥與孫中山兩人對於「王道」概念之異同，並探究鄭孝胥此時對於日本的觀感與定位問題。

第一節 「王道蕩蕩天所開」：王道主義在滿洲國的開展

在歷經與日本方面無數次的來回折衝與溝通後，雖然暫時無法成為滿洲國的皇帝，僅能以「執政」自居而不免有所遺憾，¹溥儀終究答應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出任這個實際上是受到日本操控的傀儡政權之「元首」一職。1932年三月，滿洲國正式成立。三月九日，溥儀下了四道敕令，第一道便是任命鄭孝胥為國務院總理。²雖然手中並無實權，³不過這對總算有政治舞臺可供施展抱負的鄭孝胥來說，除了可以一償多年來宿願，更可輔佐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可謂意義非凡。然而鄭孝胥上任便遭遇難題：如何替定位尷尬的滿洲國謀求一個正當性的立國基礎？世人皆知，若無日本方面的協助，滿洲國是無法建立的。為了擺脫來自日本方面的控制，並嘗試改變外界對滿洲國是「日本帝國的附庸」之印象，鄭孝胥希

¹ 溥儀對僅能擔任「執政」一職頗有怨言，經過鄭孝胥等人的溫言勸說才勉強同意。直到1933年7月，關東軍為穩定在滿洲國的統治地位，因此支持溥儀於滿洲國實行帝制。1934年3月1日，溥儀正式就任滿洲國的「皇帝」。參見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臺北：金禾出版社，1998），頁435-437、532-537。

² 《鄭孝胥日記》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1932年3月9日條，頁2369-2370。

³ 根據〈滿洲國政府組織法〉，當時的滿洲國中央政府機關，應有參議府（溥儀的諮詢機關）、立法院、國務院、法院與監察院等。然而實際上立法院卻沒有設立。鄭孝胥雖身為國務院總理，國務院底下各部（民政、外交、軍政、財政、實業、交通、司法等七部）的總長也是均由中國人出任，但行政實權卻操之於另一個由關東軍司令部所任命的總務廳，以及日本籍的各部次長，由中國人擔任的官職只是虛有其表，並無實權。參見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頁436-438。

望能找出一種方式、主義，來闡明滿洲國是有自我意識存在的、是不受日本所控制的，同時還能提升滿洲國人民對於國家的凝聚力，更可讓滿洲國達到「民族協和」與「大同世界」的目標。⁴

從歷史上來觀察，當東亞儒家文化圈諸國發生人民缺乏對國家的向心力之狀況時，統治階級與官僚集團大多會回顧古典儒家的經典內容，進而找出解決之道，⁵鄭孝胥自然也非例外。他必須從浩瀚的儒家經典中尋出一個可供其運用的思想資源。而這樣的資源除了可以當作治國之道的準則以外，更要具備足夠的內涵，以與當時國際環境中的其他思潮，如共產主義、帝國主義等對抗，進而重塑一個新的文化秩序或價值結構。以此需要為前提，鄭孝胥引援了首見於《尚書》而由孟子發揚提倡的「王道思想」做為其治國思想的根源，⁶並將「王道思想」視為宣揚儒家文化優越性的媒介體，實現鄭氏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

為何鄭孝胥以「王道思想」作為滿洲國立國精神與準則？論者指出鄭氏推行王道思想的動機主要有三：第一、作為維護傳統社會的穩定性以及君王統治制度的正當性。第二、還可當作是抵擋西方文明體制的盾牌，並對他所仇視的民國政體加以反擊，強烈反對所謂的「民主政治制度與政體」。最後是賦予其新的意涵、復興傳統文化，並由此證明源自於東方的儒家文化在國家與社會中價值體系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比西方的文明價值體系更為優秀。⁷

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筆者透過研讀鄭氏關於王道思想的演講資料與文字記錄，發現鄭孝胥提出王道思想尚其他的意涵。當時日本的漢學界也對王道思想此一命題有所討論，各家學者對於「王道」的解釋各有其異同。⁸眼見日本對於中國儒學的內涵有所爭辯，鄭孝胥便欲提出自己對於此一詞彙的解釋與看法，來「告知」與「指導」這些日本漢學研究者「真正的」王道思想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思想廣度與論調深度，頗有為來自中國的王道思想爭取正統的意味。這也與前文提到鄭孝胥終生信奉不渝的信念相互呼應：中國的儒家傳統文化高過日本的文

⁴ 張灝認為以「大同理想」為主要訴求的烏托邦主義向來被歷史學家所忽視，然而烏托邦主義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轉型時代中的主要階段與思潮卻又未曾缺席。如維新時期康有為的《大同論》，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的大同思想也已浮現，五四運動時期濃厚的世界主義氣氛更是明證。因此烏托邦主義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層面。參見張灝，《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4），頁 56-57。

⁵ 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11-212。

⁶ 「王道」一詞最早出現於《尚書·正義》篇。後經過孟子的詳細解述後，「王道」意即在上位者應仁德為本而施政治國，並成為儒家思想中為王者所必須遵循的準則。而「王道」的對比，便是「以力假仁」的「霸道」。

⁷ 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頁 84-87。

⁸ 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216-217。

化，因此中國的儒家學說應該是日本政治、社會與文化以及各方面的帶領者與指導者。有一事跡可反映此種想法甚早便於鄭孝胥的思想體系中成形。當 1916 年五月袁世凱因眾叛親離而取消洪憲帝制之際，傳出日本欲以行動支持復辟的消息，外界多認為日本此舉是意圖增加對中國的控制與奪取利益。然而日本方面認為這是「道德」性質的干涉。對此，鄭孝胥撰文以論述之：

日人自謂，贊助復辟之舉乃道德干涉，非權利干涉也。余謂：「華人宜有一部自倡道德主持，則彼不得不受道德之拘束力，以義始者，必不至以利終矣。」⁹

在這段論述內容當中，可以將之分為兩個層次。首先，日本宣稱出「道德」與「權利」兩者之間的不同。由於外界質疑日本支持中國復辟勢力的動機，因此日本方面做出澄清，宣稱他們是基於「道義」方面的考量而支持，並非如同外界想像是以奪取中國利益為前提。而鄭孝胥提倡復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力圖恢復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而消逝的傳統社會之道德價值體系。因此，在此一思想的框架上，支持復辟必定是以道德為前提，絕非僅為求取利益。

另一個層面是中國與日本兩國「道德」的高下之別。從文中可見鄭孝胥對於日本自身的「道德」之效用是持保留立場的。他認為只要日本遵循中國的道德規範體系來幫助中國復辟派人士，自然就可證明其動機乃由「義」出發，而非受人批評的「利」。換句話說，鄭孝胥指出倘若日本以自我的道德體系來行事，將無法向外界解釋其支持復辟的「正當性」，但如依照中國的道德標準，問題即可迎刃而解。除了希望日本尊重中國以外，鄭孝胥的此一觀念更突顯出中國傳統道德在他思想脈絡體系中的崇高地位。二十餘年之後，鄭孝胥運用「王道思想」這個在中國沈寂已久的觀念來詮釋滿洲國的立國精神，更希望他對於王道思想的闡釋內容，能夠改正日本儒學對王道思想的觀念，同時也引領日本走向真正的「王道」。而鄭孝胥的這番意圖，正為其過去思想觀點的具體展現。

在論述鄭孝胥如何賦予王道思想新的價值與使命之前，必須先對王道思想在日本的流傳與演變過程加以解釋。作為中國自漢代起的主流意識與統治工具，儒家學說對於日本的影響可謂深遠，但直至德川幕府建立後，儒家學說才脫離從屬於佛教的地位而獨立。¹⁰這是由於當時以重視「名分」的朱子學為主的日本儒學，正好符合德川幕府欲建立穩定的階級制度與統治合理性的需求，因此被統治階級

⁹ 《鄭孝胥日記》第三冊，1916 年 5 月 24 日條，頁 1611。

¹⁰ 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頁 31。

提升為「官學」的高度，自此儒學於日本始盛。¹¹隨著儒學在日本的興盛與官方化，使得不少學者們將其學術興趣的觸角往朱子學與陽明學延伸，因而出現不少對受到官方保護的朱子學提出批評的聲浪，進而產生其他的儒學觀念與思想。其中，孟子的王道政治論被以復古為訴求的「古學派」所重視，而此一學派又可以伊藤仁齋(1627-1705)與荻生徂徠(1666-1728)為代表性的人物。¹²這兩人都以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為中心，並對「王道政治論」各自加以闡述。但兩者的立場大相逕庭，伊藤仁齋可謂孟子學說的忠誠信徒，而荻生徂徠則是對孟子思想有所批評。兩人學說的差異使得了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儒學家對是否遵循孟子學說的議題，產生出激烈而漫長的討論過程。

仁齋與徂徠對於王道政治的論述各為何？就以「王」的定義而言來做切入，仁齋抱持「行仁政皆可成王者也」的立場，不重「天命」的絕對性影響，認為是由「人治」與道德因素來決定何者為「王」；相對的，徂徠則採「天命既定」的論調，「王者」由天選定，而非由後天的個人行為與道德體系來決定。對「王者」認定的分歧連帶影響兩人對「王道」的定義。仁齋認為，「王」並不受天命所拘囿，因此「王者之道」便可視為「仁者之道」或「聖者之道」；而提倡「王者」由天命認定的徂徠，則注重「王者之道」在各部經典中的記載與規範，欲以制度來為其立論與建立秩序，是一種「安天下之道」。¹³兩人對「王道」的注重層面甚有不同。

日本政治制度的發展決定了兩派學說在日本儒學中影響力的消長。以尊孟為基調，訴求「人治」與偏向「民本」的伊藤仁齋理論並不合乎當時德川幕府政體所重視的階級觀念，更與後來明治政府提倡以「萬世一系」為立論的天皇制度有所矛盾。若依仁齋的理論加以發展，那麼任何一個德行高潔，並能做到安民興邦的人，都能成為王者，而不需顧慮天命既定的前提。這種說法對於一個政體的穩固性將是一大衝擊與挑戰。明治以降，強調天皇其「天道」與「神聖」之絕對性

¹¹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頁 25-26。

¹² 「古學派」的首創者為山鹿素行(1622-1685)，他反對當時被德川幕府做為官學的朱子學，主張孔孟精神應直接從聖賢之書中求之。山鹿的學說受到幕府的打壓，因此始終未能成一學派。後來伊藤仁齋與荻生徂徠承繼山鹿尊崇古學的思想並大力提倡，而有「古學派」的出現。參見陳水逢，《日本文明開化史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 221-223。

¹³ 張昆將指出，伊藤的王道政治論點因遵循孟子之學說，而偏重於德性意涵與覺悟之學，因此傾向於「思想性」的抽象層面，可稱為「思想性的王道」(Intellectual Kingcraft)；而荻生之論點基調為反對孟子之說，因此他認為王者之道在禮樂制度與政治規範的內容中來發掘。整體來說，荻生對於伊藤所主張的內在德性加以輕忽，而偏重於「制度」層面，因此可將荻生的王道政治論歸類為「制度性的王道」(Institutional Kingcraft)。不過單以此二分法來區別仁齋與徂徠之學說稍嫌簡略，張昆將認為還有仔細論述的空間。參見張昆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121-151。

的日本儒學者，更是將伊藤的以「人治」為訴求的王道理論學視為洪水猛獸而加以反對或漠視。如此一來，認為王者是由天命所選定的徂徠學，相比之下就較為迎合德川政體，與後來明治天皇政府的需求。因此徂徠學對往後的日本儒學影響甚鉅，還被譽為是奠定日本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¹⁴並受到明治時代以後日本儒學家的接納與改良，以與日本天皇制度的特殊性相互配合。¹⁵

面對日本方面的「王道」思想觀點，鄭孝胥該如何解釋或轉化中國儒家的王道思想內容，以作為日本儒學的「指導者」？此外，他還希望自己的王道能夠做到兼顧日、滿雙方的「民族協和」方針，以及作為將滿洲國建設成「大同世界」的準則。為此他藉由引用中國儒家經典中有關於王道思想的論述，首先說明自己的王道主義乃是承續中國儒家傳統思想而來，昭示他王道主義的正統性：

王道從何研究乎？必取經史所載，師傅所傳，廣搜博採，以求端緒，此孔子所謂多學而識，游騎無歸，不足語於一貫之道也。¹⁶

如何建立正統性？以中國儒家經典中的相關內容做為自己學說的綱目，就是最好的方法。藉由王道主義的正統性地位，鄭孝胥就可將由朱子學演變而來的日本儒學加以連結，以建立對日本儒學的根源性。鄭孝胥還更進一步的指出自己的王道主義應該由何處開始：

《大學》首章，所指格至誠正修齊治平，反覆申明，即為一貫之定義……吾願學者，不必貪多務廣，只取《大學》一書，專心考求絮矩之道，於人之所欲，與人所不欲，相處之際，心體力行，則王道全體，觸處貫通……苟能達於人情，王道研究之法，盡於此矣。¹⁷

鄭氏認為被朱熹列為儒家經典《四書》之列的《大學》，乃古代聖賢對王道思想相關論調集大成之著作，尤以首章最為重要。《大學》探討「三綱八目」的連貫性過程，其中包含了「明明德」、「親民」與「止於至善」三個面向，正是一個人從自我彰明德行開始，經過親愛人民的過程後，而達到至善的境界的一貫性過

¹⁴ 丸山真男著，徐白、包滄瀾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220-246。

¹⁵ 雖然徂徠學的王道政治論強調「天命」與「尊君」，但其理論中有關歷史循環的部分，卻未能提供天皇統治的永續穩定性。因此明治時代後的儒學者加強「受天命者行王道」的說法，將天皇統治視為「王道」而永續。參見陳瑋芬，〈「天道」、「天命」、「王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繼承和轉化—兼論中日帝王之神聖化〉，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頁252。

¹⁶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74。

¹⁷ 同前註，頁74-75。

程。¹⁸鄭孝胥認為，若為王者欲行王道，必須擁有一套自我道德規範，以作為體現王道的首要前提。而《大學》的內容恰好為鄭孝胥的理想，提供了一套學理上的根據。若要探究古代聖賢對於「王道」的理想，鄭氏希望不管是在上位者，或是有志於研究傳統儒家思想中王道思想的後人，都應該要從《大學》一書開始體會，便可逐漸對先賢的王道思想有所貫通，則「王道研究之法，盡於此矣」。

《大學》的「三綱八目」又可與儒家理想境界的「內聖外王」概念相互呼應，將對自我內在德行的要求做為動力，以達到用仁德治民平天下的境界。因此鄭孝胥又以「內聖外王」的概念出發來闡述他的王道主義理論。「內」是「內聖」，「外」為「外王」，而「內聖外王」，則是在上位者施行王道之必要條件。鄭孝胥是這樣解釋他對於「內聖」的定義：

內聖之學無他，為克己二字而已……人皆有身，身皆有欲，欲之所包者廣……縱欲無度者，反以食色為本性，其勢必將背禮義、棄廉恥，悍然不顧，而以縱欲為合理，此乃喪人性，而歸於獸性者也。故克己者，必先制欲。¹⁹

他認為「內聖」的要旨就是在於「克己」，要去克制自身的慾望。當一個人使自己縱於慾望，就會陷入道德淪喪的危機中。失去了自我的道德規範，就無法實行與體會「王道」的真諦。因此「縱欲」乃破壞道德的第一首惡，這是鄭孝胥所強調的重點。

倘若具備了「內聖」的內在修為，那麼「外王」的外顯層面也應該會一同實踐。²⁰前文提及鄭孝胥重視「內聖外王」，那麼對於如何實踐「外王」層面的目標，鄭孝胥也做出了說明。他希望在上位者要能體恤民意，由「利民」的角度出發，抱持「以民為本」的態度來治理國家：

王道所謂外王者無他，利人而已。王道雖分內外，實為一貫之學，蓋不能克己，必不能利人也。利人之顯而可見者，則為政治……人

¹⁸ 雖然《大學》中的八大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似乎有著先後從屬的順序關聯，但若強硬的加以區隔，反而失去條目間的連貫性與對應性。有鑑於此，中國歷代大儒如朱熹、王陽明、劉宗周與陳確等，都一再強調這八個條目彼此之間的一貫性與共通性，武斷的加以編列順序並不合於思想脈絡的本質意涵。參見陳熙遠，〈聖王典範與儒家「內聖外王」的實質意涵〉，收入黃俊傑主編，《孟子思想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36-41。

¹⁹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58-59。

²⁰ 陳熙遠，〈聖王典範與儒家「內聖外王」的實質意涵〉，收入黃俊傑主編，《孟子思想的歷史發展》，頁43。

君以利民為天職，凡不利於民者，必驅而避之……夫政治教化，皆求利人，而除其害，所謂外王之學者在此。²¹

將「王道」實踐於外顯的層面，就是「外王」。對中國儒家思想來說，「內聖外王」意指著道德與政治的統一，「內聖」是內在的道德基礎，而「外王」則是外在的政治目的。政治必須由道德做為指引的方向，而道德也必須要落實於政治，才能發揮最大的影響。在上位者必須藉由內心層面的不斷修養，並盡可能的提升自我的道德而達到「仁」的境界。以此為基礎，為王者才能確實的施行仁政，進而安邦治國，以達到「外王」的目標，兩者是同時存在、同時彰顯的。鄭孝胥在此以「利民」來形容為王者行仁政的用意。遵循王道就能利人，而為王者施行王道，便是利其屬民。換句話說，在上位者施行仁政，就是要讓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此便是「利民」之政。如此一來，「使王道施行，則世無所憾。克己利人之化行，乃王道之全功，大同之稱，蓋合舉世為一體」。²²施行「王道」的世界，將成為儒家經典中所傳頌的「大同世界」。

光提出理論是不夠的，鄭孝胥明白這一點。他也預設自己的「王道」論將受到外界的質疑：「王道」是否真的合乎現代世界之所需？「王道」是否真能實行於世？不取「私利」，講求「利人」，是否會導致「損己」？針對這些疑問，鄭孝胥藉由孔子學說中的「克己利人」的觀點為例，對自己的王道主義加以補充：

孔子告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王道正直，此言人己之間，視同一體，不必有所偏重。固不可利己而損人，亦不患利人而損己也。王道推行，既不至於受害。今所難者，惟在先施而已。²³

在這段言論中，鄭孝胥強調行「王道」是不需要區分人己的。人己一體，謀求所有人的利益，又怎麼會造成「損己」？這是鄭孝胥對於「行王道是否損己」的解答。不過鄭孝胥也承認「王道」之所以難行就是難在「先施」，而有「王道未易復」的感嘆。²⁴難以先施的原因，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舉世方溺於利己之學」。世人因追求「利己」，而認為行「王道」會「損己」而不予以承認或實行，「利己」正是鄭孝胥實行「王道」理想的最大阻礙。這也再次解釋了鄭孝胥為何要極力宣揚「克己」的原因。

²¹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 59。

²² 同前註，頁 62。

²³ 同前註，頁 69。

²⁴ 鄭孝胥，〈述懷〉，收入《海藏樓詩集》，頁 417。

綜合以上所論，可以瞭解到鄭孝胥王道主義所著重的層面在於「人治」方面，而不像日本儒學中徂徠學派如此重視「天命」因素在王道思想中的作用。鄭孝胥的觀點承繼了孟子的思想脈絡，將「施行仁政以治民」置於推行王道主義的第一要務。若要施仁政以行王道，則必須重視個人品行的磨礪與是否具備仁德的觀念，才能真正的施行王道主義，以符合孟子「養民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的主張。與徂徠學中重視「天命認定」的王道觀念有所區別，鄭孝胥的王道主義似乎與極度尊崇孟子的仁齋學派王道論點較為類似，對王者「德行」與「仁政」的「人治」層面之重視程度，皆大於重「天命」的徂徠學。

另外，前文曾論述滿洲國是由於日本方面的「協助」之下才能建立。那麼在鄭孝胥的王道主義學說中，該如何對於「民族協和」的現象如何解釋？王道主義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個上位者以行仁政而利民的大同世界。那麼在建構大同世界的過程中，該如何處理國防問題？這些問題背後的意涵，即代表鄭孝胥該如何面對當時興盛於世的民族主義風潮。²⁵

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即受到強烈的西方文化刺激，為民族主義在日本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背景。為了要與西方列強並肩、甚至與其抗衡，日本開始在教育上強調傳統的民族政治價值觀、宗教觀和道德觀的重要作用，並在追求現代化、西方化價值體系之中，努力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²⁶另一方面，中國在晚清時期不斷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凌，為了追求民族的生存與獨立，也開始引進西方民族主義的觀念，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即為一顯例。待民國建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再對內而轉為對外，1918 年的五四運動、1925 年的五卅運動，乃至於 1931 年的興起的抗日風潮，都是民族主義興盛於中國的事例。²⁷興盛於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對鄭孝胥欲實行「民族協和」的目標來說，是相當沈重的阻礙。有鑑於此，他在王道主義中提出了「博愛」的觀念。他認為在實現「王道」之前，必須把格局放廣而「博愛」，而非侷限在片面的「愛國」性質：

後世緣歷史之習慣，莫不提倡愛國，只求己國有利，則不顧他國之受害。凡損人利己之事，個人所不忍行者，國家行之，皆以為合理。然則國家縱萬惡之國家，引起舉世之爭鬥，論者亦視為合理。終致

²⁵ 從 18 世紀末期至 19 世紀初期，是民族主義運動風行於歐洲大陸的時期，並決定了 19 世紀的歐洲政治的局勢與走向。至 19 世紀末，民族主義的觀念開始擴及亞洲，並傳入中國、日本與印度等地，對這些地區與國家都造成了莫大的影響。參見 Hobsbawm, E. J.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臺北：麥田出版，1997），頁 139-200。

²⁶ 陳秀武，《近代日本國家意識的形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191-221。

²⁷ 張玉法，〈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角色〉，收入劉青峰主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 107-112。

己國人民，亦受其苦，所謂愛國者何在乎？²⁸

鄭孝胥認為「愛國」觀念充其量只不過是某個國家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視為理所當然的一種手段。倘若「愛國」觀念受到某個居心不良的國家利用，藉其行爭鬥之實，只會讓人民受苦。因此鄭孝胥要反對「愛國」而主「博愛」，而「博愛」具有「人已不分」的精神，同時也是王道主義的體現。「果行王道，必先蕩滌愛國之思想。而以博愛為主，必先革除軍國民之教育，而以禮義為先」，²⁹鄭孝胥反對國家宣揚「愛國」的理由，就是不希望以「愛國」為藉口而實行軍國民教育。³⁰這對於他的大同世界來說，是不需要的：

愛國之思想、軍國民之教育，皆足以釀成世界戰禍。王道則不主愛國而主博愛，不用軍國教育，而用禮義教育。³¹

直接點明愛國思想與軍國民教育是造成世界動盪的元兇，鄭孝胥再一次的強調他強烈反對宣揚愛國觀念的立場。換句話說，民族主義正是他在推行王道主義之前首先要摒除的障礙。以廣泛的博愛來代替片面的愛國，除了能消去民族主義所帶來的困擾，更合乎於王道主義的思想脈絡。為了強調自己的觀點，他更具體的論述了追求愛國思想與軍國民教育所將帶來的弊病與缺失：

當世列國所用以造成國民之思想者，豈不曰愛國乎？所用以養成國民之能事者，豈不曰軍國民之教育乎？各國所以練習其國民者，唯恐落於人後，豈知愛國之宗旨，即為仇外之對象；軍國民之資格，即為備戰之先聲。³²

於此鄭氏將愛國思想直接將「仇視外敵」連結，並把軍國民教育看作是隨時備戰的舉動。他對民族主義的厭惡，可見一斑。

鄭孝胥這麼強烈的反對民族主義，就是為了替滿洲國「民族協和」的目標來鋪路。由於滿洲國兼具日、滿、漢等各民族之成員，而以漢人為最大多數。若使民族主義的風潮在滿洲國內蔓延，將會造成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心態，進而對滿

²⁸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 64-66。

²⁹ 同前註，頁 70。

³⁰ 軍國民教育的本質，在於「文武合一、德術兼備」的觀念，藉由教育的過程來培養學生對於軍事方面的相關知識、技能、情操與精神等，進而用以愛護民族、保衛國家。軍國民教育自清末民初時期起開始受到重視，今日高級中學以上的軍訓教育，就是當初軍國民教育遞嬗演變而來。參見瞿立鶴，〈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思潮〉，《師大學報》第 29 期(1973)，頁 27-46。

³¹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2 年 7 月 19 日條，頁 2396。

³² 鄭孝胥著，彭述先編輯，《鄭總理大臣王道講演集》（新京：福文盛印書局，1934），頁 3-5。

洲國政體的存在與延續產生負面影響。鄭孝胥希望藉由以「博愛」為訴求的王道主義，來消弭滿洲國基層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與抵抗。只有革除了民族主義所留下的遺毒，才能夠達到滿洲國國內「民族協和」的目標，並建立一個真正的「大同世界」。

在闡明了王道主義乃承繼中國先聖先賢王道思想脈絡而來的正統性，並以「博愛」概念來處理因民族主義而可能產生的嚴峻情勢以後，鄭孝胥還希望自己的王道主義能夠更進一步，成為當時中國與日本王道思想的帶領者。秉持著一貫的原則，鄭孝胥將中國的儒家學說視為不容挑戰的完美典範，也是他終生所奉行的信條。因此對鄭氏來說，中國的王道思想自然要比日本儒學中的王道思想更為純正與真實。鄭孝胥曾透露出他對於日本王道思想的看法：

平沼言，日本歐化太甚，勿蹈其失。語以「庶富後教」及「道以德、齊以禮」之意。凡恃法以治者，賤其民者也；不賤其民，化乃可成。王霸之異在此。³³

自首次駐日起，鄭孝胥便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缺失即為歐化程度太過深入，與過於輕視中國傳統儒學對日本的長久影響。因此，當日本的平沼騏一郎(1867-1952)向鄭氏提到他對於日本的缺失評語時，³⁴鄭孝胥便以中國儒家思想的治國觀念來「教育」平沼，還告誡他若不依循中國儒家思想來統治人民，就不能合乎真正的王道思想，反而是走向「以力假仁」的霸道思想。對鄭孝胥而言，日本的王道思想非但不足，亦有偏頗。³⁵因此他認為日本唯有幫助滿洲國施行王道主義並一同提倡，如此即可提升日本王道思想的內涵與層面：

今滿洲國興，倡言王道，而日本助之，此乃國家道德之聯合。苟能以國家道德聯合世界，此即與國家道德征服世界何異？³⁶

在此鄭孝胥呼籲日本應該盡力協助滿洲國，便可達成「道德的聯合」。此一「聯合」的關鍵，便是鄭孝胥的王道主義。以此行之，還能進一步「聯合」世界。如

³³ 《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4年4月1日條，頁2516。

³⁴ 平沼騏一郎，日本津山藩(今岡山縣)人，1888年自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後進入司法省。1907年任司法省民刑局長，從此進入政界。1939年1月，近衛文磨內閣宣布總辭。在軍部和右翼團體的支持下，平沼騏一郎擔任總理大臣。任內頒布了《擴充生產力計劃要綱》、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1940年8月因無法協調內閣中對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的爭執而下臺。日本戰敗後，以「戰犯」的罪名被判終生監禁，1952年病逝。

³⁵ 在某次對話中，日本學者曾對鄭孝胥提及當時日本國內研究王道思想的情形，有「皆重外王而非內聖，故未能踏實」云云。而鄭氏特別將此言記載於日記中，顯示出他對於此一言論的重視與認同。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2年10月9日條，頁2414-2415。

³⁶ 同前書，1933年5月18日條，頁2461。

此一來也不再需要透過武力手段來征服其他國家，整個世界都將成為施行王道的樂土，這也是鄭孝胥提倡王道主義的終極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鄭孝胥並不是將儒家思想中的王道觀念與近代中國政治局勢連結的第一人。1924 年孫中山就已在他的「大亞洲主義」中提及有關王道思想的相關概念與內容。孫中山的王道思想與鄭孝胥的王道主義有何異同之處？「大亞洲主義」的王道思想對鄭孝胥提出王道主義是否有所影響？對於孫中山的王道思想，日本又以何種態度對應之？筆者將在下文中試圖釐清這些問題。



「大亞洲主義」與「王道」思想

承前所論，筆者認為鄭孝胥將日本視為滿洲國施行王道主義的跟隨者與協助者，並希望藉此達到日、滿「民族協和」的目標。但在鄭氏提出王道主義以前，孫中山已於一次向日本人士演講的場合上，公開提到「大亞洲主義」的思想與看法，並對日本人述說他對於王道思想的觀點，以及日本在此一王道思想架構中的定位與作用。³⁷孫中山與鄭孝胥的立場可謂完全相對，一個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開國元勳，另一個則是前朝的遺老，但兩人又有一個背景上的共通點，那就是在其生涯中均甚早就與日本有所接觸，³⁸因此他們都為日本在自己的王道體系中尋求一個應有的角色或定位。如此巨大的立場差異必然會使得他們對於「王道」的闡述內容有所不同。但兩人對於日本又同有一分特殊的感情。那麼，兩人對於日本在王道思想體系的定位上是否相異？影響又為何？通過對於孫中山其「大亞洲」主義與王道思想的觀察，除了可以瞭解當時中國內部解釋王道思想的分歧情形以外，亦可說明為何日本方面接受了鄭孝胥的王道主義，而非孫中山王道思想論調之原因。

孫中山於 1894 年便已注意到日本的明治維新，並論述清廷應該重視日本的成功經驗。³⁹三年後，孫中山於日本橫濱短暫停留，與後來影響其革命事業甚為深遠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1871-1922)見面。⁴⁰在與宮崎談話的過程中，孫中山感受到日本政府有心對中國的革命加以奧援的態度，至此他與日本的互動開始趨於緊密，⁴¹直到日本對華政策因八國聯軍之役與日俄戰爭的爆發而有大幅度的改變後，孫中山與日本原有的緊密關聯才開始出現疏離的現象，此後益發明顯。⁴²雖

³⁷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401-409。

³⁸ 孫中山於 1897 年首次赴日，時年三十一歲；而鄭孝胥於 1891 年出任駐日本公使館書記官，同樣也是三十一歲時赴日。

³⁹ 1894 年 6 月，孫中山向當時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其中便提到中國應以日本為範例而進行改革：「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參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5。

⁴⁰ 宮崎滔天本名寅藏，號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縣人。於就讀東京專門學校（今日的早稻田大學）時接觸到了自由民權運動的思想，並由此開始關注亞洲的革命運動。1891 年時接到外務省的任命，被派去調查中國秘密結社的情況，從而開始了與中國革命黨人的聯繫。1897 年，宮崎滔天結識了孫中山，從此以後開始為中國的革命運動提供幫助。一直為同盟會的成立奔走效力。於 1902 年發表自傳《三十三年之夢》，詳述與孫中山的革命歷程，成為研究孫中山、辛亥革命和中日關係史的重要資料。

⁴¹ 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 17-46。

⁴² 由於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擔憂清廷會與俄國合作來對抗日本，因此開始協助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勢力，意圖牽制清廷，同時也努力培養清廷內部的親日勢力。後來義和團事件爆

然如此，孫中山依舊相當希望日本能夠給予中國實質上的幫助。在他 1913 年 2 月至 3 月於日本停留期間所發表的大量言論可以看出，⁴³孫中山以亞洲為出發點，強調日本在亞洲局勢的重要性，同時希望較為先進的日本能夠對中國產生提攜效用，並盼望這個被他視為「第二故鄉」且與中國為「唇齒之邦」的國家，能與中國相互扶持，進一步謀求亞洲的和平：

亞細亞為吾人之一家，日本與中國則一家之兄弟也。假使此雙生之兄弟，有相閱之事，則亞細亞之一家，絕不能保持其平和。日本為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為東方最大之國，使此兩國，能互為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則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維持，蓋無可疑者。⁴⁴

在此，孫中山將日本定義為「兄弟之邦」，論述兩國合作後對亞洲未來發展趨勢將帶來的正面影響。甫建立的民國政府相當需要其他列強的支持，孫中山認為與中國「同文同種」的日本就是協助中國強盛的最好對象，因此他於赴日期間不斷宣揚他的理論，並呼籲日本當局與人民應該重視與中國合作的必要性。而這些言論的內容，也可將其視為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的濫觴。

不可否認，當時流行於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思潮對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可說是推動孫中山闡揚大亞洲主義的外部推動力。「大亞細亞」主義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日本社會廣為流行的一種社會思潮。這種思潮的主要形成原因，乃出自於對西方列強對亞洲的侵略的反抗意識所造成。自 1880 年代起，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漸強，因此明治政府試圖修改先前與西方列強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內容，以證明國家的變化與強盛。另一方面，當時日本思想界也興起一種將「亞洲」視為一共同體，由日本為統領亞洲其他國家或民族，以對抗西方國家對亞洲的侵略舉動。不過此時的大亞細亞主義尚處於成形階段，因此會出現不同的說法與主張，以多元性的觀點來對「亞洲」這個屬於空間

發，日本為避免向來被認為是日本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緩衝地帶的中國遭受列強瓜分，而將對華政策轉為協助清廷對中國的控制力，並停止了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幫助。日俄戰爭後，日本對於清廷的腐敗更為瞭解，也明白清廷才是日本可以控制的對象。為了保持清廷的存在，日本更是對革命勢力進行打壓的動作。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也未對孫中山提供實質上的幫助，成為孫中山必須與袁世凱妥協的主要原因。參見黃自進，〈利用與被利用：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與日本政府之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9 期(2003)，頁 113-145。

⁴³ 孫中山於 1912 年 4 月辭去臨時大總統後，該年 10 月在上海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展開築路計畫與對外交涉的工作。1913 年 2 月，孫中山前往日本以尋求外資的資金援助。孫中山於日本發表多次演說，暢談中日合作以興東亞的願景。參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冊，頁 13-28。

⁴⁴ 同前註，頁 16。

性質的概念進行闡述。⁴⁵但這些派別的背後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試圖為日本在當時的亞洲中尋求一個定位與角色。論者認為，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的大亞細亞主義，是偏向於「古典」性質與「思想」層面的「亞細亞主義」。⁴⁶

然而這種「古典」的、偏重於「思想」性質的亞細亞主義，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出現了轉變。由於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獲得空前的勝果，這個結果改變了日本政府與人民原本對於中國的認知與想像，並讓他們確切體認到日本的強盛程度已超越亞洲各國，的確有資格作為亞洲這一個區域的霸主。在這種心態的推波助瀾之下，國家主義開始出現於當時的日本社會思潮而日益興盛。相對的，注重亞洲整體發展的「古典」亞細亞主義卻開始式微，並逐漸受到國家主義的影響而往其傾斜之。當國家主義與亞細亞主義結合後，促使原本重視東亞文化與推動亞洲整體強盛的「古典」亞細亞主義，逐漸轉向「擴張式」的「大亞細亞」主義。此時的大亞細亞主義將焦點置於日本的國家利益，並以此為出發點來探討「亞洲對於日本謀求進一步的興盛有何幫助」、「日本應如何透過亞洲來使自己更為強盛」等命題，由此可見日本的利益已被視為優先於亞洲其他任何一個民族的利益。⁴⁷至此，「古典」與「思想性」的亞細亞主義漸次被「擴張」與「行動性」的大亞細亞主義給代替，更與由日本政府、軍部與右派激進人士所主張的「大陸政策」相互融合。⁴⁸演變到 1920、30 年代，大亞細亞主義便被日本作為排除西方列強在亞洲各項特權的理由，也被當作是日本在亞洲地區的擴張行為的正當化工具，並作為滿洲國建設藍圖的重要方針。⁴⁹後來日本政府與軍方更提出建構「東亞新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政策，正是將這種「擴張性」與「行動性」的大亞細亞主義作為其思想依據的根源。⁵⁰

原本提倡「興亞」的亞細亞主義逐漸轉成強調擴張性質的大亞細亞主義，早先以亞洲區域整體進步為關懷的立意已不復見，如今卻轉變為以擴大日本在亞洲利益與權力為主要目標。換言之，此時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已與先前孫中山期待日本做為中國的兄弟鄰邦以求共同進步的亞細亞主義，可謂南轅北轍，對此孫

⁴⁵ 這些論點包括以「興亞」為主要目標的「亞細亞連帶論」，鄭孝胥在上海所參與的亞細亞協會即屬該派論點的組織。此外還有由福澤諭吉所提出，以日本作為東洋區域盟主的「東洋盟主論」。參見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臺大歷史學報》第 30 期(2002)，頁 186-188。

⁴⁶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54-55。

⁴⁷ 同前註，頁 137-165。

⁴⁸ 同前註，頁 210-220。

⁴⁹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98.

⁵⁰ 盛邦和，〈日本亞洲主義與右翼思潮源流〉，《歷史研究》第 3 期(2005)，頁 137。

中山感到失望。他亦不滿於日本政府於袁世凱稱帝與段祺瑞借款二事的態度，⁵¹因此孫中山對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提出了批評的論調。在一次與日本記者對談的過程當中，⁵²孫中山提到了他對於此事的感嘆：

兩國親善欲其實現，要不在方法之問題，而在雙方之意思如何。若果有真希望親善之意思者，卻不問方法，亦可翹待而至者。日本既真有其意思，乃尚時有誤會，則當格外求其如何可以致真親善。斯誠是一重要之事。余固嘗為一希望兩國親善者，今後更當運思致力於此。⁵³

孫中山論述中日兩國若真欲達成親善合作的目標，日本的態度將是關鍵所在。他認為這時候的大亞細亞主義已將「保護」與「增加」日本在亞洲的利益為第一優先，而那「興亞」的初衷已經被逐漸淡忘了。一味追求更多利益的日本，自然無法讓中國感受到欲使兩國親善的「誠意」。如此一來，只要日本不收斂其野心，就算日本政府提出再多的與中國的合作方法或條款，也終將徒勞無功，更使中國人民心生厭恨之感。⁵⁴

對孫中山而言，日本主張的擴張性大亞細亞主義並不能作為支撐亞洲和平情勢與提升亞洲進步的思想框架，因此他在 1924 年提出了他對於當時亞洲情勢的看法，也就是「大亞洲主義」。在提出「大亞洲主義」的演講過程中，孫中山詳細論述了眼前的亞洲局勢，並探討亞洲區域各民族和平共處的可行性，更以文化角度出發，帶入「王道」與「霸道」的觀念來解說中國、日本與西方列強的分別。他強調注重科學、物質與武力的歐洲文明，是屬於壓迫別人的「霸道」文明，⁵⁵接著孫中山清楚闡釋了他對於王道的定義：

還有一種文化，好過於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

⁵¹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臺灣東華出版社，2001）頁 113-114、頁 163。

⁵² 孫中山於 1918 年 5 月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軍政府七總裁之一後，旋即宣布辭去總裁一職並離粵赴滬，後又於 6 月初取道臺北轉赴日本，6 月 10 日於日本九州門司上岸，並對來訪的日本記者發表談話。參見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1122-1126。

⁵³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四冊，頁 483。

⁵⁴ 曾有人詢問孫中山「中國何以恨日本之深」的問題，孫中山論道：「日本政府軍閥以其所為，求其所欲，而猶望中國人之不生反動，全國一致，以採遠交近攻之策，與爾偕亡者，何可得也？」點明了中國人民對日本作為的負面情緒。參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五冊，頁 74。

⁵⁵ 任浩，〈孫中山的大亞洲思想〉，《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卷第 5 期(2005)，頁 107-109。

德……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⁵⁶

以文化的角度來解釋王道，是孫中山王道思想的特點。他認為王道文化的基本內涵就是「仁義道德」，而霸道文化的內涵就是「武力壓迫」，霸道是以力假仁，而王道則是以德行仁。⁵⁷孫中山指出由於霸道文化大興於西方，使得這些西方國家的道德「天天退步」。⁵⁸在糾正近代西方文明的缺失之後，他認為倘若亞洲國家能以王道文化為基礎並一同合作，便可對抗當時以「霸道」為主的西方文明，進一步還可以讓「霸道」服從於「王道」。從中可以發現孫中山以中國作為亞洲的主要表徵，中國自古以來所遵行的王道思想，即可涵蓋整個亞洲地區的文化脈絡，並認為中國的王道文化，要優於西方的霸道文化。針對此點，不單只有孫中山在其王道思想中提出對西方國家因崇尚物質、科學文明導致道德淪喪的批評，鄭孝胥也對十八世紀以來興起於歐洲的科學思想加以諷刺，論述這些科學並未遵循以仁義為本的王道思想，將會造成「使科學之成績，徒以濟其作惡之器具」的現象，⁵⁹使科學淪為野心家的侵略工具。另一方面，若盲目追求西方科學思想而用於中國，更會造成「輕其父母、暴民肆虐」的亂象。⁶⁰

次之，孫中山王道思想與鄭孝胥王道主義兩者之間的差異，可自兩人的背景、詮釋王道的事理依據，以及對日本的定位而看出。首先，孫中山雖以文化角度來解釋王道，但他所受的教育多以西學為主，與自幼即受儒家思想薰陶的鄭孝胥有所差別。鄭氏在解釋王道時，多以古聖先賢的思想材料加以解釋，再附加上自己的新意。這與孫中山以「王、霸之別」的文化角度來論述王道是有所不同的。再者也因為兩人的教育背景不同，鄭孝胥解釋王道觀念及其思想內容的方式，以引援儒家經典中王道思想的相關內容為主，並闡述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王道思想建構大同世界，也就是「王道樂土」滿洲國的可能性；孫中山則是以古代中國的朝貢體制為例，認為中國自古以仁義感化他國，並使其心悅誠服的前來進貢；西方國家卻是講求功利強權，以武力來壓迫他國屈服。因此中國這種以德服人的王道，才是真正的文化。⁶¹換言之，孫中山注重於中國王道文化為周邊的亞洲民族

⁵⁶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冊，頁 405。

⁵⁷ 賀榮一，《孟子之王道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153。

⁵⁸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冊，頁 405。

⁵⁹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 71。

⁶⁰ 有趣的是，鄭孝胥正是以中華民國為例，來論述共和政府因其崇拜歐美西方文化並捨棄傳統孔孟之學，導致今日的動盪亂局。同前註，頁 71。

⁶¹ 針對當時中國知識份子依舊存有「天朝」與「天下主義」觀念的情形，可參見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頁 195-201。

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並認為王道文化是亞洲其他民族或國家所應該遵循的準則與規範。與鄭孝胥不斷強調自己的王道主義是由孔孟學說演化而來的說法相比，孫中山似乎以較為實際的例子來說明他對於傳統王道思想的理解。

日本在王道思想體系中的定位問題，是孫中山與鄭孝胥兩人另一個不同點。鄭孝胥認為日本是一個施行王道的國家，只是日本儒學的王道思想有所不足或偏頗，因此日本應該接受他的王道主義，並與滿洲國一同施行純正的王道思想，而將王道主義推行至全世界。但孫中山並不認為日本是個真正施行王道文化的國家。他對於日本的定位有如下的表示：

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⁶²

起因於日本對革命事業的援助，以及當時興盛於日本社會思潮中的「興亞」風氣，孫中山一度樂觀的認為已從明治維新中脫胎換骨的日本，會因與中國同文同種的緣由，而以「兄弟之邦」的立場來協助甫自辛亥革命中新生的中國，並一同對抗強勢的西方文明。但擴張性大亞細亞主義的逐漸風行，以及日本渴求獲取更多在華利益的態度，再再都讓孫中山感到日本正朝向西方霸道文化的模式而演進。造成這種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所強調的西化政策。雖然西化政策讓日本成為當時亞洲最具有力量的國家，但同時也讓日本忘卻了原本受到中國王道文化影響的仁義道德觀念。孫中山認為眼前的日本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必須在霸道文化與王道文化中做出抉擇，而抉擇的後果將會左右亞洲未來的發展局勢。在孫中山的觀點中，他並不認為日本符合「具有」王道文化的標準，只能以日本因受到中國的長期影響，而界定為具有王道文化的「本質」。而且就孫中山的觀察，日本正在急速的拋去這個固有的「本質」，而急速的往西方的霸道文化靠攏，這並不是孫中山所樂意見到的。因此他希望藉由提出「大亞洲主義」來喚醒日本政府與人民原有的仁義道德，避免讓日本的擴張野心進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

與鄭孝胥的王道主義相比，孫中山提出「大亞洲主義」與「王道文化論」的時間早了近十年，但卻無法引起日本的注意。主要原因正是孫中山在大亞洲主義中表現出「以中國為中心的」論調。在其大亞洲主義中，孫中山不斷強調中國強盛的重要性，他以中國的朝貢制度來說明王道文化的正面作用。不過朝貢體系的

⁶²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冊，頁409。

背後意涵，是以中國為中心，通過「禮」的觀念，將中國內部的統治方式逐步向外擴大的一種方式，更是一種「中華大一統」的國際秩序體制。⁶³但日本卻認為經過明治維新的改革之後，已經脫離中國的朝貢體系與文化的籠罩；其後又於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獲得勝利，更讓日本認為自己已然成為亞洲的霸主。因此對於孫中山欲重新以中國為亞洲表徵的說法，日本自然無法苟同。從隔天日本報紙對孫中山此次演講報導輕描淡寫的程度，⁶⁴便可看出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王道文化論調既不迎合當時日本的對華政策趨勢，亦不合於日本極力在中國擴張利益的企圖。要日本政府接受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論調，實在是天方夜譚。至於包含在大亞洲主義中的王道文化論，更因為與當時日本的思潮多有抵觸而被加以刻意忽視。儘管孫中山以亞洲地區的和平為出發點，試圖呼籲日本應以興盛亞洲為念，而非將「侵略」做為國家政策的發展方向。但就日本大陸政策的發展來看，孫中山希冀日本走向和平之路，無異緣木求魚。⁶⁵因此孫中山的王道思想並未對中日兩國的關係帶來改變或影響。半年後孫中山因病逝世，他的王道思想也隨其消逝。

出於自身的利益考量，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王道思想並不被日本所接受。相較來說，鄭孝胥的王道主義更適合作為日本擴展在滿洲國統治權力的思想資源，因此日本接受了鄭孝胥的觀點，並予以支持。已建構出王道主義內容的鄭孝胥，該如何加以推行？而日本對於鄭孝胥的支持態度，是否始終如一？若日本態度出現變化，其原因為何？其影響亦為何？筆者將在下文中處理這些問題。

⁶³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33-40。

⁶⁴ 當時日本大阪每日新聞報，僅以「這是我們應該首先去考慮」的話語來呼應孫中山的演說內容，大阪朝日新聞更未將孫中山演講內文中「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給翻譯出來，足見日本對於這次演講的冷淡態度。參見彭澤周，《近代中國革命與日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頁 327。

⁶⁵ 在歐戰結束後，為因應將來可能出現的新式戰爭型態，日本軍方提出了「總體戰」的構想，藉由對國家全方位性的動員，如人員、資源、精神等動員，來求取最終的勝利。然而日本乃一海島國家，天然資源極度匱乏，因此必須向外「發展」資源來源，以供戰時龐大的資源需求。因此總體戰概念便與大陸政策結合，為獲取更豐富的資源，就必須擴大物資動員的區域範圍。解決方法除了加強對外貿易以外，就是以武力向他國進行掠奪或侵略。這樣的國家發展策略，自然無法兼顧國際局勢的和平發展。參見陳豐祥，《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頁 251-262。

第三節 「王道衰興豈偶然」：日本支持態度的轉變

對於自己的王道主義，鄭孝胥深具信心。既然已有完備的思想體系，那麼鄭孝胥該如何向外、向人民，以及向全世界推行他的王道主義？有鑑於此，鄭氏擬定了一系列的相關措施，可分為以下幾個層面。首先，鄭孝胥先將目標置於思想的廣泛傳播層面。他把自己對於王道的概念與言論予以文字化，編輯出如《王道要義》、《王道講義》等帶有宣傳意味的作品，在友人來訪或接見重要外賓時加以贈送，並加以大量印製，以頒行全國。⁶⁶如此一來，除了可以宣揚自己的論調，更可讓王道傳播於外界，「使天下歸仰」。⁶⁷這是鄭孝胥的第一步。

單單僅靠宣揚王道主義的本體內涵，並不能帶來太大的正面作用。鄭孝胥必須證明，王道不僅止於政治環境裡的功能與作用，更可契合於其他層面，如此才能讓王道主義更為實用。鄭孝胥就曾在一次運動會場的開幕演講中，論及王道與體育兩者之間的關聯：

今日當為會眾說體育會之王道。王道首在好善。體育會技中技術高強者，眾人莫不歡忭，此乃如火如荼〔茶〕之真意，可謂好善矣。王道次在服善。體育會中優勝獲雋，眾人莫不稱譽，此即至公至明之良心，可謂服善矣。足見王道非難，人人心中有之。若不好善、不服善，則體育會亦可作罷，何能言王道乎？⁶⁸

在這裡，鄭孝胥把王道與體育競賽作了一個巧妙的結合，並且為他的王道主義增添了一些內容。運動場上競爭的過程中，總會因技術層面的高低出現贏家，優勝者將會受到眾人的讚美。鄭孝胥把眾人讚美勝利者的舉動視為「好善」，而對勝利者感到欽服的心態稱為「服善」。前文已提及鄭孝胥的王道理論以孔孟思想為其本源。那麼，承續孟子「性善」論調中認為人性本善，人人都有善性而無區別的觀點，鄭氏認為眾人皆能「好善」與「服善」，而這兩者又與他所提倡的王道主義有所關聯，鄭孝胥便以此為基礎推導出一個觀念：王道的觀念存於每個人的心中。只要人們都能順著自己的善性與良心，就能毫無阻礙的施行王道。以此為例可看出鄭孝胥相當致力於將較為抽象、不易親近的王道主義內容，與人民的德

⁶⁶ 鄭孝胥樂於將其作品贈送給友人與外國人士，尤以後者為甚。而其作《王道講義》原訂印行萬本以廣佈於滿洲國全境，後印共計五千冊。有關鄭孝胥將其作品贈送給外賓的記載，散見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2年9月23日條，頁2410；1932年10月11日條，頁2415等。至於《王道講義》的印製相關過程，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5年8月2日條，頁2594；1935年11月1日條，頁2604。

⁶⁷ 同前書，1935年2月3日條，頁2568。

⁶⁸ 同前書，1932年9月25日條，頁2410-2411。

行層面相互結合。如此一來，王道主義將不再僅限於一種治國安民的政治理論，而是兼具人格建構的道德範疇。由此看來，鄭孝胥擴大其王道主義之內容與層面的主要目的，便是在於廣泛與深入的推行王道主義，並希望以個人為載體來實行，內化於日常生活，而不僅限於政治環境或國家立場的層面。

為了推展王道主義，鄭孝胥先由出版相關論述作品來著手，創造出一個有利於傳播王道思想的環境與氛圍。進一步，鄭氏將其王道主義的內容加以增補，使其從偏於治國安民的政治理論擴展至與個人德行結合，為王道主義賦予了普世價值的意涵，並證明王道主義是放諸四海皆準，是人人都是可以遵循的。這樣的意涵讓鄭孝胥更有充足的理由與動力從制度面來推行王道。至此，配合鄭孝胥的身份，他開始從施行政治與教育方面的相關政策與措施來推行王道主義。⁶⁹例如倡導廢除滿洲國原有的官員培訓機關，取而代之的方式則是設置高等學府，並以王道主義的內容來訓練青年學子，俟其通達後便可直接從政。如此一來除了可以確保官員對於王道主義的效忠程度，還可符合「賢人政治」的目標，以與王道主義中追求儒家傳統精神的內容相呼應。⁷⁰在某些場合或考試之中，還以「王道」作為作文的命題，要求他人撰寫。⁷¹此後更設立「王道書院」，對王道主義進行專門性質的研究與教學及培養人才，頗為符合今日學術研究機關的性質。⁷²與此同時，還與其他同樣倡導王道的中、日人士在滿洲國各地設立具有宣傳性質的協會或組織來弘揚王道主義，如協和會與孔學會等，⁷³立意在將王道主義更廣泛、更

⁶⁹ 鄭孝胥出任滿洲國國務總理並兼任文教部大臣(1932.7-1935.5)，因此可對當時滿洲國的教育政策加以控制與影響。參見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1183。

⁷⁰ 此處所提到的「高等學府」為「大同學院」。大同學院的前身是「自治領導部訓練所」，後來滿洲國於 1932 年成立後，改稱為「資政局」，直屬於國務院的總務廳。後來資政局於 1932 年 7 月因故裁撤，原本負責訓練滿洲國官員的作用便轉移至大同學院。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2 年 7 月 1 日條，頁 2393；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367；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頁 88-89。

⁷¹ 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頁 102-103。

⁷² 「王道書院」設立於 1937 年 6 月。在鄭孝胥於 1935 年 5 月辭去國務總理一職後，開始籌備設立「王道研究院」。過兩年時間的奔走籌畫後始設立，並命名為「王道書院」。鄭孝胥對於該書院的學制、教材與作用都有詳細的規定，並持續關注書院的發展。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5 年 7 月 23 日條，頁 2593；1937 年 6 月 1 日條，頁 2672；1937 年 12 月 25 日條，頁 2699。

⁷³ 因有感於滿洲國成立後的所出現的反滿抗日運動無法通過武力的手段而完全消滅，以石原莞爾(1889-1949)為首的人士提出藉由「民族協和」的意識型態組織「協和黨」，來對滿洲國人民進行思想上的統治。但此提議遭受滿洲國政府內外方面的強烈反對，尤以溥儀最力。為了平息反對聲浪，石原於是將「協和黨」改為「協和會」，並以「主張並實踐王道政治」與「追求民族協和」作為該會主要的目標。而有關「協和會」的組織架構與演變，請參見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頁 441-448、頁 625-634；而孔學會是由先前成立於東北的「道德研究會」演變而來，由鄭孝胥出任會長，袁金鎧(1869/70-1945/47)任副會長。在推行王道主義上，孔學會扮演著有由上而下進行傳布與協調的半官方角色。有關溥儀對於「協和黨」的反對態度，請參見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7），頁 250；對於孔學會的介紹請參見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頁 89-90。

快速的傳播出去，以「教化」的方式來潛移默化滿洲國的國民。

由於王道主義一開始就被提升至滿洲國立國準則的高度，⁷⁴並受到以鄭孝胥為首的官方力量強勢推動，因此在滿洲國境內快速的散播開來。雖然鄭孝胥認為，自己的王道主義要優於日本儒學中的王道政治論來得更加正統與優秀，然而鄭孝胥也清楚感受到，如果要借助官方的力量來推行王道主義，就必須與實際上控制著整個滿洲國的日本勢力來配合，以兼顧滿洲國另外一個建國目標：促進「日滿」合作。但這並不代表鄭孝胥對於日本的意圖毫無戒心。尤其是滿洲國的定位相當特殊，⁷⁵倘若日本不再「保證」溥儀等人對於滿洲國的統治權，而走上日本統治朝鮮的模式，使其變成第二個朝鮮，也就是從一個「國家」演變成一個殖民地，那麼鄭孝胥多年以來的苦心與期待將完全付諸流水，復辟大業也會將化為夢幻泡影。鄭孝胥的憂慮對日本方面來說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日本的大陸政策的基本論調，就是將中國滿蒙地區視為日本國防與國民生存上的「生命線」。倘若有任何外力對日本在滿蒙地區的特殊地位與權益有所侵害，日本就應該以武力防護。⁷⁶而滿洲國的成立，正讓日本以較為平和的方法來確保在這個滿蒙區域中的權益與控制性。如果滿洲國消失，日本就必須非得以武力手段來奪取滿蒙，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因此，為了要安撫鄭孝胥對於甫建立的滿洲國是否會成為「朝鮮第二」的疑慮，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1876-1945)還親自向鄭孝胥說明日本方面對於此事的態度：

至大和，茶會送本庄歸奉天，本庄極言勿信「第二朝鮮之說」，日本今日猶年虧二千四百萬，且朝鮮之居日本者，其數多於日人，日本生活頗受其累，為患俄人取朝鮮，故不得不守之。滿蒙之地勢不同於朝鮮，相安則日本之利，不安則日本之害。滿洲能為獨立國，日本已受其益，雖目前未免隔閡，然當共明合作之相依為命也。⁷⁷

本庄察覺到鄭孝胥的不安，而鄭氏的不安同時也標示著一件事：倘若鄭孝胥因此

⁷⁴ 滿洲國的建國宣言中提到：「實行王道主義，必令境內一切民族能熙熙皞皞，如登春臺，使之為永保東亞之光榮，為世界政治模範。」參見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頁132-133。

⁷⁵ 關於滿洲國的定位問題，至今仍未有一定論。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其作品中試圖以文化價值來證明滿洲國具備了獨立的國家主權，並認為是中國與日本過於激烈的民族主義斷絕了滿洲國主權的持續發展。但更多學者認為滿洲國的本質乃是一個受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權，並無國家主權的存在。參見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陳永發、沙培德，〈關於《滿洲國之建構》書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2004)，頁177-194。

⁷⁶ 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頁372。

⁷⁷ 《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2年5月27日條，頁2386。

事感到疑慮，那麼溥儀對於此事必然也抱持畏懼的態度。若溥儀等人因此而打退堂鼓，並取消與日本軍部合作創建滿洲國的協議，對於關東軍與日本的大陸政策來說，都是相當沈重的打擊。有鑑於此，他先對「將滿洲國變成朝鮮第二」的傳言做出澄清，其後更分析時勢並論述滿洲國的特殊地位，說明日本非但不會出兵滿洲國，還會與之「相依為命」也。後來日本還再度派員對鄭孝胥說明日本的立場，嚴正表明日本絕對沒有意圖攻擊滿洲國，否則日本將會「自取覆亡」。⁷⁸ 由此可見當時日本方面對於此事的關注程度。在得到日本方面的保證後，溥儀於1934年3月正式於滿洲國稱帝，並派遣鄭孝胥出使日本，與日本的政商名流進行接觸與交流。於赴日旅程中，鄭孝胥相當明顯的透露出此時他對於日本的信賴與欽佩觀感，「平生肝膽道非孤，坐見扶桑奮霸圖」，⁷⁹將支持他的日本看作是他的知音。他更希望滿洲國能夠急起直追，在日本「今日日光輝萬國」的協助下，⁸⁰朝向富強與繁榮的目標。

鄭孝胥致力於王道主義的宣揚，並將日本視為知音與滿洲國繁盛富強的目標。那麼日本方面又是怎麼看待鄭孝胥的王道主義？在滿洲國成立初期，基於提倡「日滿合作」的目標，日本軍部對於鄭孝胥推行王道主義的舉動是樂觀其成的。在當時關東軍司令部於1932年5月所決定的〈第四次對滿蒙方策—滿洲國之指導要領〉之條文內容中，可以觀察到當時日本當時對於鄭孝胥王道主義的立場，採取支持的態度：

滿洲國以奉行王道主義，實行順應民意之開明政治，開闢異民族融合並安居樂業之天地為根本方針。⁸¹

這份條文的生效時間為滿洲國建立初期，正逢日本竭力欲營造出「民族合作」的氣氛，進而爭取滿洲國境內絕大部分的組成份子—中國人民的認同與支持之時刻。藉由鄭孝胥王道主義的觀點中如「博愛」、「不分人己」，以及反對「愛國」的主張，更有助於日本方面來推行他們所提倡的「民族協和」論調。同年八月，平沼騏一郎還曾寫信給鄭孝胥，其中提及他對於鄭孝胥的評價為「惟閣下膺重職，營謀百為，敝邦人士，引頸相望，爭睹新政為快。夫濟斯民者，唯有王道也。」

⁷⁸ 為了解除鄭孝胥的疑慮這個問題，日本方面派當時的貴族院議員兼拓殖大學校長永田秀次郎(1876-1943)向鄭孝胥說明，其中提到：「日本絕無以滿洲為朝鮮之意……日本若恃兵力以據中國，必將自取覆亡，有識者皆見及此。」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3年8月14日條，頁2476。

⁷⁹ 鄭孝胥，〈使日雜詩〉，收入《海藏樓詩集》，頁417。

⁸⁰ 同前註，頁418。

⁸¹ 中國中央檔案館主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傀儡政權》（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13。

王道不行，則奈斯民何」。⁸²文中對鄭孝胥的王道主義評價極高，鄭孝胥對此甚為得意，並把這封信的內容記載於其日記中，以表重視。

不過，隨著環境的變遷，以及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的逐漸興盛，鄭孝胥的王道主義逐漸與現實產生了差距而受到日本方面的質疑，其中又以主張「非兵」的觀點最為明顯。筆者在前文已論述過鄭孝胥強調「博愛」而反對「愛國」，其理由除了提倡「人己不分」以邁向大同世界以外，倘若統治者強調「愛國」，那麼必定會走上「強兵」一途，並以軍事實力來提升國家力量，這與他的王道主義是大相逕庭。「王道」必以仁義服人，而非用兵力使人屈服。鄭孝胥認為，若施行愛國思想，則必然以「教戰」為本進而窮兵黷武，並不符合以仁政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王道主義，⁸³因此他對於滿洲國未設置國防軍隊而感到自豪，⁸⁴雖然這並不代表滿洲國境內沒有軍隊。⁸⁵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的政治情勢也出現了變化。由於受到美國 1929 年發生經濟大蕭條的影響，金融危機也在日本上演，並使得農村內龐大的農民家庭陷入愁雲慘霧的困境，人民的不滿情緒隨之迅速升高。面對這樣的危機，日本的統治階級希望藉由對外的軍事行動，而將人民的不滿情緒加以轉向。此外，軍部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立場激進的軍人甚至對政治人物進行暗殺，更使得日本政黨內閣備受打擊而消失，軍人取代政黨人物進行組閣，⁸⁶並根據軍部的國防方針，開始推行大規模的整軍計畫。

對鄭孝胥來說，日本的擴軍政策與自己提倡「非兵」的主張，可以說是完全抵觸的。然而他卻無法改變日本國策的發展方向，只能被動的配合。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得以延續，更為了讓自己的王道主義可以持續受到推動，以實現他的烏托邦藍圖，他對自己的「非兵」主張進行了變更。當時曾有日本人士以「王道不能廢兵」為論，進而質疑鄭孝胥的「非兵」看法。對此他做出了答覆：

舉世皆知恃兵之危，又疑王道之危，故不能免於戰禍。若滿洲國行

⁸² 《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2 年 8 月 21 條，頁 2402。

⁸³ 同前書，1932 年 9 月 23 日條，頁 2410。

⁸⁴ 鄭孝胥曾以日本友人田口因身強體健因此終年僅著單衣為例，提到他對於滿洲國並未建軍之感：「滿洲國不設兵備，此猶田口單衣以敵嚴寒也。子其識之！」同前書，1934 年 2 月 5 號，頁 2506。

⁸⁵ 當時負責滿洲國國防事務的，就是推動建立滿洲國的關東軍。滿洲國對外雖無戰鬥，但關東軍必須應付滿洲國內部層出不窮的反抗軍攻擊，因此國防預算在滿洲國的年度預算中均佔 30% 以上。此一事實突顯出為了保持滿洲國內部的安定，代價可謂不小。參見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頁 471-498。

⁸⁶ 依田憲家著，卞立強等譯，《簡明日本通史》，頁 309-311。

王道，日本以不去兵而倡王道，則天下之嗜殺者或不能逞矣。⁸⁷

我們可以看出鄭孝胥為他的「非兵」思想提出了一個解套的方法，就是將日本定位為王道的「保衛者」。鄭氏認為，由於滿洲國要持續推行王道，日本的建軍舉動是可以將其視為一種「保衛」王道推行的舉動。消弭日本人的疑慮，鄭孝胥改變了自己「非兵」的初衷，並為日本的「強兵」行為提供一個正當化的理由。其後鄭孝胥更提出了「武裝王道」的觀念，而且對象並非專指日本。1935年3月，當滿洲國與蘇俄就中東鐵路的轉讓達成協議的消息傳來，⁸⁸鄭孝胥除了把這件大事看作是實行王道的成功，此外還提到他對於俄國的新看法：

此約之成，為王道之明效。何也？歷一年九個月，停而復議、議而復停者數矣。日、蘇、滿三國之用心，為相爭乎，為互讓乎？綜而言之，非互讓不克至此。夫王道以讓為本，故日、俄兩邦皆可謂武裝之王道；若滿洲國，則不過提倡王道而已，而亦獲其報。然則當世列邦亦何憚而不為王道哉？⁸⁹

鄭孝胥再次強調王道的正面效益，更提出「武裝王道」的新說法。光是以武力來「保衛」王道還不夠，鄭孝胥乾脆以「武裝王道」來定義此時的日本，提高了武力在施行王道的必要性，至於先前的「非兵」思想更是消失的無影無蹤，避免受到日本方面更加強烈的抨擊。此外，鄭孝胥更把他向來將俄國視為中國最大潛在敵人的看法，以及厭惡共產主義的立場給拋棄，而將蘇俄納入「武裝王道」的陣營中。綜合前述，為了讓自己的主張符合國際環境的變動，鄭孝胥持續性的改變著自己對於王道主義的思想與觀念，使得王道主義可以順應潮流與時勢持續推行。

除了「非兵」思想受到日本方面的質疑以外，雙方在歷史循環論觀點上面的分歧，也是日本漢學家對鄭孝胥王道主義有所疑慮的主要原因。中國歷史淵遠流長，政權歷經了多次的更迭與轉移。早在戰國時期，鄒衍便把政權的變換與「天」相連結，並提出「五德終始」理論，試圖對歷史上政權轉移的循環現象加以說明，把改朝換代看成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規律，並對君王提出警告：假使不遵照「天」所給予的符應來施政，那麼將會有新的符應與他人來取代王者之位，也就是「天

⁸⁷ 《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3年3月26日條，頁2450。

⁸⁸ 針對存在已久的中東鐵路問題，經日本政府的居中協調，滿洲國與蘇聯進行了一年九個月的轉讓談判。兩國在1935年3月達成協議，滿洲國以總額1億4000萬日圓買下中東鐵路，交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經營。至此，全滿洲國境內的鐵路便都被置於滿鐵的經營網之下。參見鈴木鈴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頁516。

⁸⁹ 《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5年3月23日條，頁2576。

命」的變革。自此，為王者被要求必須遵循「天道」賦予的責任，並施行以仁政為本的「王道」，才能合乎這些帝王所宣稱的「奉天承運」。⁹⁰否則的話，「天」將會依其罪愆施以懲罰，嚴重者甚至會被另一個被「天命」所認定的人給取代，成為新的領導者，「湯武革命」就是最有說服力的範例。往後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深受此一觀念的影響，並將其作為對抗君主暴虐或專制的有力制約。「天命無常，唯德是依」，施行王道成為保有「天命」的首要前提，⁹¹也是中國儒家思想中王道思想的特點之一。

然而這種「行王道以遵天命」的論點在日本卻不適用，這與日本施行天皇制度有絕對的關聯。由於日本天皇具有其「神格」，是天神在人世間治理人民的代理人。因此，天皇被天神所授予的治權並不會轉移到其他氏族。換言之，天皇永遠不會受到「易姓」的威脅。明治維新時，為了鞏固甫建立不久的君主立憲體制免於受到自由民權運動的挑戰，因此〈明治憲法〉為天皇的世系的純正性與正當性加以定調，首條條文即為「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所統治」，沒有人可以危害到天皇統治日本的權力，更不可能會發生「革命」。⁹²這種觀念就與中國所傳來的儒家王道思想有所抵觸。中國儒學承認政權更迭的可能性，在日本卻不能有「革命」的存在。面對天皇「萬世一系」的政治現實，為了沖淡中國儒學思想中王者必須施行仁政，才能保有「天命」的歷史循環論之影響，並消去中國儒家「王道」思想中所隱含的「革命」可能性，日本漢學者開始尋找解決的方法。他們以「血緣」為切入點，指出中國之所以會有朝代更迭頻仍的情形，就是因為中國君王的血緣並非直接繼承「天神」而來。相對的，世世代代都具備「神性」，與天神有直接血緣關係的日本天皇，就不會有這種問題，自然也不會出現政權更換的現象。⁹³此一觀念後來更被日本漢學家拿來當作為日本儒學拋開中國儒家思想根源性的主要理由，並搭配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觀點，強調日本儒學才是儒家思想的真正繼承者，直接承繼神性的日本天皇更有資格向各地推行王道，包括中國。⁹⁴

日本儒學家提出的看法對鄭孝胥的王道主義來講，是一種存在性的危機。不

⁹⁰ 張豈之，《新中國思想史》（臺北：水牛出版社，1992），頁 160-165。

⁹¹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54-155。

⁹² 由於強調天皇與「神」之間的血緣和地位繼承性，日本人逐漸將自己視為「神國皇民」，是受到天神所「選定」的。這種思想也影響日本人民產生「民族優越論」的觀點，將日本視為是東亞民族的帶領者。參見呂玉新，《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

⁹³ 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286-287。

⁹⁴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頁 165。

像先前只要改變「非兵」思想那樣單純，鄭孝胥現在必須面對自己的王道主義將被取代的強烈可能性。事實上，在鄭孝胥提出王道主義之初，便將傳統王道思想中濃厚的歷史循環論加以淡化。他提到：

自禹湯以下，皆繼世而有天下。古為傳賢，今為傳子。故湯武革命，言王道者皆疑之……忠臣之於其君，無不願其萬世一系者。然秦始皇言：『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秦廢封建之制，立萬世一系之法，其心欲天下之無亂，而天下大亂，二世而亡。何哉？無德則不足以享天命故也。使王道實行，則世無失德。傳子之制，雖保有萬世可矣。⁹⁵

為了對照日本天皇體制「萬世一系」的特殊性，並回應日本漢學者對於中國朝代變換頻仍的印象，鄭孝胥以秦始皇為例試圖解釋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並非必然，而是因為在上位者失德無仁所導致。只要君王施行王道，就可以防止失德的狀況發生，亦可保證政權的持續性與不變性。如此的解釋內容突顯出鄭孝胥希望自己的王道主義能夠兼顧中國儒家思想與日本天皇體制的意圖，以降低日本儒學家的質疑與挑戰。

儘管鄭孝胥對其王道主義在歷史循環論的觀點上做出調整，還是無法避免日本方面對此出現異論的事實，⁹⁶並間接影響日本對於鄭孝胥與其王道主義的認同和支持程度，鄭孝胥的政治光環開始漸趨黯淡。此外，鄭氏於其王道主義中提及的「非兵」與「博愛」觀念，與日本軍國主義的立場與方向背道而馳，因此鄭孝胥的王道主義在滿洲國的存在意義與影響可說是越來越低。加上先前他對滿洲國部分政策或措施曾有所批評，⁹⁷更加深關東軍對他的負面印象，並將鄭孝胥視為日本進一步控制溥儀與滿洲國的阻礙。雖然鄭孝胥曾在《日記》中自詡要到八十五歲才能引退還鄉以享天年，⁹⁸不過關東軍並未給他實現的機會。1935年5月，關東軍以調整滿洲國政府官員的名義，要鄭孝胥所組織的內閣總辭，而以軍旅出身的張景惠代替鄭氏出任國務總理，各部大臣的主要官員也清一色啟用親日派的官僚，⁹⁹這比鄭孝胥所預定的「退休年齡」整整早了九年。對此鄭孝胥也只能收

⁹⁵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66。

⁹⁶ 日本對鄭孝胥王道主義的異論，主要集中在「非兵」與「萬世一系」方面。待鄭孝胥辭去國務總理一職之後，日本批評鄭孝胥的頻率也隨之增加。例如登門拜訪鄭孝胥以質問，或是直接在鄭孝胥出席的場合與其辯論。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5年6月26日條，頁2589；1937年5月2日條，頁2668。

⁹⁷ 鄭孝胥曾對滿洲國日、滿官吏成員的比率不均提出批評，並論其「無怪人民之不信也」。參見《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2年10月23日條，頁2419。

⁹⁸ 同前書，1934年2月13日條，頁2507。

⁹⁹ 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頁538-539。

起先前意氣風發的態度，接受關東軍的安排而離開政治舞臺，再度回到一介平民的身份。「南歸興不淺，來日誰能測？」，¹⁰⁰正是此時鄭孝胥內心中的現實寫照。

隨著鄭孝胥的失勢，他的王道主義也不再受到關東軍與滿洲國官方的重視與推行，從此鄭孝胥僅能以巡迴演講或辦學的方式，繼續宣傳自己看似已逐漸沈寂的王道主義；或是閑賦在家吟詩作對，以慰無奈遺憾之感。1937年7月蘆溝橋事件爆發，日本正式對中國展開全面性的軍事行動。由於鄭孝胥一生皆把中華民國視為仇敵，因此鄭孝胥採取支持日本出兵的立場，更為日本的出兵舉動解釋為替中國「伐罪弔民」。¹⁰¹此外他還建議待日本戰勝後，中國應該如何與日本進行合作：

然將來日、華二國非若日、滿之合作，則不能長治久安。全國鐵道宜與滿鐵合作辦；日本專備亞洲海軍，中國任其半費；西北國防陸軍，日本助其訓練。此三者能成，必可保數十年之安定矣。¹⁰²

雖然鄭孝胥已與政治圈脫離，但他依舊關心中國與日本兩者之間的關係。與鄭孝胥一貫的觀念相同，他的著眼點依然是軍制與鐵路。他希望中國未來可以借助日本在這兩方面的先進水準，促進兩國合作，其中更隱含了鄭孝胥希望能重新參與政治的企圖心。只是這項主張僅止於鄭孝胥的單方論述，並未引起日本方面的重視。就歷史發展而言，此項主張也未有實現的可能。「不道人生不如夢，人生是夢苦難尋」。¹⁰³政治上的失勢與王道主義的逐漸沈寂，讓鄭孝胥感到心灰意冷而鬱悶不平，人生也失去了目標與意義。那些他所堅持不變的原則，終究敵不過時代變動的巨輪而成為空談。不久，鄭孝胥的身體便急遽衰弱，病逝於長春寓中，結束了他那極富變化性與爭議性的一生。

¹⁰⁰ 鄭孝胥，〈買宅〉，收入《海藏樓詩集》，頁428。

¹⁰¹ 《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7年8月5日條，頁2681。

¹⁰² 同前書，1937年10月23日條，頁2690。

¹⁰³ 鄭孝胥，〈月下〉，收入《海藏樓詩集》，頁432。

第四節 小結

為了要強調滿洲國的正統性、凝聚滿洲國國民對自身國家的認同感與向心力，並匡正外界對於滿洲國與日本從屬關係的諸多猜想與質疑，甫就任滿洲國國務總理的鄭孝胥必須自他所熟習的中國儒家學說當中尋求一種概念，以解決他所面臨的處境。因此，他選擇以受到孟子闡述並宣揚的「王道思想」為基礎，將這個富有悠久歷史的概念加以轉化為滿洲國的立國精神，以達到將滿洲國建構為「大同世界的王道樂土」之目標。此外，鄭孝胥還希望自己的王道主義能夠成為帶領日本儒學中王道思想的指導者，因此一方面他強調自己王道主義乃承繼孔、孟思想而來，藉以提昇自身王道主義在中國儒學中的正統地位。此外，為了達到「民族協和」目標，鄭孝胥必須處理當時甚為興盛的民族主義與愛國觀念問題。於是他將孟子對王道思想的相關論述內容加以轉化或擴充，提出「博愛」的概念，而將人民因民族、愛國觀念而產生的不滿情緒降至最低，以穩定滿洲國政府的統治地位。如此一來，他的王道主義將可兼顧正統性與適切性，而日本只要遵循並保護鄭孝胥的王道主義，與推行王道主義的基地——滿洲國，便可將王道主義推行出去，假以時日便能「風行世界矣」。

鄭孝胥並非是中國近代史上提出以王道思想治國的第一人。在鄭氏提出王道主義之前，孫中山已於其「大亞洲主義」中提出了王道概念。在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論點中，他以為東方傳統的文化內容，就是以施行仁義德政為本的王道文化。相對來說，西方的物質文明乃是霸道文化。孫中山不斷呼籲日本應該以東亞區域的興盛與和平為優先考量，協助正要起步的中國並使其興盛，如此便可一同帶領亞洲對抗西方霸道文化的入侵。孫中山的王道思想立意雖佳，但並不符合當時日本國策的發展趨勢與利益，因此並未受到日本方面太多的矚目與重視。而孫中山失敗的結果也讓鄭孝胥瞭解到一個事實：日本是否接受王道主義，是以自身利益作為最優先的考量。

由於鄭孝胥的王道主義有助於日本在滿洲國的統治力量更加穩固，關東軍在滿洲國建立初期對於鄭氏的王道主義乃採取支持的立場，有感日本對於他的支持，鄭孝胥此時對於日本的觀感也呈現出相當友善的態度。有了日本方面的支持以及官方力量的協助，鄭孝胥開始逐步將他的王道主義推行至全滿洲國。例如發行相關刊物、將學說內容與國民日常生活作結合，或是在全國各地設立推行王道主義的機關、組織等。然而由於日本政治氛圍的改變，鄭孝胥的王道主義開始與現實環境中的政治局勢產生差距。王道主義中的「非兵」和「博愛」思想，就與

當時日本的擴軍政策有所抵觸；而王道主義中所隱含的歷史循環論調，更讓強調天皇「萬世一系」的日本所疑慮。有鑑於此，鄭孝胥提出新的解釋與事例，試圖消弭日本方面對王道主義的質疑，但似乎作用不大。日本方面對於王道主義的支持態度逐漸下滑，這也讓鄭孝胥的政治光環漸趨黯淡。兩者交互作用之下，讓王道主義在滿洲國的存在意義與影響層面迅速降低。政治上的失勢讓王道主義不再受到日本方面與滿洲國政府的重視與推行，讓鄭氏甚為鬱悶不平。失去政治舞臺的而再度成為一介平民的鄭孝胥，此時才真正體會到他的企圖與抱負終究不過是幻影，而他所信賴、倚重的日本也未給予他自始而終的支持。他種種的「淑世」理想也都由於現實的變遷影響下，再無實現的可能。「冰消雪解春何在？應在詩人一笑間」。¹⁰⁴這兩句詩詞，正好道盡了鄭孝胥晚年的落寞之情。



¹⁰⁴ 鄭孝胥，〈闕題〉，參見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五冊，1936年4月4日條，頁2623。

第五章 結論

在中國近代史中，鄭孝胥是個不能忽略的人物。一生歷經滿清皇朝、中華民國與滿洲國三個政權的他，與中國一同歷經了於政治、經濟、軍事、民生、外交之各層面的劇烈轉變。在清廷因革命而覆滅後，為了在這動盪的時勢中實現自己重振清廷中興的理想，鄭孝胥必須等待機會，更要與外來勢力合作，才有實現自身理想的機會。因此本文植基於鄭孝胥所遺留下來的筆記史料，並輔以其它相關人物、事件與背景的歷史材料，選定以鄭氏對日本此一國家的觀感變化過程為主軸，筆者希望能初步勾勒出鄭孝胥這一人物的形象，並進一步探查鄭氏日本觀的轉變過程為中國近代史與近代中日關係所帶來的作用與影響。

由於故里福建地區的鼎盛學風，且又生長於對家族成員教育甚為重視的士人家庭，這使得鄭孝胥自幼便受到中國固有文化與學術的薰陶。肇因於在科舉試場的失敗造成鄭氏無法順利的進入仕途，促使他對於政治舞臺的嚮往更為熱切。受薦進入李鴻章幕府後，鄭孝胥開始接觸到西方國家的人物、政治事務與思想，除了能比其他中國傳統士人更能了解國際情勢以外，更讓他有機會開始建構自己的外交思想體系。雖具備比當時中國廣大士民更廣闊的國際視野，然而抱持著「天朝觀」的情形仍舊可以在鄭孝胥身上發現。從其奉派出任駐日使節成員，對於日本文人與思潮中「重西學，輕儒學」之風氣的不滿，以及在觀察日本明治維新的各項政策與措施後，認為明治維新是捨棄中國傳統漢學而過於偏向西化的產物來看，不難發現鄭孝胥依然將中國傳統文化擺在自身價值觀的頂端，崇尚物質文明的西方文化是無法與之比擬的。

與當時主張清廷應「師日」的黃遵憲相比，鄭孝胥則是認為中國只要「仿日」，並無「師日」之必要。然而，提出「師日」與「仿日」之日本觀的士民終究是少數中的少數，絕大部份的中國官員與人民當時的日本觀都是傾向於「輕日」的。但這局勢很快就清廷在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而整個翻轉過來。這場戰爭讓鄭孝胥深刻體認到清廷的顛覆與脆弱，他對於清廷的失敗並不感到意外，卻對日本開戰舉動感到訝異。自甲午戰爭後，鄭孝胥開始將日本視為中國的一個威脅潛因，同時他也認為清廷需要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受到中日甲午戰爭慘敗的影響，中國士民掀起了追求變法改革的風潮。鄭孝胥肯定「變法」本身背後的意涵與作用，但對於當時推行變法的主事者康有為、

梁啟超提倡由政治制度與行政體系上改革的主張，則持反對態度。鄭氏認為，中國若進行改革，應該遵守一個準則：保持中國長久以來所依循的道統，以維持自身優良且獨一無二的傳統儒家文化。對於儒家文化的優越感乃鄭孝胥思想脈絡之中一個不變的守則，而鄭氏也以自己先前出任駐日本使節的經歷作為例子，主張清廷施行改革只要由軍制與鐵路政策方面下手便可。另一方面，對應於德國強佔膠州灣一事，當時的國際外交局勢出現了英國、日本同盟以抗俄國、德國的情形。眼見如此，鄭孝胥開始調整自甲午戰爭後對日本的敵視態度，並認為中國應與日本合作，以對抗威脅最大的俄國。適逢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決定訪華，更讓當時維新派人士感到興奮，認為是與日本加強合作的契機。此時鄭孝胥提出「聘伊藤為客卿」的主張，並與友人設立「亞細亞協會」以利推動雙方交流。然而這股聯合日本共同推行維新的風潮，卻因戊戌政變的爆發而銷聲匿跡。

自戊戌政變後到辛亥革命發生之前的這段時間，可說是鄭孝胥積累外交事務經驗與建立國際觀體系的重要時期，而他此時對於日本的印象也呈現出多變之傾向。筆者以鄭氏生涯中所面臨的三個事件為例，分別是鼓勵廣西優秀青年學子至日本遊學、籌造錦瑗鐵路以對抗俄國與日本所經營的南滿鐵路，以及於 1910 年的東北瘟疫大流行中，呼籲與日本、俄國進行防疫合作等事件為對象加以相互比較，來突顯出鄭孝胥在此段時期日本「印象」的多樣化。首先，鄭氏將日本的視為一個可讓專業人才精研知識與技術的媒介，以讓中國青年學習更高深的知識與技術，這與他於戊戌變法時期將日本視為「興亞」伙伴的思想脈絡相近。其後，鄭孝胥因其鐵路路政之長才，在 1909 年被邀聘至中國東北建造出一條鐵路，以期對抗俄國與日本所經營的南滿鐵路。面臨到俄國與日本的必然的反對姿態，鄭孝胥費盡心思加以應對。此時的他，又將日本視為一個對中國存在控制意圖的「潛在性敵人」。不過為了對付更具有立即威脅性的俄國，鄭孝胥主張在外交上中國還是可以與日本聯手以抵抗俄國；翌年所發生的東北瘟疫大流行，又讓鄭孝胥改變了他對日本的想法。為了撲滅瘟疫，鄭孝胥倡導與日本和俄國合作。如此一來，鄭孝胥再度把日本認定為「合作者」的角色。大體而論，鄭孝胥在這段時間對於日本的觀點與「印象」尚未固定，而是呈現出變動性的立場。以鄭孝胥的言論來加以觀察，他對於日本的「印象」似乎還是比較傾向於「合作者」的層面。

由於辛亥革命的爆發，鄭孝胥的身份地位歷經了一個非他所願的轉變：自滿清官員到「前清遺老」。為了體現儒家思想中的「忠君」觀念，也為了取回失去的權力與地位，鄭孝胥加入了復辟派的行列。在面臨張勳丁巳復辟失敗的衝擊後，鄭孝胥深刻體認到如要施行復辟，必須倚靠外來的強大勢力，才有成功的可能。在此前提下，鄭孝胥選擇與最為熟悉的日本進行合作。在察覺到日本政府與

外交機關對於推行復辟的保守態度與猶疑後，鄭孝胥轉而與立場較為積極的日本軍部接觸，並接受日本軍部對於復辟勢力的支持。同時鄭孝胥也憑藉著溥儀對他的器重而說服溥儀，使其不顧其他前清遺老對主權統治性與民族立場的擔憂和勸誡，決定與日本關東軍合作，進而走上創建滿洲國的路途。此時的鄭孝胥已將日本，尤其是軍部，視為一個最可靠的「合作者」，並成為此後鄭氏對於日本立場與觀點的基本論調。

為了要強調滿洲國的正統性，凝聚滿洲國國民對自身國家的認同感與向心力，並匡正外界對於滿洲國與日本從屬關係的諸多猜想與質疑，甫就任滿洲國國務總理的鄭孝胥必須自他所熟習的中國儒家學說當中尋求一種概念，以解決他所面臨的處境。因此，他選擇以受到孟子闡述並宣揚的「王道思想」為基礎，將這個富有悠久歷史的概念加以轉化為滿洲國的立國精神，以達到將滿洲國建構為「大同世界的王道樂土」之目標。此外，鄭孝胥還希望自己的王道主義能夠成為帶領日本儒學中王道思想的指導者，因此一方面他強調自己王道主義乃承繼孔、孟思想而來，藉以提昇自身王道主義在中國儒學中的正統地位；此外，為了達到「民族協和」目標，鄭孝胥必須處理當時甚為興盛的民族主義與愛國觀念問題。於是他將孟子對王道思想的相關論述內容加以轉化或擴充，提出「博愛」的概念，而將人民因民族、愛國觀念而產生的不滿情緒降至最低，以穩定滿洲國政府的統治地位。如此一來，他的王道主義將可兼顧正統性與適切性，而日本只要遵循並保護鄭孝胥的王道主義，與推行王道主義的基地——滿洲國，便可將王道主義推行出去，假以時日便能「風行世界矣」。

鄭孝胥並非是中國近代史上提出以王道思想治國的第一人。在鄭氏提出王道主義之前，孫中山已於其「大亞洲主義」中提出了王道概念。在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論點中，他以為東方傳統的文化內容，就是以施行仁義德政為本的王道文化。相對來說，西方的物質文明乃是霸道文化。孫中山不斷呼籲日本應該以東亞區域的興盛與和平為優先考量，協助正要起步的中國並使其興盛，如此便可一同帶領亞洲對抗西方霸道文化的入侵。孫中山的王道思想立意雖佳，但並不符合當時日本國策的發展趨勢與利益，因此並未受到日本方面太多的矚目與重視。而孫中山失敗的結果也讓鄭孝胥瞭解到一個事實：日本是否接受王道主義，是以自身利益作為最優先的考量。

由於鄭孝胥的王道主義有助於日本在滿洲國的統治力量更加穩固，關東軍在滿洲國建立初期對於鄭氏的王道主義乃採取支持的立場。有感日本對於他的支持，鄭孝胥此時對於日本的觀感也呈現出相當友善的態度。有了日本方面的支持

以及官方力量的協助，鄭孝胥開始逐步將他的王道主義推行至全滿洲國。例如發行相關刊物、將學說內容與國民日常生活作結合，或是在全國各地設立推行王道主義的機關、組織等。然而由於日本政治氛圍的改變，鄭孝胥的王道主義開始與現實環境中的政治局勢產生差距。王道主義中的「非兵」和「博愛」思想，就與當時日本的擴軍政策有所抵觸；而王道主義中所隱含的歷史循環論調，更讓強調天皇「萬世一系」的日本所疑慮。有鑑於此，鄭孝胥提出新的解釋與事例，試圖消弭日本方面對王道主義的質疑，但似乎作用不大。日本方面對於王道主義的支持態度逐漸下滑，這也讓鄭孝胥的政治光環漸趨黯淡。兩者交互作用之下，讓王道主義在滿洲國的存在意義與影響層面迅速降低。政治上的失勢讓王道主義不再受到日本方面與滿洲國政府的重視與推行，讓鄭氏甚為鬱悶不平。失去政治舞臺的而再度成為一介平民的鄭孝胥，此時才真正體會到他的企圖與抱負終究不過是幻影，而他所信賴、倚重的日本也未給予他自始而終的支持。他種種的「淑世」理想也都由於現實的變遷影響下，再無實現的可能。

筆者以鄭孝胥作為探討對象的用意，主要是以他與日本之間的種種互動過程為中心，來探索鄭孝胥對於日本這個國家的觀感變化過程及其影響。當他接到出任日本使館書記官的任命而首次造訪日本時，他對於這個國家的觀感如同許多初次抵達日本的中國士人，對眼前這個正處於大力推動維新的國家帶著濃厚的好奇，並驚訝於日本在工商業的發達與進步。但就文化水準來說，鄭孝胥依然相信中國的文化要高於日本的文化內涵。直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才讓鄭孝胥對日的友好觀感轉變為了敵視的負面立場，但這種態度並未持續太久。從鄭氏提出推薦日本人擔任鐵路管理之工作、派遣地方子弟到日本精研技術，或是主張聘請伊藤博文擔任清廷戊戌變法的顧問等論調，不難看出在民國創建前，他將日本定位為可以讓清廷與中國在物質水準與工商業技術上提昇水準的一個對象。

辛亥革命爆發以後，成了「前清遺民」的鄭孝胥，為讓傳統的君主制度能重回中國，為了保護儒家思想不讓西方功利主義思想給取代，更為了取回失去的政治權力與地位，他走上了復辟之路。為了讓復辟大業早日實現，鄭孝胥亟需外力的援助，這讓他想到了一直都有往來接觸的日本。至此，鄭孝胥不再如同先前一般，僅將日本看作是能讓中國在物質文明上追及西方的「諮詢」角色，而是把日本視為一股能讓他所遵循、信仰的儒家價值傳統與君主制度在中國重生的重要力量。越是企盼復辟早日成功，鄭孝胥便愈往日本靠近，以獲取日本方面對於復辟訴求與溥儀的支持。影響所及，讓日本有所藉口與管道來進行所謂的「大陸政策」，並加快對中國的侵略腳步。1932年所出現的滿洲國，就是最佳的例子。這也使得鄭孝胥自此被歸於「漢奸」一類，以諷刺他的民族立場。

滿洲國建立後，鄭孝胥對日本的友善觀感提升到最高點。但隨著時局的變遷，鄭孝胥終究無法讓日本對其政策與主張持續的支持下去。雖然並未明言，但我們可從鄭孝胥的詩句中得知這時他對日本的失望與不滿之情。除此之外，他於此時亦知自己的努力終究白費，而他希望拉攏日本以協助溥儀重登大寶的理想，也只不過是一場幻影。

限於時間與筆者的才識不足，因此分析的層面與廣度都還有待擴充與加強。筆者希望藉由本研究來引起拋磚引玉之作用，對鄭孝胥能進行更為全面與精細的分析，當可描述鄭氏更為詳細的一面，以幫助後人對中國近現代史與中日關係史能有更深刻的認知與瞭解。



徵引書目

一、基本史料

《申報》，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2-1987。

《宣統政紀》，收入《清實錄》第六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據1934年刊本影印。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關與中日戰爭》，收入《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日露戰爭》第五冊，東京：巖南堂書店，2005。

〔清〕王闓運著，馬積高主編，《湘綺樓詩文集》第二冊，湖南：岳麓書社，1996。

〔清〕王韜，《扶桑遊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王寶平編，《晚清東遊日記匯編——中日交流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漢〕司馬遷著，《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朱義胄編述，《貞文先生學行記》，收入《民國叢書·第四編》卷94，上海：上海書局，1992，據世界書局1949年版本影印。

〔清〕何如璋，《使東述略》，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李根源，《民國李雪生先生根源自撰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汪康年，《汪穰卿筆記》，收入《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

汪辟疆著，《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宋〕邢昺，《論語注疏》，臺北：中華書局，1966，據據阮刻本校刊聚珍倣宋版影印。

胡思敬，《退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據民國十三年[1924]刊本影印。

胡嗣瑗，《直廬日記》，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4。

苑書義、孫華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三冊，北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孫瑞芹，《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徐凌霄、徐一士合撰，《凌霄一士隨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

〔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

秦國經主編，唐益年、葉秀雲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六冊，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康有為編，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1953年刊本。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點校本。

張謇著，曹從坡、楊桐主編，《張謇全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據中華書局1931年刊本整理。

張鱣，〈復辟詳志〉，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8。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據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

梁啟超主筆，吳貫因主編，《庸言》第2卷第3號，收入《民國珍稀期刊·庸言》第10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章梈，《一山文存》，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許指嚴，《復辟半月記》，收入《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據上海交通圖書館本校刊。

陳三立著，錢文忠標點，《散原精舍文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據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八年[1949]刊本。

陳衍等纂，《閩侯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民國二十二年[1933]抄本。

陸純編，《袁大總統書牘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據1914年刻本影印。

陳聲既編，王真續編，葉長青補訂，《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卷一，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珍藏本年譜叢刊》第18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據民國間刻本。

陳瀛一，《睇向齋密錄（附二種）》，收入《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7，據上海文明書局民國十一年[1922]刊本。

軼名，《中國公債史料》，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黃彰健編，《康有為戊戌真奏議》，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74。

〔清〕黃慶澄著，陳慶念校，《東遊日記》，收入《蒼南文獻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據光緒二十年[1894]東甌咏古齋初刻本。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收入陳錚主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據光緒二十四年[1898]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印本。

〔清〕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收入陳錚主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據光緒二十四年[1898]長沙富文堂重刊本。

〔清〕壽福等編，《先考世郎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珍藏本年譜叢刊》第17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據宣統二年[1877]鉛印本。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五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囈》，收入《近代筆記史料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據上海機器印書局光緒三年[1877]刊本。

鄭孝胥著，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得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鄭孝胥著，彭述先編輯，《鄭總理大臣王道講演集》，台北：中央新報：福文盛印書局，1934。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鄭觀應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羅振玉，《羅雪堂先生全集》，臺北：大通書局，1968。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寶廷著，聶世美校點，《偶齋詩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據光緒十九年[1893]刻本。

二、近人著作

Hobsbawm, E. J.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臺北：麥田出版，1997。

丸山真男著，徐白、包滄瀾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山根幸夫、藤井昇三、中村義、太田勝洪等編，周啟乾監譯，《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入門》，臺北：金禾出版社，1995。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傀儡政權》，北京：中華書局，199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7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

升味准之輔著，董果良、郭洪茂譯，《日本政治史》第二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水野明編著，鄭樑生翻譯，《東北軍閥政權研究—張作霖、張學良之抗外與協助統一國內的軌跡》，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

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北京：三聯書店，1980。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牛秋實、范展、高順豔著，《李鴻章幕府》，收入張均衡主編，《晚清四大幕府叢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公司出版社，2005。

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

王曾才，《中英外交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79。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

-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
- 王曉秋，《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北京：崑崙出版社，2005。
- 王曉秋、尚小明主編，《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王曉秋等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收入周一良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王曉秋等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歷史卷》，收入周一良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0。
- 永田廣志著，陳應年等譯，《日本哲學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 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聯書店，1997。
- 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鑒」：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多洛肯，《明代福建進士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 朱漢國、楊群主編，《中華民國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 何綿山，《閩文化概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 吳佳倩主編，《日本姓氏人名大辭典》，臺北：名山書局，1984。
- 呂玉新，《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
- 坂野正高著，陳鵬仁、劉崇稜譯，《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P.271-274)
- 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 李育民，《近代中外關係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李念慈，《滿洲國記實》，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 李泰棻，《中國最近世史（第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90。
-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 李潤強，《清代進士群體與學術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 沃邱仲子，《當代名人小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1926年崇文書局版影印。
- 汪暉、余國良編，《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 依田憇家著，卞立強等譯，《簡明日本通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 周君適，《溥儀與滿清遺老》，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84。
- 林庚白，《麗白樓自選詩》，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6。
-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
- 林明德編著，《中國近代軍閥之研究》，臺北：金禾出版社，1994。
- 易惠莉，《鄭觀應評傳》，收入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林薇，《百年沉浮：林紓研究綜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
- 邵延森編，《辛亥革命以來人物年里錄》，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 姜念東、解學詩等編，《偽滿洲國史》，大連：大連出版社，1991。
- 段云章，《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 胡平生編，《復辟運動史料》，臺北：正中書局，1992。
- 孫占元、張登德等著，《甲午戰爭的和戰之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 孫雪梅，《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本觀：以直隸省為中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
- 商衍鎰，《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 崔丕，《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臺灣東華出版社，2001。
-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
- 張昆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5。
- 張豈之，《新中國思想史》，臺北：水牛出版社，1992。
- 張灝，《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4。
- 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梁敬鐔編，《九一八事變史述》，臺北：世界書局，1995年五版

- 曹樹基、李玉尚著，《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
- 郭太風、廖大偉主編，《東南社會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陳水逢，《日本政府與政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84。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 陳秀武，《近代日本國家意識的形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陳俊宏，《李春生的思想與日本觀感》，臺北：南天書局，2002。
- 陳衍著，鄭朝宗、石文英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郭紹虞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 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上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陶菊隱，《督軍團傳》，收入車吉心、王熹主編，《民國野史》第12卷，山東：泰山出版社，2000。
-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 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 陳豐祥，《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臺北：金禾出版社，1992。
- 彭澤周，《近代中國革命與日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 森紀子，《轉換期における中國儒教運動》，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5。
- 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 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 黃俊傑、林維杰編，《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 黃俊傑主編，《孟子思想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 黃昭堂著，廖為智翻譯，《臺灣民主國之研究》，臺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
- 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 楊天石，《黃遵憲》，收入陳旭麓主編，《中國近代史叢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7。

-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局，1989，據滿洲圖書株式會社民國二十七年[1938]刊本影印。
-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臺北：金禾出版社，1998。
- 熊志勇、蘇浩合著，《中國近現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P.106-112、142-144)
- 劉天純等著，《日本對華政策與中日關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劉正成等著，《中國書法全集》第78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3。
- 劉岳兵，《近代日本儒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劉岳兵主編，《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劉望齡，《辛亥革命後帝制復辟和反復辟鬥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劉樹勛主編，《閩學源流》，收入許懷中主編，《福建思想文化史叢書》，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 德川公繼宗七十年祝賀記念會，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東京都：岩波書房，1984。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82。
- 蔣英豪編著，《黃遵憲師友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收入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編，《東亞文明研究叢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 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局，1988。
- 駒过 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京都：岩波書局，1996。
- 蕭公權著，汪榮祖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 賴麗琇，《德國史》下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P.484-503)
- 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收入《國學基礎文庫叢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羅琨、張永山，《羅振玉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
- 羅繼祖，《庭聞意略一回憶祖父羅振玉的一生》，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 羅繼祖輯、羅昌霖校補，《羅振玉年譜》，臺北：行素堂，1986。

關儀一郎、關義直共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東京：琳琅閣書店，1981。

鐘叔河編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臺北：百川書局，1989。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Folsom, Kenneth E.,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Hong K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1934.

三、期刊論文：

王立群，〈從《日本雜事詩》的修改看黃遵憲日本觀的嬗變〉，《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9期(2006)，頁87-91。

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第45期(1998)，頁47-55。

王恩，陳恩虎，〈民國初年前清遺老圈生存心態探析〉，《史學月刊》第3期(2005)，頁57-60。

王雷，〈民國初年生存空間的歧異——前清遺老圈裡的生死節義〉，《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1期(2003)，頁79-82。

王曉秋，〈甲午戰爭前後中國人日本觀的轉變〉，收入戚其章、王如繪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58-1171。

王寶平，〈晚清文人與日本——光緒年間寓日文人考〉，《日本學刊》第4期(1998)，頁139-151。

王寶平，〈試論清末中日詩文往來〉，收入氏編，《晚清東遊日記匯編——中日交流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18。

任浩，〈孫中山的大亞洲思想〉，《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5期(2005)，頁107-111。

李侃，〈鄭孝胥與偽滿洲國初期傀儡政權〉，《抗日戰爭研究》第4期(1995)，頁105-131。

李慶，〈論黃遵憲的日本觀——以《日本雜事詩》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4)，頁89-95。

- 周一良，〈關於《鄭孝胥日記》〉，《讀書》第9期(1995)，頁33-41。
- 周啟乾，〈晚清知識份子日本觀的考察〉，《日本學刊》第6期(1997)，頁68-84。
- 林志宏，〈王道樂土—清遺民的情感抵制和參與「滿洲國」〉，《新史學》18卷3期(2007)，頁45-99。
- 林志宏，〈清遺民的心態及處境：以劉聲木《菴楚齋隨筆》為例〉，《東吳歷史學報》第9期(2003)，頁183-218。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5。
- 紀映雲，〈關於鄭孝胥的詩意追求—及其與同光派之關係〉，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4。
- 茅海建、鄭匡民，〈日本政府對於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收入《歷史研究》第3期(2004)，頁54-109。
- 徐偉民，〈鄭孝胥的甲午戰爭觀〉，《安慶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2期，頁38-45。
- 桑兵，〈「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近代史研究》第3期(2006)，頁41-53。
- 朗維成，〈日本帝國主義泡製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及其覆滅〉，《同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2期，頁10-16。
- 張玉法，〈民初軍系史研究(1916-1828)〉，收入中研院近史所主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頁875-891。
- 張富強，〈「三國還遼」前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及其外交轉折〉，收入中研院近史所主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頁113-131。
- 盛邦和，〈日本亞洲主義與右翼思潮源流〉，《歷史研究》第3期(2005)，頁129-144。
- 陳永發、沙培德，〈關於《滿洲國之建構》書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2004)，頁177-194。
- 陳瑋芬，〈「天道」、「天命」、「王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繼承和轉化—兼論中日帝王之神聖化〉，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頁235-262。
- 郭肇民，〈我所認識的陳寶琛〉，收入《福建文史資料（第四輯）》，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頁63-77。
- 傅道彬、王秀臣，〈海藏樓內外的鄭孝胥〉，《北方論壇》第1期(2005)，頁38-48。

傅道彬、王秀臣，〈鄭孝胥等人的晚清文化遺民情結〉，《北方論壇》第1期(2002)，頁1-10。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鄭孝胥及其《日記》〉，《近代史研究》第1期(1996)，頁17-29。

焦潤明，〈1910-1911的東北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收入《近代史研究》第3期(2006)，頁106-124。

費克光(Carney T. Fisher)，〈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收入劉翠溶、伊懋可(Mark Elvin)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95，頁673-745。

黃自進，〈利用與被利用：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與日本政府之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9期(2003)，頁107-145。

黃福慶，〈論中國人的日本觀—以戴季陶的「日本論」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頁61-78。

楊曉波，〈鄭孝胥詩歌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

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臺大歷史學報》第30期(2002)，頁183-206。

鄭念茲譯，〈張勳與佃信夫〉，《近代史資料》總35期(1965)，頁118-137。

趙林鳳，〈從同文館中走出的使日大臣—汪鳳藻〉，《廣西社會科學》第5期(2006)，頁150-153。

趙燦鵬，〈論民國初年遺老歷史處境的特殊性—以鄭孝胥為例〉，收入胡春惠、薛化元主編，《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社會變遷》，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5，頁15-27。

劉申寧，〈李鴻章的對日觀與晚清海防戰略〉，收入中研院近史所主編，《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頁1-36。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一個新政策的呈現，1870-1875〉，收入劉廣京、朱昌峻編，陳絳編校，《李鴻章評傳—中國近代化的起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58-90。

劉鋒，〈升允復辟陰謀〉，《近代史資料》，總35期(1965)，頁147-158。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頁105-137。

韓小林，〈黃遵憲與日本〉，《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1期(2002)，頁24-26。

韓小林、馮君，〈論甲午戰爭前中國社會的日本觀〉，《嘉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2期(2005)，頁118-123。

瞿立鶴，〈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思潮〉，《師大學報》第 29 期(1973)，頁 27-52。

羅繼組，〈我所見之《鄭孝胥日記》〉，《社會科學戰線》第 6 期(1995)，頁 258-262。

鯤西，〈羅豐祿：近代中國最早的職業外交家〉，《尋根》第 5 期(2001)，頁 59-61。

